



**与盖世太保
周旋的人**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与盖世太保周旋的人

德·梅德韦杰夫 著

磊 夫 陶七一 译

刘述运 唐仁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八月

DAS/10

与盖世太保周旋的人

德·梅德韦杰夫著

磊夫 陶七一 译
刘述运 唐仁模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¹/₂； 字数187,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9·21 定价：2.10

出版说明

《与盖世太保周旋的人》是一部纪实性小说。书中详尽地描述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敌后侦察员的伟大功勋。苏联统率部为及时获取德国占领军的情报，直接派遣侦察分队空降敌后。侦察员库兹涅佐夫乔装德军中尉携其情侣女游击队员瓦莉娅打入敌军内部，经常出入德军各种机关与盖世太保进行周旋，并在其他战友密切配合下获取了敌军大量情报，数次暗杀德军高级官员。情节曲折动人，引人入胜。

目 录

第一部 潜入罗夫诺林区

第二部 真假主人

第三部 向西挺进

第一部 潜入罗夫诺林区

(一)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一些令人意气风发、难以忘怀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我的一生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的一生中，这种时刻则总是与受领党的任务紧密相联的。每当我接受任务时——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人历史正是由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这些任务来组成的，——我总会感觉到内心处于一种难于言表的“总动员”状态。那时全部的意念往往只凝聚在如何完成任务这一点上。而且渐渐地，执行任务的思考会发展、升华成一种梦幻似的东西，而后这梦幻又会变成清晰可见的实施方案。于是你可以奇异地看到等待你的明天，既充满艰难困苦又令人欢欣鼓舞的明天，你就会迫不及待地想开始行动，那怕拖延一分钟似乎也是不可忍受的。

四二年四月的一个傍晚，当我走在莫斯科那沉寂的、早早就断了人迹、暮色渐浓的街道上时，感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心情。

我是不久前从勃良斯克森林返回莫斯科的。在勃良斯克森林里我曾指挥过半年的游击队。现在，上级指派我组建一支新队伍——一支由数人组成的队伍，将空降到敌人深远后方的乌克兰西部森林，在那里隐蔽下来，把当地居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积极展开对德国占领者的斗争。

……渐渐堕入暮色中的莫斯科的傍晚是寒冷的，也格外

静寂。即便如此，莫斯科也还是可爱的。在中央电报局附近的高尔基大街上，几个带着冲锋枪的红军战士曾拦住过我。他们是执勤的巡逻队。接着几辆满载红军战士的卡车急驶而过。他们那“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的歌声随风飘扬。

路漫漫地伸向远方。

前面是夜，令人难受的无尽的长夜……只要一天不投身于党所托付的工作——新的象往常一样令人兴致勃勃、激动人心的崇高使命——焦急的心情总也无法平息，无所作为的内疚就会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

次日清晨，萨沙·特沃罗戈夫来到了我当时下榻的“莫斯科”旅馆的房间里。我和他在勃良斯克森林里就认识了。萨沙还很年轻，二十岁刚出头，可看上去还要年轻。他穿了一套簇新的但晃里晃荡不合身的夏装。萨沙推了平头，一副孩子般的圆脸晒得黝黑黝黑的，看去很象是个学生，或者更准确点说，象个军校的年轻学员。谁会知道，这个年青人却有着一番久经沙场的老游击队员的经历！

战争初期特沃罗戈夫所在的部队陷入了敌人的合围。但年轻的战士丝毫没有惊慌失措。他和同伙们一起冲出了白俄罗斯的丛林向前线运动，并沿途消灭了敌人数辆汽车。一九四一年秋天，他们这队人马来到了勃良斯克森林，加入了 I 指挥的游击队。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首次作战萨沙就表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他处变不惊，具有超群的侦察员的才干。他为人谦虚，工作勤奋，很快就博得了我们大伙的好评。萨沙成了游击队的侦察队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干得十分出色。

极力想显得老成持重，使萨沙养成了皱眉头的习惯，并

总是保持一种独特的矜持。一到我这，他就一本正经地问起将何时起飞，飞向何方。至于干吗要让他参加这支队伍——这业已确定——萨沙没存任何疑虑。

“您要选几个老伙计吗？”他问，显然指的是我们在勃良斯克游击队的战友，接着马上就建议说：“最好把达尔贝克·阿布德赖莫夫调来。然后再找二十来个人。名单我会给您拟好的……”

不一会儿游击队参谋长帕顺少校也到了，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刚任命的政治副队长斯捷霍夫少校。他外表整洁 神态端庄，脸精心地刮得光光堂堂。斯捷霍夫到军队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已觉得自己是个地地道道、正正规规的军人了。看见我在和特沃罗戈夫谈话，他有些急不可待。

“游击支队的根据地预选在罗夫诺市所在地区，”我针对着特沃罗戈夫的问题说明道。“这个选择可不是想当然。法西斯匪徒在罗夫诺建立了被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的‘首府’。坐镇这个首府的是希特勒的代理人、帝国部长、统辖帝国专署的埃里希·科赫。他掌握着对乌克兰土地上的希特勒匪徒的指挥大权。”

“为什么他们要呆在这儿？”特沃罗戈夫问。“而不去基辅。”

“想必，他们以为罗夫诺距离前线一千五百公里，龟缩在罗夫诺更加安全吧。要知道西乌克兰——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她是我们苏维埃大家庭中的一个小妹妹。她处于外国干涉者的蹂躏下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已有多年。长期在那儿作威作福的先是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则是波兰地主。在那块土地上依然存在着富农阶级、昔日的地主及其走狗，存在着彼得留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残

渣余孽及其它一些我们祖国的怙恶不悛的敌人。这些人本性难改，现在又在为希特勒匪徒效劳。正因为如此，纳粹头目科赫选择了坐镇罗夫诺，而不是基辅。然而在那儿他也未必会得到安宁！……”

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吸收几个西乌克兰出生的並十分熟悉西乌克兰的人加入支队。寻找和挑选这些同志的任务就交给了特沃罗戈夫。

……我们游击支队——眼下还在莫斯科——的成长和壮大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人们接连不断地到来，我和斯捷霍夫简直应接不暇，来不及接待所有的自愿报名者。况且每一个被吸收加入支队的人还请求再接收一、两个自己的熟人加入支队。不断有一些被介绍的熟人打来电话或亲自闯来。

比如，有一次一个自我介绍叫作采萨尔斯基大夫的年轻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可我几乎刚刚放下电话听筒，他就出现在我面前了。他请求让他加入游击支队。

“作为一个医生您太年轻了，”听完了他的请求后我说。

“我毕业于医学院。当学生时就曾在斯克利福索夫斯基医学院实习过。”

“您是外科医生？”

“是的。我熟悉野战外科。”

“您是外科医生这很好，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治疗各种疾病的多面手，而且是一个能让战士信赖的人……”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不能吹嘘自己。请您向支队的同志了解了解我的情况，他们认识我。”

“哪些人？”

“什穆伊洛夫斯基、谢列斯克里基、巴扎诺夫，还有很多人！……正是从他们那我得知您在组建支队。”

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自己的这位谈话对手。这是一个个子高高的身材匀称的青年，长着一头深色的卷发，容貌端正……他显然是在竭力控制自己以免失态，只有那双眼睛显露出他内心深藏的焦躁不安。他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我的答复。我挺喜欢这个青年。我觉得他真切地渴望着奔赴与敌斗争的最危险的地方。

我已经准备同意接收他了，突然一件事制止了我。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年轻医生穿着军服——佩有领章的军大衣和船形帽。

“您已经参军了？”

“是的。战争一开始我就向莫斯科团市委递交了参军申请。我要求派我上前线。军队接收了我，可却把我弄到了内卫部队。”

“但现在他们是不会放您走的！”

“只要您提一下，肯定行……”这青年觉得难以启齿。
“我不想呆在后方。请您务必争取一下……”

半小时后我到了内卫部队上将司令员的办公室。

“您师的军医采萨尔斯斯基请求加入梅德韦杰夫上校的游击支队，”将军一边迅速地浏览着采萨尔斯斯基的报告，一边在电话中向对方说道：“您认为如何？”

听完对方的回答后，他做出决定：

“那么这回算是一次例外吧。”

接着将军在报告上批示道：“同意将采萨尔斯斯基调归梅德韦杰夫同志指挥。”

……游击支队进行了一个来月的训练。在莫斯科郊区的

一个树林里，我们设置了一个营地。我们住在那每天练习射击，研究战术。离营地不远有一个湖。我们利用这一条件演练扎木筏，并用木筏从湖的一侧渡到另一侧。

每到休息时间大伙就学歌，不仅会唱，而且把歌词背得滚瓜烂熟。对这件事的头号热心人和行家里手就是采萨尔斯基和他的朋友格里沙·什穆伊洛夫斯基。他俩比任何人都爱唱歌，并且唱得很棒，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歌曲可以大大活跃我们游击队的生活。他们经常说：“应该多学些歌带到那边去！”

那时采萨尔斯基只是晚上才出现在营地里。白天为了收集大量的裹伤材料、药品和所有从深入敌后的那一天起就可能用得着的东西，他整日在城里跑来跑去……

后来我又了解到我们的大夫那段时间所从事的一项活动。这就是他还进修了外科学，读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并多次去请教母校的教授。他要成为一个能治疗各种疾病的医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作为游击支队的队长，我利用一些时机向人们介绍我们即将开始的生活。在勃良斯克森林里指挥了半年游击队的经历使我能够预见即将开展的工作的恶劣条件和等待着我们的困难。我毫不隐瞒地向同志们将这一切合盘托出，告诫同志们，使他们对艰苦的条件和与游击队员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经常遇到的险情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从人们聚精会神默默听讲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我们面临的危险和艰难困苦没有引起任何的恐惧。

然而立刻飞到罗夫诺州萨尔内森林中指定地点，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萨尔内森林距离莫斯科甚远。飞机只有在夜间才能飞越敌占区，而春季的夜又很短。因此飞机往往来不

及趁天黑飞完整个航程就得返航。而且，苏联飞机的出现很可能引起希特勒匪徒对萨尔内森林的注意。这样一来，游击支队就会立即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因此，我们决定飞得近些，不直接飞往萨尔内森林，而是在莫济尔森林空降，然后从那儿步行向指定地点集结。位于罗夫诺州界上的穆霍耶德村一带被确定为空降地域。

五月末，由十四人组成的第一小队起飞。领导这个小队的是萨沙·特沃罗戈夫。在全支队的战士名册中，他名列第一。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在穆霍耶德村一带见面，”飞机起飞前我叮嘱他。

过了两天我们收到了一份无线电报，特沃罗戈夫在电报中报告说，小队没有降落在莫济尔森林中，而是降到了日托米尔以南，几乎相差三百公里！加之，该地无森林，无处隐蔽。

又过了一天，特沃罗戈夫来电报告了自己克服一切困难向莫济尔森林，向预定集结地靠拢的决心。然而电报没有拍完就突然中断了。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一天、两天、三天——依然联系不上。能出什么事呢？

于是我们决定派出第二个小队。必需找见特沃罗戈夫并保障全支队空降的任务交给了领导这个小队的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科切特科夫。但是这次我们依然没有成功：科切特科夫和他的同伴同样也没有降落到穆霍耶德村附近，而是偏北了二百公里。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科切特科夫终于从托尔斯特列斯车站拍来了电报。该站位于切尔尼科夫——奥夫鲁奇铁路线

上，距离穆霍耶德三十公里。科切特科夫报告说，他在那停了下来，准备接应下一队空降人员。

这下人们的情绪才变得高涨起来。支队参谋长帕顺领导的第三小队飞往托尔斯特列斯。这个小队没有配备报务员——我们的报务员不够用，但是他们当中有两个既非常熟悉莫济尔森林，又非常了解托尔斯特列斯车站的游击队员。

我们通知科切特科夫，让他用篝火来给飞机指示空降点。

“篝火已经点燃，”科切特科夫回答。

我彻夜不停地在房间里踱着步子，从屋子的一角走到另一角，坐立不安，没有丝毫的睡意。我频频地看表，大概正因为如此，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随着拂晓的到来这种等待变得更加折磨人。天色越来越亮，我心中也越来越不安。当机场上终于传来盼望已久的“顺利返航”的报告时，我觉得这一夜简直把我弄得精疲力尽了。

“一切正常，”驾驶员报告说。“伞兵全部投向托尔斯特列斯车站一带的信号目标。”

然而那天早上科切特科夫却来电报告说，未发现任何飞机，尽管篝火烧了一整夜。出了什么鬼？显然伞兵又投错了地方！帕顺没有报务员，所以从他那是不会得到任何消息的。

特沃罗戈夫失踪了，帕顺也不知去向……

“我要亲自前往，”我当机立断，并立刻请示统帅部。然而统帅部拒绝了我的请求。只好耐心等待。

同下一批，第四小队人员一起空降的是谢尔盖·特罗菲莫维奇·斯捷霍夫。令人无比沮丧的是，他这组人员同样也没有空降到科切特科夫设置信号的地点。

“没有发现任何飞机，”科切特科夫报告说。斯捷霍夫则来电报告说：“我们一连三天无法确定所在地的位置。派出侦察的人亦没有返回。”

我内心的不安已达到了顶点。我坚决要求上级允许我亲自去。上级终于同意了。

和我一起空降的有在特沃罗戈夫失踪后被指定为支队侦察队长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金，女报务员莉达·舍尔斯特涅娃和几名西班牙籍战士。

他们是那批曾经为保卫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战，尔后为躲避佛朗哥法西斯恐怖而来到苏联的西班牙同志。伟大卫国战争开始后，视苏联为自己第二祖国的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们，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把他们派到前线去。这样，有十五名西班牙人编入了我们支队。

六月二十日黄昏，我带领一小队人来到了机场。一支队的战友们前来给我们送行。

用于告别的时间不长。前来送行的同志们知道，我们将飞往西部地区，不可能很快就给他们写信，但他们什么也没问，只是祝我们一路顺风、吉星高照，并说些既干巴巴的又意味深长的送别之言。然而这些话却掷地有声，深深铭刻在我们心里。

在预定的时间里，飞机准备完毕。再见啦，莫斯科！

象以往一样，上路后最初的几分钟我们的思绪依然停留在那个刚刚离开城市，依然和那些一刻钟前与我们握别的同志们在一起。渐渐地，这种惜别之情消失了，代之以新的意念。这些意念已不再是对过去和往事的追忆，而是对随着早晨的到来而即将开始的另一种未知和激动人心的新生活的遐思。机舱里活跃起来，人们开始了交谈。还有人唱起了

歌，一支接一支，一会儿是俄文的，一会儿是西班牙语的，一会儿又是乌克兰话的，这样持续了一路。

飞机飞越前线上空时，落入了探照灯耀眼的光束中。德军的高射炮弹在我们四周爆炸。但飞机幸运地通过了危险区。又飞了一小时后，传来了准备跳伞的口令。

我望了望舷窗外，清楚地看到了地面燃起的篝火。飞机边盘旋边降低了高度。我们一个挨着一个站在敞开的机门旁，门外是茫茫的黑夜和深渊。那情景很难使人不激动。

“开始！”

我第一个纵身跳了下去。

我们跳伞的高度很高——距地面九百公尺左右。夜空是晴朗的。我们头顶上挂着一轮明月。在我们脚下的地面上可以看见几堆篝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远——风使我们偏离了目标。其他几个跳伞的同志离我不远，就在我的上边和左右。这时突然有一个人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径直落下。我立即想到：一定是降落伞没有完全张开，这可要摔死人的。

我们脚下的树林清晰可辨了。我按照规定做好了着陆准备：交叉地抓住了伞绳。就在这一瞬间，一股强大的气浪冲过来，把我冲到了一边，然后双脚才终于触到了地面。风把我吹离树林边缘大约四十来米。

按预先约定的，我应点燃一堆篝火。这样着陆的同志们就会聚拢到篝火边。然而着陆时我给狠狠地挫了一下，以致站都站不起来，更不用说拾树枝来点篝火了。当时我只好收拢降落伞，点燃了它，然后准备好冲锋枪，爬进了近旁的小树丛。天知道此刻到篝火前来的是谁！

很快我听到了一阵轻微谨慎的脚步声，于是问：

“口令？”

“莫斯科！”

“熊，”我答了口令，然后提高了些嗓门：“把降落伞投进火里，向我靠拢。”

“是！”

来人是卢金，跟在他身后到来的是莉达·舍尔斯特涅娃，随后其他的人就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

三、四公里外传来了狗咬声，而且接连不断此起彼伏，仿佛是有人一直在撩逗它们。看来，不远的地方有村庄。

所有的人都聚齐了。最后一个赶到的正是我在空中发现的那个从我身边擦身而过的同志。他的伞没有完全张开，在眼看就要粉身碎骨的时候，突然他的脚碰上了沿铁路线架设的电话线，于是便化险为夷，真可谓万幸。

我站了起来，艰难地挺直了身体。

指北针，星空和铁路——这些足够告诉我们该向何处走了。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已经不远了。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距前线六百公里，距莫斯科上千公里的敌后。

(二)

夏日的森林身着绿装，分外妖娆。方圆几十里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森林的气息——那是霉湿的针叶和芳香的树脂的气味混杂着花草的芬芳。

东方透出万道霞光，把地平线染成了淡蓝色和玫瑰色，照亮了还浸在暮色中的树冠。挂满露珠的小草在脚下窸窣作响。我们鱼贯而行，一个人踩着另一个人的脚印，在身后只留下了一道足迹。这样即使是有经验的猎人也难以断定，到

底有多少人从这儿走过。谨慎——这是游击队员的首要信条。

这座位于敌人占领区的森林是那样神秘和令人忐忑不安。谁知道，它会为什么人效劳，里面隐藏着什么人，又会迎头碰上什么人——是朋友抑或敌人？……

我们默默地走着，个个竖起耳朵，听觉高度紧张。周围是一片令人生畏的寂静。

早上九时，我们已经来到了距离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很近的地方。我发出了休息的口令，派出了潜伏哨，然后命令莉达·舍尔斯特涅娃开设电台。

还没等我布署完毕，派往前面担任潜伏哨的战士就带来了三个人。一看见我，这些“俘虏”都高兴地笑了。原来这是科切特科夫的侦察员。

四十分钟以后，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本人已经向我们讲述自己的厄运了。他们不仅被空投到预定地点以北二百公里的地方，而且全都掉进了沼泽地。他们个个成了落汤鸡，在沼泽地里从一个土墩爬到另一个土墩，整整折腾了一夜，直到拂晓时分总算踏上了坚实的土地。火柴湿了，无法燃起篝火，更谈不上烤干衣服。而且真可谓祸不单行：电台也进了水。报务员为了与莫斯科沟通联系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没有见过比这在敌后森林中的重逢更亲切更令人欢欣的了。在这儿我们不知为何都异常深切地感觉到，我们为坚实的纽带牢牢联系在一起，是那樣的亲密无间，那樣的相亲相爱。人们争先述说着各种见闻，宛若隔世重逢。最令人欣慰的就是斯捷霍夫和他的伙伴也在科切特科夫的营地里。在这儿的还有采萨尔斯基大夫。按最初所定计划，他应和我一起出发，但由于科切特科夫小队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计划改

变了。这就是卡拉什尼科夫——一个上了年纪、身高体胖的游击队员——在着陆时连人带伞给挂在了离地面六米多高的树上。卡拉什尼科夫不等人们来援助，就用芬兰刀割断了伞绳扑通一声栽到了地上。然而他却站不起来了：双腿骨折。

当时，在接到科切特科夫就所发生事件拍来的电报后，我把它递给了采萨尔斯基：

“今天您能起飞吗？”

“随时都可以，”采萨尔斯基回答道。

“那么两小时后吧。”

“是。”

阿尔伯特·韦尼阿米诺维奇·采萨尔斯基刚结婚不久，急忙跑去向妻子辞行，不巧她不在家。他没来得及向妻子道别就飞走了。

卡拉什尼科夫此时不在营地。他躺在距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半公里处的一间巡道工的小房里，是科切特科夫把他安置到那儿的。大夫和游击队员每天去那里看望他。

关于萨沙·特沃罗戈夫和帕顺依然象先前一样音讯全无，如同石沉大海。

两天后，我们又接应了一小队伞兵。

开始时，飞机从我们点燃的篝火上空高高地一飞而过。我们的篝火烧得十分旺，连飞过的飞机和天上的乌云都照得一清二楚。

飞机飞到一边去了。等它拐过弯重新出现时，高度只有三百公尺了。接着一个个降落伞的圆顶离开了飞机。风把降落伞吹得歪到了一边。

突然在大约八十米的高度，接连张开了两顶降落伞。第一个跳伞者跌落在篝火旁，另一个在稍远处着陆。

显然，我们的跳伞着陆场不合适。它离火车站太近。附近既有铁路和圆石马路，又有木材场。在这样的场地上着陆，弄不好就会摔成残废。于是我们不得不给莫斯科发报，请求暂停空投人员。

六月二十三日拂晓，我们离开了这块营地，仅仅留下了由五名战士组成的“了望站”。他们肩负着监视车站的任务。采萨尔斯基也留在了“了望站”里。他得去给依然住在巡道工家的卡拉什尼科夫治伤。我们无法带着卡拉什尼科夫行动——他的腿已打上了石膏。

……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孤零零的淹没在密林深处的圆木小房。我们派出了三名便衣侦察员。

“要点吃的，尽可能了解一下敌情，”卢金向他们做了布置。

听见敲门声，走出一个身板结实、有些驼背、长着浓密的白眉毛的老头。

“什么事？”

“老大爷，能找到点吃的吗？”

老头拿出了十来个生土豆。

“老大爷，你知道德国人在什么方向吗？”

“这我可没注意，”老头说着，随手紧紧关上了门。

还没等我们走出一公里，我们这支队伍的后卫队就报告说，扣留了一个可疑的人。他骑马疾驰而来，看见担任警戒的战士就拍马上前问道：

“哪里可以见到警察局长？”

“你找他干吗？”游击队员问。

“刚刚有三个小伙子路过，打听德国人的情况。看来是游击队，朝那边走了！”

我们的人认出了那个被扣留的人就是刚刚给我们土豆的护林员。

受审时他供认，他是要到区中心哈布诺耶去向讨伐队报告林中出现游击队的，想以此背叛行径得到奖赏。老头说他自己过去曾因触犯刑法受到过苏维埃法院的审判。

“枪毙他！”这是全队的共同愿望。于是满足了大家的愿望结果了他。

这件事使我们警觉起来。尽管已经很累了，但我们决定不休息。下午三点来钟每人分了一块熟肉，边吃边走。面包没有了。

六月二十五日早晨，担任营地警戒的战士又带来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他在离我营地不远的地方观察地形。他对扣留他的战士说，他是当地的居民。然而在搜查他的时候，却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说明他在警察局供职的证件。很明显，敌人在寻找我们，而且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踪迹。

当天很晚的时候，突然我们设在托尔斯特列斯车站的瞭望站的全体人员都赶了回来，其中包括采萨尔斯基。

“出了什么事？”

“讨伐队，”大夫简短地回答说，“在搜山。”

“卡拉什尼科夫在哪？”

“他和巡道工一起被抓走了。”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处境是何等的危险。要是我在车站附近多滞留一段时间，就可能已全队复没了。

那天夜里我们挑选出一小队侦察员，由托利亚·卡普钦斯基率领，其任务是潜回车站附近，监视希特勒匪徒的动向。如果敌人正在对我们进行跟踪追击，就立即派回通信员，同

时袭击讨伐队，用自己的战斗把敌人引开，以保护支队。

托利亚·卡普钦斯基一接到任务，平日的那种无忧无虑、无所事事的劲头儿顷刻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首次接受战斗任务，使他既激动又兴奋。接受任务时，他对每句话都郑重地答之以“是”。随后他集合起侦察员，对他们讲了很长时间的话。拂晓时分，侦察小队离开了营地。

然而侦察员们没走多远，就在距营地半公里处的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敌人，并抢先开了火。

仅仅过了两分钟，全营地的人都起来了，和我住在一个帐篷里的是谢尔盖·特罗菲莫维奇·斯捷霍夫。他抢在我之前跑出了帐篷，率领值班排向枪响的方向奔去。

这样我只好留在营地，因为绝不能丢开电台和司令部的文件不管。

枪声越来越密。小河旁展开了一场真正的交战。

这时营地的另一侧也响起了枪声。而且子弹直接向营地打来。我立即派科切特科夫率一小队战士赶往那里，并布置了由其余游击队员编成的加强岗哨，以防敌人迂回包抄。

战斗的喧嚣和每一声枪响都在林中引起了巨大的回声。德国鬼子的嚎叫和游击队员呼喊的“乌拉”声清晰可闻。那“乌拉”声起初并不整齐，但渐渐地变得越来越谐调，越来越雄壮，完全淹没了法西斯匪徒的嚎叫，仿佛法西斯匪徒全被游击队员压在了身下。看来战斗进行得还顺利。然而毫无疑问，战斗中我们一定也会有人受伤。必须把采萨尔斯基找来！

“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大夫，”派出寻找他的人报告，“听说，他是第一个朝发生战斗的方向跑去的。”

斯捷霍夫派来的通信员带来消息说，法西斯匪徒企图偷

偷接近营地，不巧碰上了我们的侦察兵。斯捷霍夫告之，首批进犯之敌已被打散，眼下不需要增援。

“采萨尔斯基也在那儿。请转告他，我命令他即刻返回营地。”我对通信员说。

“奉您的命令，采萨尔斯基赶到。”十分钟后采萨尔斯基向我报告。

“谁允许您到战斗地点去的？”

“我想，我的位置应该在那儿。”

他肩上挂着毛瑟枪，看来，全部子弹都打光了。

“您是医生，您有自己的职责。伤员很快就会运到这儿。您把帐篷和器械准备好。今后您要永远记住，没有我的命令您无权离开营地。”

“是！”

枪声和人的呼喊声时起时伏，并渐渐远去。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正在击溃敌人。

战斗已经持续了两小时。我们的人追击溃逃的讨伐队，已追出了很远。于是我不得不派出通信员，命令游击队员返回营地。

这次战斗，对于支队来说，是一次战火的洗礼。二十五个游击队员直接参加战斗，击溃了一百六十名敌人。击毙四十多名敌讨伐队员，其中包括七名军官，缴获了一批重要的战利品——轻机枪、步枪、手榴弹和手枪。

当然在战斗中我支队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托利亚·卡普钦斯基牺牲了。

应该刻不容缓离开此地。讨伐队招来援兵随时都可能出现，那时我们的处境就会十分困难了。

和“大地”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因为这种联系决定着

整个支队的命运。因此我们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着报务员和无线电台。

转移时，我们给每个报务员配备了两名自动枪手作专门的警卫。当然他们还得帮助报务员背器材。报务员的器材虽说是便携式的，其实重量并不轻。它整整装了一个箱子，里面有收发报机、电键和“能源”——干电池。此外还带上一些备用电池和用过的电池——用于收听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在向穆霍耶德村进发。如果萨沙·特沃罗戈夫和帕顺还活着，他们会在那找到我们的。

在靠近穆霍耶德的一个庄子里，居民告诉我们的侦察员说，曾经有几个身穿联合服、头戴船形帽的人到过他们那儿，买过一些土豆、牛奶和面包，临走时这几个人说过他们还要来的。

我们决定设下埋伏。我派瓦利亚·谢苗诺夫带了一个由几人组成的小组进庄，嘱咐他们隐蔽在靠庄边的农舍附近。他们在那里一连等了六个来小时，终于路上出现了三个人影。侦察员们立即做好了射击准备，然而当这三个人走近时，谢苗诺夫却忘乎所以地大声喊了起来：

“伙伴们，这可是我们自己人——舍夫丘克、达尔别克、阿布德赖莫夫……”

侦察员们纷纷从设伏地一跃而起，奔上前去拥抱自己的同志。

几小时后，我们与帕顺和他的人会合了。

不久我们也了解到了萨沙·特沃罗戈夫及其小队的命运。

起初我们隐隐约约地听说，有几个勇士曾与一小队法西斯匪徒打过一仗。人们交口传送着这个故事，简直象谈论神

话，象谈论有关具有神力，战胜众多敌人的勇士的传说一样。还有人说这些勇士就是红军的空降兵，一共有十四个人。

我们越来越接近穆霍耶德村，关于红军空降兵的传说也就越发详细。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几个目击者，从而了解了他们的情况。

萨沙·特沃罗戈夫小队被空投到日托米尔以南后，立即从西部迂回过去，取道向北直奔支队集合地。

一天，游击队员们停留在一个村子里过夜。不料他们借宿的农舍被一支有几百人的党卫军的队伍围得水泄不通。一个党卫军的军官对游击队员喊话说，投降就能活命。

“布尔什维克从不投降！”特沃罗戈夫和他的同伴说着就从农舍的窗户向外开了火。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夜和次日的一整天。游击队员们打死了五十多个党卫军。然而他们自己十四个同志中只有五个活了下来。

第二天夜里，党卫军放火烧着了这间农舍。游击队员跳窗而走。他们都负了伤。一天一夜的战斗使他们精疲力竭，而且饿着肚皮，因此整整一夜才走了大约十公里。拂晓时分，他们发现敌人追上来了，于是跑到一个离得最近的村子里，躲进了村口的第一间农舍，并构筑了防栅。希特勒匪徒围住了这间农舍，从窗口往里射击，撞开了门，但却没能使五勇士停止抵抗。只是在五人中有三人壮烈牺牲时，法西斯匪徒才得以走进这间农舍。然而另两个人却不见了——显然他们奇迹般地跑掉了。根据农民们叙述的人物特征，我们知道牺牲的人中有特沃罗戈夫。

这就是当时我们了解到的有关他和他的战友的所有情

况。只是过了很久到了战后，特沃罗戈夫小队的一个叫科洛博夫的游击队员找到了我。原来，他和他的一个西班牙籍的战友——当时活下来的就是他们俩——跳窗跑走之后，被当地农民藏了起来。此后他们历尽艰辛和磨难才找到了另一支游击队，並在那支游击队里一直战斗到战争结束。

……七月二十四日夜里，支队接应了最后一个空降小队。

我们在宽阔的林中空地周围布置了警戒哨。傍晚在好几处垛起了干柴，备好了松节油。游击队员就地值班。篝火没点燃的时候，有人在低声地交谈着什么。间或会有人中断谈话，竖起耳朵听听飞机来了没有？

我们并非头一次等待和接应来自首都的飞机。但是每次与飞来的同志见面之前，内心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滋味：仿佛是莫斯科和我们的祖国亲自展开银色的翅膀飞临了我们上空，带来了我们内心所渴望、期待的一切——既有克里姆林宫红星闪烁的光芒，也有家乡的袅袅炊烟和亲人的问候。

马达的轰鸣声越来越响。接着飞机出现在林中空地上空。借着篝火那雪亮的光可以清楚地看见，飞机正在摆动机翼向我们致意，並一飞而过，以便迅速地掉转机头重新飞来。

“快，加油！”科切特科夫不停地喊着。

由于听到科切特科夫的喊声，看到熊熊燃烧的篝火，一张张显映在火光中的赤红的脸膛和这整个神话般奇妙的情景，人们都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一朵朵白色的伞花在夜空绽开了，随着距离地面越来越远，这些伞花变得越来越大，並呈现出绯红色。

飞机接着摆动了一下机翼以示告别，随后向东方飞走了。

着陆场上顿时活跃起来。跳伞的人刚一接触地面，就被地上的人托了起来。人们争相与他们拥抱，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一个走到我跟前来的是科利亚·普里霍季科。他显得有些腼腆，甚至在这熙攘忙乱的场面里有点不知所措。

“支队长同志，全小队抵达你处，”他腼腆地笑着说。

随后其他人也走了过来。

先走上前来的是一个名叫戈卢比的瘦弱的小伙子。站在勇士般的普里霍季科身旁一比，他的个子也显得很矮。

接着走过去的是科利亚·格涅久克、鲍里斯·苏亨科、中尉沃尔科夫和索科洛夫。

沃尔科夫是个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曾和我一起到勃良斯克森林打过游击，並负了伤，伤口愈合后就径直飞到了我们这儿。他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萨沙·特沃罗戈夫出了什么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也走了过来。他是特沃罗戈夫的老朋友，而且是由特沃罗戈夫介绍加入支队的。

早在首次与库兹涅佐夫见面的，这个外表沉着冷静，落落寡言、而内心充满热情的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所流露出的刚毅就深深打动了。我记得他一走进我的房间，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渴望飞到敌后去。

“我精通德语，”他说。“我想，我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个武器。”

“您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德语？”我问道。

提这么个问题并非多余。我曾遇到过不少自称掌握外语的人。其实他们仅仅有一些刚够阅读科学著作的书面知识，未必象我的谈话对手所说的可以成为一种武器。

库兹涅佐夫显然看出了我的疑虑，解释说：

“要知道，我不仅会说德语，而且会写。我很熟悉德语口语。我在德国人中间呆过很长时间……”

“您在德国住过？”我开始发生了兴趣。

“不，我没在德国住过，”库兹涅佐夫莞尔一笑。“我毕业于外语函授学院。就职业而言，我是工程师。我在乌拉尔机器制造厂工作时，就连那儿的德国专家也不愿相信我是俄国人。他们认为我是德国人，甚至还问我干吗隐瞒自己的民族出身……”

我注视着他，心里想他确实象德国人——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一双灰色的眼睛。

“懂德语的人还少吗！按照您的说法，他们都应该飞到敌后去喽？”

“我不仅仅知晓德语。”库兹涅佐夫不同意我的说法。

“我还对德国这个国家感兴趣，我读过许多德国的经典著作……”他稍稍一顿，补充说：“我还了解德国人。”

“好，可是您是否想到过，侦察员的工作是与何等的危险联系在一起。”

“只要需要，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他说道。

“吸收他加入支队吧！”特沃罗戈夫热切地坚持着。

“这准错不了！”

于是我同意了。

几天后库兹涅佐夫就从他工作的那家工厂脱身，着手准备工作。

他每天忙于与被俘的德军士兵、军官和将军们交谈。他的任务是详细地了解希特勒军队的结构，了解法西斯军官的习尚，而最主要的是尽可能细致地研究德国某一地区的地理

情况，以便需要时他可以冒充在那一地区出生人的。

这项准备工作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一般的士兵，就连支队的其他领导人——斯捷霍夫、帕顺、卢金也不了解库兹涅佐夫的情况。

和库兹涅佐夫一起学习军事的有尼古拉·普里霍季科、戈卢比、尼古拉·格涅久克和另几个志愿加入支队的人——他们均是西乌克兰出生的人。他们单独住着，仅在实施空投的前几天，索科洛夫和沃尔科夫才认识了他们。

库兹涅佐夫和大伙打过招呼后，就去到一边默默地听人们讲述有关萨沙·特沃罗戈夫的功绩。我发现，他的脸阴沉了下来。

回营地的路上，我和他两人走在一起。库兹涅佐夫默默地走着，既不发问，对我的问话也答得极简短。我觉得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

我虽看不到他的脸，可我觉得此刻在那张脸上一定凝聚着那种在莫斯科曾见过的刚毅的神情。那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知道自己该如何行事的人的全神贯注和坚定自信的表情。果然当我问到他今后的计划时，他回答说：

“我可以在城市里通行无阻地活动。可以说，我已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就连我的枪法也说得过去。在莫斯科我花很多时间进行了练习。”

“这很好。只是暂时还不需要您去射击。”

“为什么不需要？”

“您将承担另一种性质的任务。”

“那么好吧，”他不太情愿地同意了。我觉得我的答复使他有些扫兴。

然而我还要继续使他感到扫兴：

“我考虑了一下，暂时将不派您到任何地方去，”我说道。

“为什么不派？”

我第一次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他在焦躁不安。

“您得做准备工作。而且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您还需要安心地坐下来多学些东西，然后我们再开始用您。”

“那将是在什么时候？”他显然已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懊丧问道。

“再过两个来月到两个半月吧，如果您来得及准备好的话。”

库兹涅佐夫干巴巴地答道：

“是。”

(三)

罗夫诺市是法西斯的乌克兰“首府”，是希特勒指挥机构的中心，是法西斯占领军的达官显贵和高级军官聚集的巢穴。在这儿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到前线敌军的部署变更，新防线的构筑，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以至于在德国本土上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牢牢地在这儿站稳脚跟，并把自己的触须伸进罗夫诺。

在距离罗夫诺不过二十公里的地方还有另外一处要地——铁路枢纽站兹多耳布诺夫。从东线开往德国、捷克、波兰或从德国、波兰、捷克开往东线的火车都要经过该站。兹多耳布诺夫的战略地位使我们意识到，对于我们来说潜入车站，控制住兹多耳布诺夫枢纽该是多么重要。

于是我们从离我们最近，而且驻有大规模德军的两地——区中心萨尔内和克利索沃——开始行动。对这两地实施

侦察的任务交给了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科切特科夫率领的一支侦察小队。

科切特科夫很快就从附近的村子里找到了一些在萨尔内和克列索沃有亲戚、熟人的人。这些人都很乐意照他的吩咐去做。这样科切特科夫就有了一些很重要的助手。

其中有个人有一次对科切特科夫说，有个叫多夫格尔的克列索沃林区职员想见见他。他表示同意见面。

出现在科切特科夫眼前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剃着光头，身穿一套虽已不时兴，但却保存得很好的西服，打着—个精致的领结。透过一副椭圆形的嵌在铁框中的眼镜片，注视着科切特科夫的是一双凝神探究的眼睛。

“有什么事要说吗？”科切特科夫冷淡地问道。

“我要说的，可能您已经知道了。”

“是这样吗？”

“我是个苏联人，当我得知你们这里有游击队时，我决定要和你们并肩战斗。”

“似乎我们没有您参加也行，”科切特科夫回答说。他不怀疑，自己是在与一个敌人的间谍打交道。

多夫格尔明白过来了。

“不该把人们想象得这么糟，”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感到的屈辱，说道。“我在这里有家室——妻子、母亲、三个孩子。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你们可以为我的行为惩罚他们。”

科切特科夫踌躇起来。

“可是要知道您已上了年纪，”他沉默了片刻说，“您会感到困难的。”

“我并不请求接受我加入游击队。我只是完成你们交付我的任务，做一切你们认为需要我做的事。”

“好吧，”科切特科夫同意了。

次日，多夫格尔受领了一项任务：去罗夫诺，看看那儿的情况。他高兴地走了，前去执行任务。

多夫格尔从罗夫诺归来时带回消息说，德国人正在迫害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在白街大规模地屠杀居民。

“这是给您的地图，”多夫格尔在结束自己悲痛的叙述时，递给了科切特科夫一张市区平面图，上面画着许多小圆圈。这张图相当精确，是多夫格尔亲手画的。“这是帝国专署……”多夫格尔指着一个一个小圆圈解释说，“科赫的府邸在这儿，这个黑圆圈是盖世太保所在地，而这是法院大楼……”

“谢谢您，”科切特科夫由衷地说道，“太感谢您啦！”

“不客气。”多夫格尔干巴巴地应声说道，他不喜欢人们谢他。“我这并非是帮你们的忙，”他有一次对科切特科夫说，“我不过是象你们一样履行了一个苏联人应尽的义务。”

同科切特科夫一起去和多夫格尔接头的侦察员都叫他“科斯佳大叔”。他这个绰号后来在我们司令部也叫开了，甚至我有时也会把多夫格尔喊作“科斯佳大叔”。

多夫格尔经常和其他林务员一起被带领讨伐队的宪兵军官找去。

“我不知道，我没听说过游击队的事，在二十号林区的人好象见过他们，”多夫格尔照我们的指示对宪兵说。

我们当然早就不在二十号林区了。讨伐队往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挂破了衣服磨破了鞋子只不过在那儿找到几个用树枝搭起的半倒塌的窝棚和一些篝火的灰烬。

有一次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此后我们很久没有见到科斯佳大叔，于是不免开始有些为他担心。末了，他却自己

来到了支队。同志们纷纷问长问短，可他只是回答说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他请求科切特科夫，今后与他联系通过他的女儿瓦莉娅进行。

“这用不着吧？”了解多夫格尔女儿情况的科切特科夫有些疑虑。

“她才十七岁，”多夫格尔说道，接着又叹了口气补充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必须这样做。”

瓦莉娅看去还不到十七岁。她身材纤细、柔弱，长着一双象母亲一样的棕色的凝神的大眼睛，完全还是一个小孩子。她在维雷村的面粉厂当会计。给父亲与游击队充当通信员的角色倒是很合她的意。她竭诚地干了起来。

有一次瓦莉娅在预先约定的地点与科切特科夫碰头时，除了向他传达了父亲吩咐要转告的事外，自己还加了一点情况。

“我到过萨尔内，”她说，“那里到处是德国鬼子。一个什么后备团调到了那儿。”

“是步兵团吗？”科切特科夫感兴趣地问。他已经从自己的小伙子那得到了这一情报，他是想试试瓦莉娅作为一名女侦察员的能力。

“不知道，”姑娘老实地承认说。“但我向您保证：下次我一定会抓住其特征的。一言为定。”

确实，在下一次碰头时，瓦莉娅就向科切特科夫说出了近期内经过克列索沃车站往前开拔的军队的所有兵种。

“您干吗要到车站去？”科切特科夫问。

“这还要问吗？去了解一下过往的军列情况。我知道，您很需要这些情况。”

就这样，不管科切特科夫本意如何，瓦莉娅通过自己的

努力终于成了一名女侦察员。

于是科切特科夫第一次交给了她一项应独立完成的任务。

瓦莉娅开始经常走访附近的村子，出入萨尔内。这些地方都有她的女友。她很快就可以了解到托付她了解的各种情况，然后自豪地神采奕奕地讲给科切特科夫听。

多夫格尔知道了自己的女儿已开始独立工作后，对她的所作所为不太赞成。有一次在和我交谈时，他甚至抱怨起来：“才十七岁的女孩子，她哪行！还是让我来干吧。要知道，有我和你们在一起这是一回事……”

我很了解他的不安心情，他不想让这场极端残酷的战争触到他的女儿，从而使她受到伤害。难道我们可以因此而责备他吗？

(四)

沿着罗夫诺——科斯托波尔公路，走着三辆军用四轮大车。尽管拉车的全是健壮的吃得饱饱的马匹，可马车走得并不快。

头辆车上有一名德国军官。他正襟危坐，冷漠、轻蔑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个身着军服，袖缠白袖章，船形帽上有一枚三叉戟徽的人。

另两辆马车上坐得满满的，全是伪警察。他们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这个下身穿着军裤，可上身却是一件普通农村人穿的上衣；而那一个却又是下身着普通便裤，上身是军服。但他们所有人的袖章上清一色地全写的是：“安全警察”。农民们把这种袖章叫作“鬼符”。

第一辆车上的德国军官和那个看上去年岁大些的伪警察

坐得挺正规。可后面两辆车上的伪警察却懒洋洋地叉腿躺着，嘴里边哼小调边吞云吐雾地吸着自制的烟。

这情景倒也司空见惯。这群匪徒在法西斯军官的带领下准是又要到哪个村里去作践不驯服的居民的。

公路笔直伸向远方，一览无余。两侧是农田和草地，再远处就是森林。道路上车来车往相当频繁。不时有德国人的载重卡车和小汽车从马车边急驶而过。每当有汽车超过马车或迎面驶来时，马车上的那个德国军官就坐得更直了，同时恶狠狠地叱骂着那伙哼哼吱吱的伪警察，并把右手向前一伸，向迎面而来的德国人致意。很明显，当他的同伙乘着舒适的汽车到处兜风的时候，他却和这群低级人种坐在马车上，这使他感到非常厌恶。

这三辆马车已经在公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他们的出现惊动了沿途各村的居民。老百姓一看见他们，纷纷躲进农舍，并提心吊胆地从窗口向外张望。

公路前方出现了一辆红色的大型轿车。这段公路的两侧都是农田。这时马车上的德国军官欠起了身子，留神地环顾了一下四周。除了这辆轿车外，公路前前后后空无一人。只见他迅速地向后面的马车转过身去，举起了一只手。歌声和喧哗声嘎然截止了。

轿车驶近了。和德国军官并排坐着的那个伪警察，一纵身跳下车来，迅速向前走去。汽车刚一驶到他身旁，他便从容不迫地仿佛在搞训练似的把一颗手榴弹向汽车投去。爆炸声从车后传来，但这辆豪华的奥培尔——海军上将牌汽车还是翻进了路旁的排水沟……

在后两辆马车上哼歌的年轻人纷纷跳到地上，手握武器扑向翻倒在地的汽车。指挥这批“伪警察”的德国军官已经

站在汽车旁。

“好样的，普里霍季科！”他用俄语对那个扔手榴弹的“伪警察”说。“你计算得真准，车翻了，坐车的人都活着。”

当人们从汽车里拽出了两个吓得屁滚尿流、丧魂落魄的法西斯匪徒时，那个军官模样的人又和他们说起了德语：

“先生们，请不要惊慌。我是德军中尉保利·齐贝特。请问，我这是有幸在与什么人谈话？”

一个长着一头红头发，脸上有几粒粉刺的上了年纪的军官回答说：

“我是少校哈恩伯爵，帝国公署的处长。和我在一起的是，”他指着另一个人说，“从柏林来的帝国通信顾问赖斯。”

“那太令人高兴了，”中尉说，“你们的汽车遭殃了，请坐我们的马车吧。”

“请您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伯爵要求说，“我真是莫名其妙。”

他还打算问问情况，但中尉向他手下的人点了一下头。于是他们抓住了那两个法西斯匪徒，捆住了他们的手，把他们扔上了马车。

马车走到第一个转弯处就离开了公路拐向一侧，于是很快就来到了我们游击队的一处“了望站”。这时那个德国军官换上了联合服，还自己以本来面目——原来他就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

此前库兹涅佐夫把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都用于了研究各种情况，用于与侦察归来的同志和哨兵拦住的当地居民长谈。但他最感兴趣的是俘虏的希特勒匪徒。在决定冒充普鲁士人之后，他反复地阅读了能搞到的一切有关东普鲁士，有关东普

鲁士的经济、地理、居民情况的材料。于是他终于做到了对东普鲁士这一地区及其中心——克尼希斯贝格市了如指掌，仿佛他本人是在那儿出生并过了一辈子似的。

与被俘希特勒匪徒的交谈极大地促进了他的研究和准备工作。

但我们所抓到的俘虏中没有一个人能使库兹涅佐夫感到满意。

“简直不是正常人，而是些大傻瓜！”有一次与俘虏谈话后他对我说。“都是些木头人。除了‘希特勒万岁’和‘希特勒完蛋’，别的一问三不知。你要想问点重要的东西，他们就啪地一个立正，双手紧贴裤缝地说：‘我是士兵，不懂政治。’这种谈话真令人讨厌。”

“我从哪儿能给您弄个教授来呢？”我笑着反驳他说。

“我倒是能够弄到一个真正的‘舌头’，知道很多情况并说得出来的长‘舌头’。”

“怎么弄？”

“我想搞一次行动。问题是要得到您的批准。”

于是“机动设伏”的谋计形成了。

正象一般的军事教科书上所指出的，通常的设伏实施办法如下：战士们隐蔽在一定的地方等待敌人的出现，然后袭击敌人。然而如果给你一条平坦的公路，周围全是农田，你在哪设伏？这就是为什么库兹涅佐夫决定搞一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乘马车的“机动设伏”。

他确实没看错这辆漂亮的“奥培尔—海军上将”。这辆车上的乘客，正是他感兴趣的猎物，两个真正的长“舌头。”

回到营地后，库兹涅佐夫到俘虏那去时依然穿的是那套

德军中尉制服。他按照德军中规定的礼节，向他们并足行敬。

“请坐，”哈恩少校指着一根圆木，愁眉苦脸地对这个礼貌周到的中尉说。帐篷里没有别的可坐。

“你们感觉如何？”库兹涅佐夫客气地问道。

然而这两个俘虏的态度远不是那么宽容。

“请告诉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你们是在俄国游击队的营地里。”

“为什么您，一个德军军官，却与我们的敌人入伍？”

“我是俄国人。”

“您干吗不讲实话！”伯爵被激怒了。“您是德国人，您背叛了自己的元首！”

库兹涅佐夫决定将计就计。

“我认为战争已经输了。希特勒正在把德国引向毁灭。我自愿投奔了俄国人，我建议你们也要做一个识时务的人。”

俘虏们没有执拗多久，很快库兹涅佐夫就与其开始了直言不讳的谈话。库兹涅佐夫也刚好可以借这两个谈话对手来检验一下自己和自己的德语知识。况且哈恩伯爵原来还是库兹涅佐夫的半个“同乡”，他在克尼希斯贝格住过。

在俘虏携带的许多秘密文件之中有一张地图，上面详细地标着希特勒匪徒在乌克兰领土、波兰领土，以至在德国本土上的全部交通线和通信手段。库兹涅佐夫在研究这张重要的地图时注意到图上有一条其意义不甚明了的线。这条线从位于文尼察市以西十公里处的亚库申齐和斯特里热夫卡两村间开始，延伸到柏林一带结束。

在这两个乌克兰村庄和希特勒德国的首都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无论是哈恩伯爵，还是帝国通信顾问赖斯久久不愿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国家机密，”哈恩说。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这条从柏林至亚库申齐的线就更感兴趣。库兹涅佐夫受命对俘虏严加审问。

“这是一条多股的地下铠装电缆，”最后赖斯在库兹涅佐夫顽强的目光威逼下说道。

“为何铺设这条电缆？”

“用以沟通柏林和亚库申齐的联系。”

“这我在地图上已看出来。我指的是，为什么要与亚库申齐沟通联系？”

“元首的大本营设在那里，”帝国顾问懈怠地说道。

“地下电缆是什么时候铺设好的？”

“一个月以前？”

“什么人铺设的？”

“俄国人。战俘。”

“你们怎么肯让俄国战俘知道希特勒大本营所在地的秘密？”

“他们已不会对此构成威胁。”

“您指的是什么？”

俘虏沉默起来。

“您指的是什么？”库兹涅佐夫的脸色顿时变了，又重问了一句。“把他们都消灭了？”

两个俘虏依然沉默不语。

“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战俘吗？”哈恩低声含混地说了一句。“一万二千人。”

“一万二千人全部都……”

“这是盖世太保干的。”

“可这是一万二千人啊！”

“这是盖世太保干的！”两个法西斯匪徒重复地申辩说。

库兹涅佐夫生性善于控制自己。我从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提高过嗓门和发火。但这次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了。那些逐渐在他心中郁积起来的怒火，一下子奔放了出来，变成了不可遏止的复仇渴望和用自己的双手亲自消灭那些法西斯恶魔的意念。

从这一天起，库兹涅佐夫请求派他深入罗夫诺去的愿望日见弥坚。

“我已准备好了，”他证实说。“瞧，就连这两个希特勒匪徒对我是德国人这一点也不曾有过怀疑。”

事实上，与哈恩和赖斯的接触成了对库兹涅佐夫准备情况的最好检验。他不仅对德语精通，而且完全掌握了一个普鲁士容克家庭的富裕后裔、一个享有特权的军官的言谈举止。

说到语言，库兹涅佐夫简直是一个天才的语言学家。在抵达营地之前，他对乌克兰语一窍不通。可到了乌克兰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通过访问当地村庄和与乌克兰籍游击队员的交往，他很快就掌握了乌克兰语，还学会了儿首乌克兰语歌。农民都认为他是一个地道的“霍霍尔”^①。而当我们到那些

^① 即乌克兰人。

波兰人聚居的地方去时，库兹涅佐夫就与他们说波兰话，甚至还唱波兰国歌。

如果不是有某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引起我们不安的话，那完全可以毫不拖延对库兹涅佐夫的派遣。其中的一个细节问题就是，他有时说梦话，而且说的是俄语。

“这可能会暴露您，”我对他说。“您应该把俄语完全忘掉。不错，就是要忘掉。只说德语，用德语思维。无人可用德语交谈吗？您去找采萨夫斯基与他谈吧。”

“好吧，”库兹涅佐夫同意了。“我努力去做。”

他属于那种很少谈自己，而且重行动轻言谈的人。我对他的了解越深入，就越清楚地看出，他孤僻的原因不是出自城府极深，不是自命不凡，而是谦虚——一种没有在生活中做出惊人之举的人的自然的谦虚。他认为自己的经历平庸无奇，因此他时常羡慕那些其生活充满急风暴雨、饱经变故、比他生活得更有意义的人。

(五)

罗夫诺曾是一座沉寂的为绿荫复盖、整日沉缅于微睡中的西部乌克兰城市。一座座带有小花园的不大的房屋，人迹寥寥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街道和这里的一切都仿佛是特意作为一种和平、安逸的生活而设计的。俄罗斯作家科罗连科在本世纪初来到这里时，曾把这座城市称作“慵懒之城”。看来这个词组再准确不过地既道出了这座城市的面貌，又概括了它的生活节奏。

在罗夫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一年半里，这座城市苏醒了，人们开始改变它的风貌。罗夫诺变得喧闹起来，开始有

了发展。一座座崭新的工厂厂房、学校、俱乐部、医院和新的居民住房出现了。城市居民达到五十万人。到战争爆发前，罗夫诺已拥有十八所中小学、二个剧院、许多俱乐部和图书馆。一座新型苏联城市的面貌正在形成。此时它已不再是一座慵懒的非行政中心的小城，而成了州的工业、文化中心。同时，它还保留了那绿荫如盖的街道的魅力和那些使人产生思古幽情的纪念碑。

因此，德国占领军毁坏这座城市的行径是人们不能容忍的。德国占领军把这座城市变成了“自己的首府”似乎给它带来了“荣誉”，其实却扼杀了它。大量的法西斯匪徒麇集在罗夫诺。其中既有军人、官员及其家属和赶到这里来“攫取东方空间”的德国地主，也有在柏林出生的“乌克兰人”和各种各样潦倒、落魄的人。所有这些面目迥异的芸芸众生在街上来来往往，在所谓的娱乐场喧哗吵闹，到处兜售叫卖。在餐厅、机关，甚而在大街上到处都在进行着交易。影剧院的门前赫然摆着足有一层楼高的大广告牌。上面十分拙劣地画着正在淫荡地微笑着的德国女影星。每逢夜晚，那里便聚集起一群群的军官、浓妆艳抹的妓女，身穿硬领衬衣头戴圆礼帽的商人。于是从窗口便飘逸出阵阵造作的色情乐曲，并不时地夹杂着正在消遣的军官们发出的声音……然而整座城市却仿佛死去了一般。

普里霍季科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总觉得仿佛走在一个埋葬着他最心爱的东西的墓地里。他几乎每走一步都能看到这样的文字：“德国人专用”。罗夫诺的绿荫哪里去了！在那些原先长着树木的地方戳着一些树桩。普里霍季科扫了一眼战前他曾在那里看过《纳塔尔卡·波尔塔夫卡》的剧院大楼，现在那已不是剧院，而成了存放劫来之物的仓库……在

入口处，一个哨兵声色俱厉地拦住了他。

……尼古拉·普里霍季科是我们派往罗夫诺的第一个人。之所以派他去，我们主要考虑到他是本地人，熟悉这座城市，并且在城里有一些好朋友和熟人。他的一个亲兄弟也在那里。当然我们考虑到的不仅是这些。普里霍季科具有勇士般的气力和耐力。任何东西也吓不倒他。他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如果说在转移的行军时，侦察员比其他游击队员多走两倍路的话，那么普里霍季科所走的路就比别的任何一个侦察员都多。因此，一旦需要完成一项紧急任务时，我们总是启用他。

到罗夫诺去是普里霍季科的宿愿。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惦记着这件事。有一天，我刚走出“丘姆”——这是我们给自己用罗汉松枝搭起来的，其形状颇似普通的锥形兽皮帐篷的窝棚所起的名字，迎面看见了普里霍季科，于是我问他有没有做好潜入罗夫诺的准备。

“当然，一切准备就绪！”他兴高采烈地回答道。“您完全可以放心。”

对他完全放心，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该让他穿什么衣服，以什么模样出现在城里？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总算给科利亚找到了衣服。上衣和裤子稍微有点小。合他脚的皮鞋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只好让他穿着靴子上路，不过裤腿散在外面。

普里霍季科前往罗夫诺时还随身带了一张身份证。上面写有：“来人格里岑科系连钦村居民。”

从营地到罗夫诺市有一百二十公里。往返就是二百四十公里。普里霍季科全部步行。预计他应在六至七天后返回营地。

他一点也没延误，准时返回。老远地看见他那魁梧的身影出现在树丛中时，我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第一次派遣成功了。这对我们可是一件重大事件。

普里霍季科简单如实地汇报了他此行的结果。尽管他说得不多，我们都明白，这座他熟悉、热爱而此刻却变得死气沉沉的城市留给了他一个多么沉痛的印象。

在每条街道的拐角处都竖起了一些新的路标牌，上面用德文写着“威廉大街”、“德国大街”一类的字样。普里霍季科说，在市中心的一些大街上住的全是清一色的法西斯匪徒。原来住在那儿的当地居民全被强令搬出。屋里的家俱和多年积攒起来的财产全部归新房主所有。不仅是将军，就连一般的上尉军官也都住上了独门独院的私邸和最好的住宅。他们在德国的许多亲属也蜂拥而至，象野兽一样掠夺被赶走的人的财产。同时这些新“主人”在搬进腾空的住宅后，又立即把原先住在那里的姑娘和半大的孩子、男人和妇女押往遣送集合点，让他们去给法西斯服苦役。

普里霍季科到城里的兄弟家去了一趟。他们从战争爆发之时起就没见过面。结果现在，他们一个是游击队员，而另一个……另一个却在为占领者服务。确实，伊万·普里霍季科在为希特勒匪徒服务，并且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还娶了一个德国女人为妻。希特勒匪徒宣布对有“德国血统”的人进行登记注册时，伊万和他的妻子认为从中可能会得到好处。于是他妻子作为德意志人进行了登记。从那一天起，伊万及其全家都开始领取配给品，并享受到了一些其它的福利。法西斯匪徒还让伊万当了面包房的头。

两兄弟相互问了问情况后，很久都没有说话。最后还是尼古拉直截了当地提了一个问题：

“你是要帮助游击队，还是继续去吃敌人给的残羹剩饭？”

伊万没有马上回答。他对兄弟的问话思索了良久，反复衡量着该怎样回答。他明白，如果他答应照尼古拉的建议去做，可能失去的不仅是有油水的职位，还要掉脑袋。

但他还是答应了。

他的妻子也答应要帮游击队的忙。她登记当“德国人”只是为了领一份口粮。

于是从那天起伊万·普里霍季科在水沦大街6号的住宅，就成了游击队的秘密接头点。不久伊万也学着妻子的办法注册为德意志人。当然，他这样做是执行我们交待的任务。

普里霍季科还到兹多耳布诺夫车站去了一趟。他在那里找到了几个老朋友，并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当普里霍季科结束了他那词句简短的报告时，我问他：

“他们在什么地方检查过你的证件吗？”

“还用问，检查过。共有三、四次。一切顺利，没出任何问题。”

这同样也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在科利亚之后，我们决定再派另外几个侦察员到罗夫诺去。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几处可靠的堡垒户并查明罗夫诺有哪些德国机关，分别设在何处。我们先给波利卡尔普·沃兹纽克打点了行装。随后又派出了邦达尔丘克，他也是当地人。没等他们返回，我们又向罗夫诺派出了科利亚·斯特鲁京斯基。他带有一张盖有科斯托波尔市议会大印的证件，证明证件持有者系教师，前往罗夫诺出差采购德语课本。我们这回给斯特鲁京斯基找了一件漂亮便服。他穿上以

后，连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对着他看出了神。

斯特鲁京斯基一家可成了我们支队的无价之宝。斯特鲁京斯基家的人都对自己的家乡了如指掌，而且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有亲戚和熟人。而最主要的是他们全都很熟悉罗夫诺的情况。

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地适应了游击队的环境，很快地与同志们打成了一片，並得到了游击队员给起的绰号，这是大家对他们表示赏识的可靠标志。

人们把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叫做“老静”。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好静的人。如果说起初，我们对这年轻的连唇须也没长的面颊绯红的小伙子竟能指挥一支游击队，尽管是支很小的游击队，曾表示过惊讶的话，那么现在，这就丝毫不足为奇了。在第一次与敌遭遇时，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敢和惊人的镇静。他的绰号“老静”正由此得名。

对仅比尼古拉小一岁的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起初我们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象所有斯特鲁京斯基家的人一样，若尔日也长得墩墩实实，有一双天蓝色的眼睛和一头淡色头发。他和哥哥的区别仅仅在于他比哥哥的个子稍矮些，看去他的性情更其恬静、平稳。若尔日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摇摇晃晃。“真笨”，有一次在谈到他时卢金说道。于是“老笨”便成了他的绰号。

在若尔日参加了最初的几次战斗行动之后，人们一谈起他都说他是一个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若尔日是一名百步穿杨的神射手。他常常是端着自已那挺从坦克上卸下来的机枪，昂首挺胸边走边向敌人射击。

斯特鲁京斯基三兄弟中的老三，沃洛佳，只有十七岁。

开始我们把他安排在管理排，因为他有点聋。但沃洛佳提出了抗议，说想和大伙一起去打仗。于是只好发给他武器，让他到科利亚·法捷耶夫的排去。法捷耶夫本想把小伙子留在营地，怕他在战斗中听不清口令。但沃洛佳是那样的渴望战斗，法捷耶夫最终经不住他再三要求带上了他，并且没有因此而懊悔。

沃洛佳象若尔日一样，非常喜欢摆弄武器。几乎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忙活他那支卡宾枪，他总是把它拆了擦洗，然后再重新装好。

斯特鲁京斯基老汉被任命为管理股副股长。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去筹集、准备食品。在这件事上没人能比得上他。他既精通乌克兰语和波兰语，又比任何人都会与每一个主人谈生意。斯特鲁京斯基老汉所到之处，人们总是特别愿意向我们提供土豆、蔬菜、面粉、麦米和其它一些食品。这并没有妨碍斯特鲁京斯基老汉参加另一种类型的准备工作，即游击队袭击敌人仓库和车队的准备。这时他也有自己的岗位，他的步枪打得非常准。看来，斯特鲁京斯基兄弟几个都是优秀射手与遗传很有关系。

斯特鲁京斯基老汉知道我们要派科利亚到罗夫诺去之后，有些不安。他很爱自己的儿子。整整一天他都在不断地叮嘱尼古拉。

过了两天波利卡尔普·沃兹纽克回来了。他很兴奋，迫不及待地报告了在罗夫诺了解到的所有情况，还讲述了他所遇到的事。原来，他找到了一个在德国代售商行工作的熟悉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告诉沃兹纽克说，有一个盖世太保的间谍每天都到商行来。沃兹纽克在商行的入口处一连守候了两天，直到同伴把那个往里走的着便衣的盖世太保特务指给他

看为止。沃兹纽克没太加思索地朝他开了几枪，把他撩倒后就急忙逃走了。他穿过街道时，迎面碰上一辆里面坐着两名希特勒匪军官的小汽车。于是他又朝汽车摔了两颗手榴弹，然后跑进一家庭院，翻过栅栏，成功地躲了起来。当我们问道，汽车里的法西斯匪徒是什么人时，沃兹纽克答不上来了。他还不认识德军军衔。

讲完这一切，沃兹纽克笑了。我发现在他讲述的过程中他一直想笑，可是忍住了。他显然在等着我们的夸奖。

然而使沃兹纽克惊讶的是，他非但没有受到夸奖反倒挨了一顿剋。卢金责备地看着他，低声但却一字一顿地说道：

“傻脑壳，是谁让你这样做的？派你去，是让你悄悄地小心地在各条街上走走，看看盖世太保在何处，其它德国机关又在哪，然后再悄悄地回来。可你呢？你不仅没完成任务，反而在城里打草惊蛇。现在他们又要搞大搜捕，找每个人的碴儿了。为了一个卑鄙的盖世太保间谍，我们的人民可要遭殃了。瞎逞能！”

“怎么，不该打死他们那些恶棍吗？”他迷惑不解地嘟哝着。“那我们还叫什么游击队员？”

正在我们与沃兹纽克谈话时，瓦利亚·谢苗诺夫来了。他先默不作声地听完了我们对沃兹纽克讲的话，然后用他那通常开玩笑的腔调径直说道：

“这下我们可在罗夫诺出名了吧，老弟？”

沃兹纽克耸了耸双肩。

“嘿，你可真是一鸣惊人。”

这样，“一鸣惊人”就成了沃兹纽克的绰号而叫开了。

过了几天邦达尔丘克也回来了。他找到了一处可用于秘

密接头的宅邸，别的什么也没能干成。他在城里的处境有些困难。战前他曾在那里工作过，这次在街上遇到了许多熟人，他们自然纷纷打听他现在在干什么。后来他不巧碰上了一个叛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脱身。

我们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科利亚·斯特鲁京斯基身上。他沉着、机智、敏捷，应该能搞到一些情报，以使我们能立刻确定我们的人在罗夫诺开展工作的各种可能性。

斯特鲁京斯基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他不仅详尽地回答了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而且说了一些他自己有关适当开展工作的意见。他与城里的许多人取得了联系，并预先得到了他们帮助我侦察员的允诺，甚至他还通过这些人弄到了一些证件的样本，有了这些证件游击队就可以自由出入该市了。

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有价值的是尼古拉搞到的那些证件样本。

“噢，你的那个证件怎么样？”这时我关切地问道。

“他们检查过。没问题，它简直比真的还要真。”

(六)

晚会还在继续进行时，库兹涅佐夫就把我拉到了一边。他所说的当然还是先前已说过的那些要求，没有什么新的出乎我意料的东西。不过这次他说话时的态度更坚决了。

“我请求立即派我去罗夫诺。我以为，最高统帅有关与法西斯恶棍算账的话首先适合我的情况。当然，这些刽子手或迟或早总要受到惩罚的。但我根据情况现在就有采取行动的可能。我请求您不要剥夺我的这种可能性。”

这样一来，再不派他去罗夫诺已不可能了。

“好吧，库兹涅佐夫，您去准备一下。”

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但是请注意，”我接着说道，“您不要以为，您可以在街上四处走动和随便射击。您不应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您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射击。您是一名侦察员，您的任务是攫取有关希特勒匪徒的情报。这远比在街上制造混乱，引起轩然大波要困难得多。”

“我明白，”库兹涅佐夫低声说道。

他明显地变得沮丧起来。也许，此刻他正想象着自己身着德军制服大摇大摆地走在罗夫诺的街头。如果在这里，在支队他常常因不能积极地去打击法西斯万恶之徒而感到苦恼，那么在那儿，在城里，在他不得不与之一起生活的希特勒匪徒中间他又该是多么痛苦！

“这对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说道。“它要求您有巨大的自制力。鬼知道您将会与什么人打交道，因此即使在您十分想用双手扼死刽子手时，您也必须在脸上保持着愉快的微笑。”

“我明白了，”库兹涅佐夫又说了一遍。“是的，我正准备这样去做。”

为了以后能够随心所欲地行动他可以去做许多承诺。我们使他打消了那样做的念头。尽管如此，库兹涅佐夫依然很高兴，因为毕竟把他派往罗夫诺了。我看出了，这个一向矜持、外表沉静的人内心是如何激动。凝视着他，我又想起了自己领受党交付任务的那一时刻的情形……

我们决定让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斯特鲁京斯基与库兹涅佐夫同行。老汉在城里有许多亲戚，他可以把他们

介绍给库兹涅佐夫。

这些日子凡了解库兹涅佐夫此行的人都十分激动。然而他本人在同志们面前却表现得象没有什么事儿一样，不知是他在哈恩和赖斯把他认作真正的德国人之后对成功充满了信心，还是在巧妙地掩饰着自己内心的不安，他总是带着一种体谅的微笑注视着我和斯捷霍夫、卢金在研究他服装上的每一个细小的问题，注视着我们如何换来换去地往他穿的制服上别领章和勋章。制服是缴获来的，我们把它按照库兹涅佐夫的身材稍稍修改了一下。于是他穿上去很象那么回事。当终于给他找到了一双合脚而漂亮的皮靴和弄到了一枚民社党党员的证章时，我们都高兴极了。可库兹涅佐夫对此却十分冷淡。他想立刻出发，而我们的这些准备工作耽搁了他。

关于库兹涅佐夫此行的任务，我们对全支队人员严加保密。即便我们的队伍里混进一个法西斯派来的间谍，他也不可能知道有关库兹涅佐夫的情况。不管在营地的条件下保守秘密是何等的困难，我们还是严格地执行了不该知道的决不打听的规定。

如果说库兹涅佐夫没有感到或者没有表现出内心丝毫的不安，那么他的同伴斯特鲁京斯基老汉开头几天就显得有些坐立不安了。

对于斯特鲁京斯基老汉来说，前往罗夫诺确实带有不小的冒险性。城里很多人都认识他，都知道他是游击之家的一家之长。所以此行对于他是一项异常重大的任务。我在他的激动和不安中没有发现任何不体面的因素。但是，在他们临行的前一天我还是对他说：

“斯特鲁京斯基老汉，也许确实不该派您去？”

“为什么？”他急切地问道。“既然您已经说了，那我一定要去，我会去做应该做的一切。”

那几天人们都不知道他和库兹涅佐夫是何时睡觉的。他们俩白天忙于各种准备工作，晚上和夜里又常常避开其他同志，在林中踱来踱去，或坐在什么地方树墩上注意力集中地交谈着。

老斯特鲁京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到罗夫诺去坐的是军用四轮大车：老汉化装成车夫，库兹涅佐夫则化装成一名后勤军官。他自己写了证件的行文，交采萨尔斯基用打字机打出，让卢金签了字。证件证明说，他，保利·齐贝特中尉，军需官，负责在罗夫诺市的路德维波尔和克列索沃一带筹集粮食。证件还要求全力协助保利·齐贝特的工作。

在距罗夫诺大约十八公里处，他们在老斯特鲁京斯基的一个亲戚瓦茨拉夫·日加德洛的家里停了下来。日加德洛问明情况后说：

“请吧，我这儿你们尽管利用。什么时候来都行。不过你们要谨慎行事，否则无论是你们自己还是我都会遭殃。”

快到罗夫诺时，老斯特鲁京斯基又在一个亲戚家停了一下。他们把马车留在那里，然后步行进城。

进城后他们分开而行：库兹涅佐夫走街道的一边，老斯特鲁京斯基走街道的另一边。

老汉后来在谈到当时的情形时，仍久久不能平静：

“我走着走着腿和手都抖了起来。我想，我很快就会被他们抓住。一看见宪兵或伪警察，我就不由地扭过脸去。老是感到仿佛所有的人都带着怀疑的目光盯着你。可我一瞧，库兹涅佐夫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他不时地停下来念念各种机关门前的牌子，在商店的橱窗前逗留一会儿——一副满不在

乎的样子。每每遇上德国人，他还伸出胳膊用德语喊一声：‘希特勒万岁！’他带着我在城里兜了四个来小时。无论我怎样向他发暗号，用手擦鼻子——这是事先约好的‘到此为止’的意思，可他还是一个劲地逛个不停。简直胆大包天！”

在罗夫诺，斯特鲁京斯基还介绍库兹涅佐夫认识了自己的另一个亲戚——卡济米尔·东布罗夫斯基。东布罗夫斯基开着一间修理马鞍和挽具的不大的马具作坊。他同意帮助游击队，并向库兹涅佐夫和斯特鲁京斯基老汉发了誓。应该说，他恪守了自己的诺言。

晚上六点以后街上宵禁。因此库兹涅佐夫和斯特鲁京斯基老汉适时地出了城，坐上四轮马车返回了营地。

库兹涅佐夫对此行非常满意。他的出现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这也就是说，他这个德国军官扮演得非常出色。不过他的服装并非一点破绽没有。他穿的是夏服，可德国军官此时已穿上了大衣和袂斗蓬。他头上戴的是船形帽，可船形帽只有前线的军人才戴。在罗夫诺大多数军官戴的是大盖帽。

第二次派库兹涅佐夫去罗夫诺之前，我们为他搞到了一套新制服。

经过第一次的试验后，库兹涅佐夫开始经常出没于罗夫诺。通常是他与科利亚·斯特鲁京斯基或科利亚·普里霍季科一同前往，並有时在伊万·普里霍季科家，有时在卡济米尔·东布罗夫斯基家歇脚。

库兹涅佐夫开始在餐厅和商店里结识德国人。他有时顺便与他们谈上几句，有时则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通。那时整个罗夫诺议论的中心是伏尔加河的战斗。德国人惊恐不安。他

们曾不止一次宣称，伏尔加河的要塞已经拿下。可是战斗却依然在不停地继续。即使从戈培尔发布的战报上也看得出，希特勒匪徒没有取得胜利。并且有消息说，保卢斯的集团军已陷入苏军的合围之中。

在向罗夫诺派出库兹涅佐夫的同时，我们还派出了一些其他的同志。当然，通常他们相互之间都不知道我们何时派了何人去罗夫诺。我们还告诫那些前往罗夫诺的人，如果遇上了自己人，既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打招呼，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即可。

有一次我们决定让库兹涅佐夫特别舒适地去一趟罗夫诺。我们搞到了两匹漂亮的善跑快马——带有黑色斑点的灰马——和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我让斯特鲁京斯基老汉把马匹交给库兹涅佐夫。他打扮得越气派，也就越安全，因为别人也就不敢拦阻他。考虑到这一次库兹涅佐夫要在城里逗留数日，我嘱咐他，进城后就把马扔掉。

斯特鲁京斯基老汉恳求我说：

“把这么好的马扔掉！真是作孽！让我把它们藏起来吧。”

他百般地请求和劝说我，几乎差点哭了出来，然而我没有同意。库兹涅佐夫还是乘着那两匹好马拉的车出发了。给库兹涅佐夫当驭手的是科利亚·格涅久克，他还另有侦察任务。

过了三天，我们在城里的侦察兵马茹拉和布什宁突然驾着我们给库兹涅佐夫的那两匹快马的马车回到了营地。他们俩本应是常住罗夫诺，奉召才回支队的。

我真有些不安了。马茹拉和布什宁都不认识库兹涅佐夫，更不知道我们派了一个身着德军制服的人去罗夫诺。他

们怎么会碰到一起的？是谁把马和马车交给他们的？莫非出事了不成？

我迅速地向来者走去，斯特鲁京斯基老汉却已在喜出望外地伺候他的马了。

“出了什么事？”我问马茹拉。“你们从哪儿弄到的这两匹马？”

“说来话长。是我们从德国人那偷来的。”

“怎么回事？”

马茹拉不慌不忙地拉着我走到一边，笑咪咪地讲了起来，可他的笑使我直想发火：

“我们住在秘密接头点，正准备返回营地。突然看见窗外有一辆套着这两匹马的马车驶来，车上坐着一个德国人，还是个军官。他下了车就走了。驭手卸下了笼头，往马头上套上饲料袋后也走了。我和伙伴寻思开啦：我们干吗要走回营地！于是偷了马，赶了回来。我们在“了望站”歇了一夜就到这儿了。支队长同志，说实话，这两匹马不赖吧？”

“马是好马，不寻常的好马！好样的！不过德国人不会感激你们的，”我说道，总算强忍着才没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从无线电里收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异乎寻常的消息：希特勒在伏尔加河流域的精锐集团军已被苏联军队全部击溃。

不久，我们听说，法西斯匪徒宣布了一起丧事。按照帝国专署的命令三天内禁止任何娱乐活动，德国男人应左臂戴黑纱，德国女人将着丧服。任何人都没说明为何服丧，因此人们开始纷纷议论，说好象是希特勒死了。

我们同样也不清楚德国人服丧的原委，直到库兹涅佐夫从罗夫诺回来后才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希特勒匪徒是在为

在伏尔加河流域被歼灭的三十万军队吊丧。

库兹涅佐夫报告了他最近一段时间在罗夫诺了解到的所有情况。敌人经过罗夫诺车站和兹多耳布诺夫车站的调动异乎寻常地增加了。铁路和公路上塞满了从德国运往东方的军队和从东方向西开行的伤员专车。

在他带回的消息中，有一则与我们直接有关，那就是：帝国派驻乌克兰的全权代表科赫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无情镇压乡村和各区拒不交纳实物税和钱款税的村民，在罗夫诺市地区肃清游击队。

(七)

形势变得紧张起来。毋庸置疑，紧跟科赫关于肃清游击队的命令公布之后，一场对萨尔内森林地区的新围剿就要开始了。法西斯匪徒调兵遣将，聚集了大量的兵力。

万一讨伐队迫使我们撤离已呆惯的地方，我们必须找一个新的栖身之地。我们决定到卢茨克地区去寻找这样的地方。

一支由六十五名游击队员组成的队伍在弗罗洛夫少校的率领下整装待发。全支队的同志都参加了这次的集合。知道他们这支队伍行动路线的人不多，但是他们将面临着长途艰苦的跋涉这一点所有的同志都猜到了。游击队员们关切地帮助要出发的同志预备上路用的东西，纷纷把自己的厚衣服和结实的鞋送给他们。

他们的行程确实是漫长而又艰难的：往返各二百公里，全都是泥泞的道路，而且风餐露宿，人地生疏，情况不明。

这支队伍的任务不仅是给支队寻找合适的备用驻扎地，

而且同时要侦察卢茨克市内的情况，弄清那里都有哪些德国人的机关、卫戍部队和司令部。为此弗罗洛夫带的人都是经过我们精心挑选的，并特别注意选了一些熟悉卢茨克及其郊区情况的人。

那几天马尔法·伊利尼奇娜·斯特鲁京斯卡娅也到部队的窝棚里来了一次。

我很奇怪，是什么使她克服了羞怯的心理来找我的？此前她所有的要求都是由斯特鲁京斯基老汉转达的。

窝棚里燃着篝火，篝火四周放着一些圆木墩，那是用来充做凳子的。

“请坐，马尔法·伊利尼奇娜。”

她端庄地坐下，开口说道：

“我有件小事耽搁您一下。我想请求派我到卢茨克去。”

我想起来了，在首批自报奋勇和弗罗洛夫一起执行任务的人中就有罗斯季斯拉夫·斯特鲁京斯基和亚德贾。看来，马尔法·伊利尼奇娜一定是从他们口中得知了有关这次行动的事。

“马尔法·伊利尼奇娜，”我对她说，“您不应该到卢茨克去。那是您力不胜任的。在这儿您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还能做出什么贡献？做饭洗衣任何人都能干，至于我的体力，请您放心。我很结实。我会比一个年轻人更有用的。我在卢茨克有亲戚、熟人，通过他们我可以了解到我所需要的一切情况，我可以与您需要的任何人接头。”

“那孩子们怎么办？”我指的是马尔法·伊利尼奇娜的

几个小孩子——瓦夏和斯拉瓦。

“卡佳会照顾他们的。”

“遇到危险怎么办？您想过会有多少危险在等待着您吗？”我竭力想劝阻马尔法·伊利尼奇娜。

“上帝是仁慈的。谁会想到我是个游击队员？”

我怀着极大的敬意注视着这个女人，注视着她那好看的充满慈良和高尚气质的脸。

“好吧，”我回答说。“我和同志们再商量一下。”

她担心我会拒绝她的请求，又让其丈夫——斯特鲁京斯基老汉来找我。但我依然没有首肯。

很快采萨尔斯基告诉我说，马尔法·伊利尼奇娜感冒了，身体状况很糟糕。我决定趁此机会让弗罗洛夫去转告马尔法·伊利尼奇娜，我们将不派她去卢茨克。

可是还没等弗罗洛夫回来，马尔法·伊利尼奇娜就含着眼泪跑来了。

她一再苦苦哀求，我终于不得不同意派她去卢茨克。

二月十六日，这支小分队出发了。

斯特鲁京斯基老汉带着年幼的孩子们一直把妻子送到营地外很远的地方。

过了一星期我们得到情报说，小分队已顺利抵达卢茨克地区，在距卢茨克市二十五公里的一处森林中驻扎下来，并向市里派出了侦察员。

要不是出现了必须把小分队召回的特别情况，可能事情接下去也会很顺利的。

负责沟通库兹涅佐夫与“了望站”之间联络的是科利亚·普里霍季科。他常常乘马车、自行车或步行把库兹涅佐夫的信件送到“了望站”。趁另一名通信员往返“了望站”与

营地之间送情报的时候，普里霍季科正好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他再把支队的文件送到罗夫诺交给库兹涅佐夫。有时他必须一天跑一个来回。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普里霍季科在罗夫诺的出现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德国哨兵几次检查他的证件，证件没出任何问题。

然而我们深知科利亚·普里霍季科的性格。我们的勇士总是不能心平气和地从德国人或伪警察身边走过。尽管他总是对自己的冒险行动秘而不宣，可久而久之我们也有所耳闻。

有一次普里霍季科乘马车从罗夫诺返回“了望站”。还在城里时，他就发现后面走着两个伪警察，而且他觉得他们是在跟踪他。普里霍季科非但没有催马快行，反而故意不紧不慢地走了起来。伪警察紧跟不舍。

前面出现一座横跨戈雷尼河的桥。在距桥半公里处普里霍季科停下紧起马肚带来，虽然马具一切正常。

伪警察走到马车旁时，普里霍季科面带笑容地向他们打起了招呼：

“小伙子，上车吧，我给你们捎脚。你们是到克列索沃去的吧？”

“是到克列索沃。”

“上来吧，很快就到。”

伪警察把步枪放在车上跳上了车。普里霍季科一边赶马，一边和这两个乘客聊开了：

“怎么，小伙子，你们是警察局的吧？”

“是的。”

“你们要到哪儿去？”

“我们要抓人送往大日耳曼帝国。这就是去一个村子抓人的。人们好说歹说都不愿……”

“这些人真不识好歹，”普里霍季科附合地说。

“小伙子，你这么棒的体格正适合到大日耳曼帝国去，”一个伪警察盯着科利亚说。“他们就愿意要你这样健壮的。啊，老弟，那边过的是什么生活！大把地挣钱，到回家时就成财主了。”

“我还算健壮的？”普里霍季科故作不解地说。

马车驶上桥。驭手突然停车站起身来：

“举起手来！”他大喝一声，手里握着一支手枪。“滚下车去，出卖灵魂的畜牲！跳到水里去，不然我就开枪啦。”

河水在桥下汹涌奔腾，激浪滚滚，在快擦着桥板的地方流过。伪警察朝下看了一眼，吓得直往回缩。

“快跳！”

伪警察被手枪逼得无处可去，跳进了河里。

普里霍季科收起手枪，仔细地朝桥下的河面上观察了一会，看见两个伪警察你抓我我拽你地在水里挣扎了一会渐渐下沉，并确信那两个家伙肯定沉底以后，才在马车上坐好，策马赶路……

要不是看到了普里霍季科缴获并上交到管理排的步枪，也许我们至今也不会知道戈雷尼河上发生的这件事。这次是战利品使我们的勇士“露了馅”。他把步枪交给了管理排长弗朗茨·伊格纳季耶维奇·纳尔科维奇之后，仅仅过了半小时，就被叫到队部的窝棚，站在了我和卢金面前。

“科利亚，你在半路上遇到了什么人？”

“我？”

“是你。”

“伪警察，一共两名。我嘛……让他们到河里洗澡去

了。”

“你又去干铤而走险的事啦？”

“是他们自己跳到我的马车上来的。”

“你把我们的谈话忘了？”

普里霍季科垂下了眼睛，沉默了一会，终于坦白地说：

“我懂，支队长同志，我只是碰上了这样的事就控制不住自己。”

……二月二十一日我把一份送库兹涅佐夫的文件交给了从“了望站”来的通信员。

“您送的是一份重要文件，”我提醒他说。“如果它落到敌人手里，我们就可能要牺牲一批我们最优秀的同志。您在把文件交给普里霍季科时，把这一点也告诉他。”

次日文件就带到“了望站”交给了科利亚·普里霍季科。他接着带上文件赶往罗夫诺。

库兹涅佐夫等了整整一天。但普里霍季科没有到。第二天早晨他依然没有出现。

快到中午十二点时，城里传出消息说，在大日捷尼村附近发生了一起异常事件。人们说有一个年轻的乌克兰人打死了许多德国人，自己也被打死了。有的说这个人当地村民，有的说他是森林里的游击队员，而且并不年轻，上了岁数。但所有的人都肯定，战斗是他一个人打的，而且他打死了非常多的法西斯匪徒。

库兹涅佐夫立即把卡济米尔·东布罗夫斯基派往大日捷尼村。东布罗夫斯基有亲戚住在那儿。

库兹涅佐夫很了解普里霍季科。他们在莫斯科时就是好朋友，並一起乘飞机来到支队，此后又一起工作。积极斗争的欲望使他们亲密无间。库兹涅佐夫毫不怀疑，一旦普里霍季

科落入敌人手中，无论什么样的酷刑也无法使他出卖自己的同志。如果普里霍季科牺牲了，那么文件的下落如何呢？

东布罗夫斯基回来了，他找到了库兹涅佐夫，然而却久久说不出话来。库兹涅佐夫没有去催促他。对于普里霍季科的命运他已不抱任何幻想了。

下面就是卡济米尔·东布罗夫斯基从目击者口中了解到的情况。

……象往常一样，普里霍季科打扮成当地居民的模样乘马车向罗夫诺驶来。在大日捷尼村，一个由德国宪兵和伪警察组成的巡查队拦住了他。

“站住！车上拉的是什么？”

宪兵检查了证件，证件这次依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可以走了。”

可是一个卖国贼为了保险起见还想搜查一下马车。而在普里霍季科车上的干草下藏着一支冲锋枪和一些反坦克手榴弹。

“为什么还要检查？”普里霍季科反抗说。

然而那个卖国贼已经把手伸进了干草里。

说时迟那时快。普里霍季科立即自己抽出冲锋枪，狠狠地打了一个长点射，擦倒了几个敌人。其他敌人逃到一座房子的拐角处开了火。

普里霍季科左肩受伤。他用右手赶马向前奔去。

可没想到迎面又开来一辆拉着宪兵的卡车。宪兵个个头戴钢盔，手握子弹上膛的步枪和轻机枪。他们从行进间向普里霍季科开了火。

普里霍季科又一次负伤。他弃车纵身跳进了一条排水沟，又朝敌人打了一个长点射。几个宪兵飞出车厢摔到了路上。

于是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负了重伤的普里霍季科继续向敌人射击，直到精疲力竭、奄奄一息为止。这时他抓起了一颗反坦克手榴弹，把文件系在手榴弹上投向了一群宪兵。随即是轰隆一声爆炸的巨响。

普里霍季科把最后一粒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心脏。

此后，宪兵们个个哆哆嗦嗦、心惊胆颤地向游击队员爬去，他们依然不敢大胆走近他，尽管他已牺牲，可他们还是惊魂未散。

普里霍季科的牺牲使我们提高了警惕性。我命令库兹涅佐夫和“了望站”的全体成员在未查明情况前立即撤回营地。

三月一日傍晚。库兹涅佐夫和同志们来到了路德维波尔区的霍特尼村前。他们应该在那儿从桥上通过斯卢奇河。

桥已在望。河水在远处泛起鱼鳞般的涟漪，闪着银光。侦察员们发现在稍远处的河岸上有几个陌生人在奔跑。这时有人在岸上用乌克兰语朝他们呼喊了一声。他们刚一回答说：“我们是游击队”，几支步枪就开了火。而且接着响起了机枪的扫射声。曳光弹到处乱飞。火力很猛，但完全没有目标。

“同志们……”库兹涅佐夫本想说点什么，却又突然猛地站起身来，可着嗓门大声喊道：“为科利亚·普里霍季科报仇！冲啊！”

“乌拉！”侦察员高声响应着，边喊边射击地冲向桥去。

战斗持续了一刻钟。一刻钟后敌人已不再射击。桥旁横着十具敌人的死尸。剩下几个活着的都扔下武器乖乖地举起手站在那儿。

马尔法·伊利尼奇娜自报奋勇前去执行一项重要的作战任务。在返回营地途中法西斯刽子手的子弹夺去了她的生命。

我们要坚决为她报仇。用法西斯匪徒的黑血去祭奠马尔法·伊利尼奇娜·斯特鲁京斯卡娅那对于我们来说十分宝贵的生命。

祖国永远不会忘记她！

(八)

我们一到罗夫诺州后立即对兹多耳布诺夫车站发生了兴趣。兹多耳布诺夫铁路枢纽把德国与东部战线连接在一起。德国军列通过在兹多耳布诺夫交会的利沃夫—基辅、科维尔—卢茨克—基辅、明斯克—萨尔内—基辅几条干线分别驶向东西两个方向。

在这儿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无疑会给红军以巨大帮助。

我们当中首先深入兹多耳布诺夫的是尼古拉·普里霍季科。这是他的故乡。

“注意，”我提醒他说，“与老熟人接触一定要谨慎。不要到车站去，你会给认出来的。只要出现一个叛徒就足够了，就毫无办法了。”

“我懂，”普里霍季科点头答道，他最怕领导改变派他去的主意。

他一到兹多耳布诺夫就立即着手寻找昔日朋友中那些信得过的人。其中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克拉斯诺戈洛韦茨是他在街上遇到的。克拉斯诺戈洛韦茨战前是铁路民警局工作人员，现在敌人占领后他在市议会当木工。他告诉科利亚·普里霍季科，他早就想与德国人斗，但不知从哪儿干

起，从哪儿弄炸药，可以与哪些同志进行联系。普里霍季科告诉他，什梅列格兄弟是靠得住的人。那兄弟俩很乐意帮助游击队。普里霍季科讲了帮助游击队应包括哪些方面，但是没有给他交待任何具体任务。

“你们先把人拉起来。”他说，“以后会明白的。”

直到他们建立了地下小组，克拉斯诺戈洛韦茨及其同志才得到任务。在建立地下小组的过程中，德米特里·克拉斯诺戈洛韦茨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准备为祖国的解放献出自己生命的爱国者和一个能够完成我们交付任务的出色组织者。于是我们开始不断地交给他们一些任务。

其实，兹多耳布诺夫的同志刚一组织起来，没等支队的通信员到来就自己行动起来了，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

兹多耳布诺夫地下组织与支队的联系不仅通过罗夫诺的侦察员，也还通过由克拉斯诺戈洛韦茨指定的专门交通员来进行。充当交通员的是列昂季·彼得罗维奇·克利缅科，或者按照大家对他的称呼我们干脆叫他列尼亚。列尼亚原是名战俘。因为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汽车司机，德国人把他从集中营里放出来，安排到了兹多耳布诺夫的一个管理机关的汽车场。列尼亚和铁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支配着一辆一吨半的卡车。有一次他竟开着这辆卡车到“了望站”，把克拉斯诺戈洛韦茨的一个纸包交给了瓦利亚·谢苗诺夫，返回兹多耳布诺夫时带回了五十枚延发地雷。

不久列尼亚·克利缅科的职责范围就扩大了。他开始负责把侦察员从罗夫诺运回“了望站”。一旦我们要用汽车，他就把汽车开到我们这儿。

凡是坐过他的车，与他见过面的人都很喜欢这个个头不高、质朴，总是面带笑容的小伙子。他也把能在支队逗留的

日子看成是节日。克利缅科常常从一堆篝火旁走到另一堆篝火旁，坐上一会儿，与大伙聊上一阵，跟我们游击队员唱歌。他常常是彻夜不眠，以便不使和游击队员在一起的时间白白度过。

克利缅科迫不及待地渴望着有一天会批准他烧掉卡车到支队来当一名冲锋枪手。那是他由来已久的愿望。

列尼亚运给兹多耳布诺夫同志们的地雷，给希特勒匪徒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些地雷往往被设置在开往东线列车的机车锅炉下、油罐车下。地雷的爆炸均在途中，列车驶离兹多耳布诺夫车站八到十小时后。破坏活动的结果，地下工作者往往是从列车乘务组的人那儿得知的。乘务员总是说，路上走得好好的，突然机车锅炉或油罐车平白无故地爆炸了，接着整个列车都烧了起来。

克拉斯诺戈洛韦茨每每听到这些，总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尽管已不年轻，见识颇丰，却常常一连数小时地伫立在车站上等待从东方回来的列车，不了解到破坏活动的结果决不离去。他多么想亲眼目睹那些战果，亲耳听到那些使德军车毁人亡的爆炸声啊。而一旦得不到布雷军列的消息，立即会引起他的不安——克拉斯诺戈洛韦茨担心他的工作会泡汤。这时他常常坐卧不宁，直到又一趟法西斯军列飞上天为止。

……还在新年前夕，康斯坦丁·叶菲莫维奇·多夫格尔就建议我们与一个叫作菲达罗夫的人进行联系。

“这个人你们会用得着的，”康斯坦丁·多夫格尔说。“他是科维尔铁路段的工程师，战前是萨尔内车站站长。他在萨尔内和科维尔有很多熟人。”

“他可以信赖吗？”科切特科夫问。

“他是党员。”

“现在他在干什么？”

“德国人占领后，他吃尽了苦头东躲西藏，现在离萨尔内不远的一个磨坊里。”

科斯佳大叔很善于为我们的工作物色人。我们也深信，如果他推荐了谁，那也就是说那肯定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科切特科夫于是前去与菲达罗夫见面。

菲达罗夫五短身材，长得很壮实，象所有高加索人一样机警善变，他满口答应了科切特科夫向他提出的建议：

“这没问题！让我们立即行动吧。您尽管说需要做些什么？”

“您自己有何想法呢？”科切特科夫问。

“我认为，”菲达罗夫一边做着手势，一边高声说道，“应该炸毁一些桥梁！我早就这样想，可我没有地雷。您把地雷弄来，我就动手。只是要快点，我已经浪费许多时间了。”

“炸桥的时间还是有的，”科切特科夫说。“首先你们必须建立一个牢固的地下活动小组。”

过了一个半月，菲达罗夫通过瓦莉娅·多夫格尔交来一份自己组织的人员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些工人、火车司机、巡道工和车站职员。

按照科切特科夫布置的任务，萨尔内的地下组织开始在铁路上展开了紧张的侦察活动。菲达罗夫不断地将有关多少列车通过，开向何方，运送的是何种军队、物资和装备等敌人在科维尔——科罗斯坚和萨尔内——罗夫诺铁路线上运动的情况送到支队来。这些情报我们都毫不拖延地转发给了

莫斯科。

很快，菲达罗夫小组又扩大了自己的活动内容——他们不仅搞侦察，而且从事破坏活动。这回我们的高加索人有机会对待那些桥梁了。因此在萨尔内地区敌人的军列翻车落轨越来越多，成了家常便饭。

接着，我们又在科斯托波尔、拉基特诺耶和卢茨克等另外几个车站也建立了地下活动小组。那一带各处的爱国者在我们的帮助和指导下，纷纷自愿地行动起来，使德国侵略者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与此同时，康斯坦丁·叶菲莫维奇·多夫格尔也在继续展开自己的爱国主义工作。

他不仅经常在罗夫诺活动，还按照我们的布置深入科维尔、卢茨克、利沃夫，甚至华沙。他所到之处都收集到许多宝贵的侦察情报。

华沙之行可谓他最成功的一次行动。他在那里共呆了五、六天，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他却了解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科斯佳大叔查明了，在华沙有两所冒牌的波兰地下军官学校。每所学校有三百人受训。这两所学校接受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津贴。可学校到底训练的是何人呢？康斯坦丁·多夫格尔所了解到的情况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伦敦送来的美元津贴全都落入了希特勒匪徒的口袋里。一点不错，就是希特勒匪徒。在学校任教的都是希特勒匪徒——德军的将军、军官和盖世太保。因此不难理解，这样的“学校”会培养什么样的干部，教给受训军官什么和将如何使用他们了。

有一次瓦莉娅·多夫格尔在和科切特科夫接头时送来了父亲的一份例行报告：法西斯匪徒打算把维雷村和克列索沃地区的几个机械厂的设备运走。

瓦莉娅讲完德国人的企图后，建议炸掉那些机械厂和机械厂与克列索沃之间的一座铁路桥梁。不知这是父亲让他转告给科切特科夫的，还是她自己的主意——反正她在提出这个建议时是相当果敢，丝毫不怕遭到他人反对。

科切特科夫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我们，并补充说他完全赞同科斯佳大叔和瓦莉娅的建议。我们也表示赞同。

科切特科夫在详细地侦察了各机械厂的情况、敌人警卫的分布和数量后，率领一支二十人的小分队出发了。小分队中有五人是当地人。前往维雷村的还有我们深孚众望的爆破专家——工程师马利科夫、科利亚·法捷耶夫、霍译·格罗斯。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科切特科夫发出了信号。一瞬间响起了三下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机车库、机械厂和发电站全都起了火。

爆炸手在指定的地点汇合了。本来应该启程返回了。可最后一个到来的科切特科夫低声说道：

“同志们，结果不妙。爆炸时机车库里只有两台机车，另一台机车拉着五十节车皮停在离这儿不远的一条铁路支线上。难道我们还要把它留下来吗？”

“炸掉它！”

“我也知道应该炸掉它，可我们只有一个用于炸桥的地雷了。怎么办？”

办法是霍译找到的。按照他的主意，一半人去炸桥，而另一半人到机车那儿去。这时先前当过副司机的涅奇波鲁克

爬上了机车，给机车火箱点火。当桥梁炸毁时，机车已升火待发。涅奇波鲁克开动了机车，当机车拉着车皮高速前行时，他却跳了下来。机车向炸毁的桥梁急驶而去，轰隆一声掉进了河里，它后面的车皮也无一幸免。

(九)

一天有一个瘦弱、面色苍白的小姑娘出现在支队部窝棚的门口。她用一条灰色的毛线围巾紧紧裹着头和上身，并在背后打了一个结，脚上穿着一双旧的手缝的毡靴。肩头背着背囊，手里拿着一包东西。

“我把瓦莉娅带来了，”科切特科夫一边把冲锋枪放到墙角，一边低沉地报告说。“她老缠着我，我只好带她来。”

“看到你真高兴，瓦莉娅，你来了真是好样的，”我边说边帮她取下背囊，并接过了她手上的那包东西。“把外衣脱了吧，我们这儿挺暖和。”

姑娘取下手套，解开围巾，然后依然默默无话地把自己那孩子般的小手伸给了我。

“她还完全是个孩子，”我心里想，于是问道：

“是到我们这儿来作客的吗？”

我也不知该从何谈起，说些什么话来安慰她，使她打起精神。

“不，我不是来作客的。我是来请求加入支队，”瓦莉娅严肃地十分平静地说道。这完全出于我的预料。

“妈妈同意吗！”

“是她让我来的。总该有人来接替爸爸……”

当她说出“爸爸”两个字时，她的声音颤抖了一下。

“康斯坦丁·叶菲莫维奇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可为什么非要你来接替他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憎恨法西斯匪徒。我们这来了几十个新同志。他们将接替你爸爸的工作，並为他报仇。而你还太年轻。你先住在支队。我们会尽快给你安排工作的……”

“会给我发武器吗？”

“你父亲没有武器也战斗得很出色……”

“可我请求发给我武器，”瓦莉娅执拗地说，两眼从近处凝视着我。

我不想使姑娘失望。

“好吧，瓦莉娅，先住下来。等你习惯了，就给你发武器。”

有这么一句人们常说的非常形象的话，叫作“两眼燃着仇恨的烈焰”。瓦莉娅的双眼此刻正象那句话所说的一样，燃着仇恨的烈火。

无论是我，还是谢尔盖·特罗菲莫维奇·斯捷霍夫都觉得，所有这一切，无论是要武器的请求，还是那仇恨的本身，都不外是个人满腹哀怨和痛苦的反应，是幼小心灵的呐喊。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安抚姑娘。于是我们决定介绍她与我们的新报务员玛丽娜·基赫相识。

“玛丽娜，你试试从女同志的角度和她谈谈，”我对玛丽娜说。

“好吧，”她答应了我的请求，“我试着和瓦莉娅谈谈，使她摆脱哀思。只是我的时间太少。我们不是日内就要出发吗？或者是您，支队长同志，”玛丽娜试探地看着我说，“改变了带我去执行任务的主意？”

我和斯捷霍夫交换了一下眼色。

“不，玛丽娜，我没有改变主意。”我说。“请你把全部时间都花在瓦莉娅身上吧。也许我还要带她去执行任务。我们还要再考虑一下。”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是您把库兹涅佐夫从罗夫诺召回的吗？”我在排里与同志们谈心后刚回到队部，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就问起我来。

“没有，怎么？”

“他回来了，刚到。”

“他在哪儿？”

“他去冲个澡，马上就來。他好象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

“不知道。可我觉得他心绪不佳。”

“他什么也没说？”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但我觉的，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回来。”

大约过了一分钟光景，库兹涅佐夫出现在窝棚门口。

“可以进来吗，上校同志？”

我们互致了问候。

他的整个容貌和举止上有着一种新的并非库兹涅佐夫原有的东西。他一向沉静、坦然、信心十足，並常常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可此刻我觉得他有些发窘，甚至心慌意乱，仿佛是做错了什么事而且不知该如何去改正。

“没有召唤我就回来了。”库兹涅佐夫说着不自然地笑了一下。

“见到您我们总是很高兴的，”我应声答道，尽量装作没有发现他的窘态。“这样的事是难免的。因为您身居敌

营，想必您在那边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库兹涅佐夫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分明表示他已经知道我猜出了他的来意。

“是的，说实在的，我是为这样一个问题来的，”他说道。“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我实在是有些忍耐不下去了。您当时说得对，您还记得吗，您当时说过需要有异乎寻常的自制力。现在我每天都得强作笑颜，唯唯诺诺。这身制服别提有多讨厌，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周围一个自己人也没有，有时你会想：去他妈的，我还是扫它一通得啦。不，我是一个不称职的侦察员，”他结束了自己的话。

“库兹涅佐夫，如果您是来请求我允许您采取积极行动的话……”

“不，我明白，这为时尚早……但是我周围哪怕是一个自己人，”库兹涅佐夫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有一个我可以与之商量、交换意见或者只是谈谈心里话的人也好哇。”

“我们很理解您。是应该想个办法。谢尔盖·特罗菲莫维奇建议不时地把您召回支队来住上一、两个星期。您看怎样？”

“不，我不能同意这样做，”库兹涅佐夫断然低声说道。“我的位置在那儿，在罗夫诺。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我的请求是这样的。请允许我与罗夫诺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您已经知道哪些人是地下工作者了吗？”

“不知道。但如果允许我这样做，我会找到的……”

“罗夫诺确有地下组织，这我们知道，而且它相当强大。但我必然会使您不快，您不能与地下组织进行联

系。”

“为什么？”库兹涅佐夫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就我不能？”他大惑不解地问。

“地下工作者的任务是宣传鼓动、从事破坏活动、武装苏联民众并把他们派到森林里来，”我极力对他解释说。

“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您有您的工作。您的工作必须绝对保密。您穿着法西斯匪徒的制服，开始和法西斯匪徒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说，您也必须象法西斯匪徒一样狂噪。”

“您应该理解我，支队长同志，”库兹涅佐夫激动地说道。“要知道……你走在街上，迎面而来的人连看都不看你一眼，急忙避开。即没有人和你打招呼，事后其内心也会感到恶厌的。那些目光中包藏着多少鄙视和轻蔑！一个只有身历其境地处在我的位置上的人才会理解这一点。那种感觉简直就如同有人往你脸上啐唾沫。要知道，我多么想走上前去，问一句：‘同志，你干吗要恨我呢？我可是自己人……’”

在这番令人意想不到的肺腑之言中，包含着多少苦楚和失望！它不可能不深深地打动和激荡着人的心灵。这是一种置身于令人窒息的到处是法西斯匪徒的环境中的人的孤独，一个不敢随意表露自己感情的人的孤独，一个不仅必须对周围的一切保持沉默而且必须故意装出一种心安理得、厚颜无耻的样子，必须象狼一样到处狂噪的人的孤独——人世间还有什么会比这更令人难以忍耐，更感到屈辱和可怕的东西？

然而我依然既禁止库兹涅佐夫去与地下工作者进行联系，也禁止他采取措施去寻找他们。

“再忍耐一下吧。我们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请您放心。”

当窝棚里只剩下我和卢金两人时，我们为了给库兹涅佐夫想出一个好办法伤透了脑筋，直到想起瓦莉娅·多夫格尔为止。

她现在和我们一起呆在这个新地点。玛丽娜·基赫在转移的途中始终陪伴着她。玛丽娜按照我们的请求处处照顾着瓦莉娅，然而在头一次与瓦莉娅交谈时就被姑娘提出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尖锐问题弄糊涂了：

“为什么您老是安慰我？我不需要安慰。”

确实，在对瓦莉娅做了进一步观察后，我们深信，她寻求的不是安慰。在我们眼前的瓦莉娅不是一个光知道思念可爱父亲的半大的姑娘，而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

……第一次见面时，库兹涅佐夫和瓦莉娅相互都不太喜欢对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卢金的过错，是他告诉瓦莉娅说他准备让她结识一位侦察员。然而库兹涅佐夫的形象无论如何也无法与瓦莉娅心目中的侦察员相吻合。不错，库兹涅佐夫的德语和波兰语都说得非常好，她也承认他的德语以及波兰语的知识是无可挑剔的。但她觉得他在其它方面就显得太平淡无奇了，根本不配担当他所想象的能在敌营中纵横摆阖的角色。库兹涅佐夫同样也没有发现瓦莉娅具有他认为在德国人中开展工作所应该具备的那些品质。瓦莉娅的性格既不沉静，也不持重，对法西斯的仇恨则流于言表，无论她干什么都不例外——这样的仇恨当然不会使瓦莉娅在侦察员这样艰巨的岗位上取得成功。

库兹涅佐夫详细地向瓦莉娅询问了她留在罗夫诺的女友的情况，询问了她们当中有谁和希特勒匪徒搞在一起……由此他看到了结识一些用得着的人的可能性。仅仅出于这一点

考虑，他同意了我们派瓦莉娅去罗夫诺的建议。

首次获悉的有关瓦莉娅开展工作的情况就使我们十分高兴。她很快就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找到了一处住宅。这个住宅既可以成为库兹涅佐夫的隐蔽处，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供其他侦察员使用。瓦莉娅不仅成功地找到了住宅，而且报上了户口。这也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能够迁往罗夫诺居住的都是一些得到盖世太保允许的人。瓦莉娅通过自己的一个“女友”认识了一个盖世太保的工作人员、乌克兰警察局长的私人翻译莱奥·梅特科。梅特科相信了瓦莉娅所说的她的父亲与德国人合作而被苏联游击队处决了的话。他不仅相信，而且帮助瓦莉娅搞到了一份有关上述情况的证明材料。瓦莉娅的户口也是他办妥的。他还推荐瓦莉娅到一家商店当了售货员。

现在瓦莉娅在罗夫诺有了一间方便的有单独出口的房子。瓦莉娅打算把母亲和妹妹都搬过去。

我们感到高兴的与其说是这套住宅——尽管我们深知它的全部价值——还不如说是这个十七岁的姑娘在市里开展工作时所展示出来的惊人的能力。支队又有了一个新的可靠和高效的工作人员。

当一切都办妥后，瓦莉娅把自己的“未婚夫”介绍给了梅特科。这个“未婚夫”当然就是保利·齐贝特中尉。接着梅特科又把齐贝特介绍给了几个盖世太保和帝国公署的工作人员。

我们开始每天都从库兹涅佐夫那得到情报，而且这些情报一个比一个重要。我们开始了解到许多希特勒匪徒在乌克兰实行的秘密措施，希特勒统帅部当前的计划和有关敌军变更部署的情报。

在通往罗夫诺的半路上，我们又建立了“了望站”。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个“了望站”不是设在村子里，而是直接建在距罗夫诺—卢茨克公路五十米远处的森林里。我们给它取名叫作“绿色了望站”。

西乌克兰的四月是个好月份。冰雪消融了。地上到处钻出了绿茵茵的小草。树木绽出了幼芽，正准备抽枝长叶。大自然界中的一切都预示着晴暖的好天气就要到来了，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怡。整个冬天我们给冻得够呛。然而四月住在“绿色了望站”里也不是那么暖和。侦察员们都睡在潮湿的地上，夜里浑身冻得冰凉。而且无处取暖——为了不暴露自己，他们不能点燃篝火。

除了“绿色了望站”外，我们给每一个打入罗夫诺工作的侦察员都指定了一个单独的地方作为“绿色邮箱。”这些地方往往或者是一个树穴，或者是一个树墩，有时就是一块大鹅卵石。游击队员把自己的情报送到那儿藏起来，并可就地得到支队给他的指示。

“绿色了望站”和“绿色信箱”的位置都是绝对保密的。因为它们是通信的中心枢纽。派往“了望站”，在“了望站”值班，去各“绿色邮箱”收集和分送信件的往往都是最有经验、最谨慎的侦察员。启导他们的是瓦利娅·谢苗诺夫。

这时小科利亚也和成年人一样开始了工作。他被指定为库兹涅佐夫的通信交通员。

玛丽娜·基赫负责领导科利亚，並为他缝制了两套特制的服装。一套是农民服装——小褂和家织麻布的长裤。为给这套衣服配套，科罗廖夫为科利亚编了一双树皮鞋。另一套是城里人的服装——翻领衬衣和短裤。

我们嘱咐科利亚，到了“了望站”后就得换衣服，把农

村服装脱下，穿上城里人的衣服，然后再进城。

科利亚进城的第一天，瓦利亚·谢苗诺夫十分为小伙子担心，简直坐卧不宁。然而科利亚顺利返回，并带回了库兹涅佐夫的信件。

“噢，说说你走这趟的经过？”谢苗诺夫迫不及待地问道。“他们有没有在哪儿拦阻你？”

“啊哈，拦是拦过。我就照你们教我的那样对他们说：‘放我过去吧，叔叔。我的爸爸、妈妈都被布尔什维克折磨死了。我要去捡……’”

从这天起，科利亚成了库兹涅佐夫的可靠助手。

第二部 真假主人

(一)

法西斯刑警局的暗探马尔丘克在罗夫诺市内盯上一个中年乌克兰人。他经常在信托商店露面，在那里购买各种物品，尔后，显然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销售。这个投机商——马尔丘克确信他是投机商——在人群中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认出来：头戴宽缘帽，一付墨镜，而且象德国军官那样，手里总是拿着一束花儿。普通的顾客一进商店的门，就直奔自己要买东西的柜台，而他却不同，进门之前，喜欢在橱窗前面站一会儿，进到商店后，又喜欢长时间地观看商品。该“顾客”的这些举动，使密探坚信，自己的判断准确无误。

有一次，马尔丘克看到，投机商又在商店出现了。他购买了各式各样的外科手术器械，又买了一套西装，而西装根本不合他本人的尺寸。他甚至连试穿都没有试穿，就买下了。

马尔丘克跟他的一个朋友——刑警局的同行——讲了这个投机商的事情。他们认定，这种良机万万不可错过。

“我们要向他讨点好处，他如果不答应，我们就把他弄到警察局来。”朋友断然说道。

第二天，两位“朋友”一大早就在商店里值勤了。投机商刚一进门，他们就走向前去，同他搭讪。看得出，投机商

对这种结识感到不快。但是话题并没有什么恶意——谈的无非是物价如何昂贵，商店秩序如何混乱。这使投机商感到宽慰。他终于也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小餐馆，”马尔丘克建议道，“为我们的相识喝上两杯，叙叙友情……”

“好主意，我不反对，”投机商表示同意。

在餐厅，密探点了名酒、名菜，而且使投机商明白，付钱的是他。投机商没有反对的表示。

他们围坐餐桌，边谈边喝，气氛活跃、热烈。两杯酒落肚之后，马尔丘克和他的朋友互相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投机商说他叫扬克维奇。

他们在餐厅里呆了整整一个晚上，品尝了各类名菜和俄罗斯的伏特加，奥地利的罗木酒，以及法国的葡萄酒。结账的时刻到了。马尔丘克摆出一付派头十足、不可一世的威严面孔。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新相识的肩膀，说道：

“搞投机这一行，扬克维奇先生，应该有本事才行，而你只是个饭桶！你落网了。”

他说着便向扬克维奇亮出了自己的证件。

马尔丘克想必看到，投机商虽然富有，但有点傻里傻气，他的胃口也就更大了。他断定，除了吃喝之外，他还可以从这个头脑简单的傻瓜身上得到一大笔钱。

“我们都不是与人过不去的人，”马尔丘克相信，已经把对方吓得够呛了，于是就拉长声音，慢条斯里地说。“如果你愿意和我们平分你所获得的利润，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如果不愿意，就跟我们到警察局走一趟！”

扬克维奇泰然自若，一点儿也没有动怒。他不慌不忙地吃完煎香肠，饮尽杯子里的酒，站起身，先看了看马尔丘

克，接着又看了看他的朋友，说道：

“你们全是笨蛋，而不是密探。我不知道，你们到了警察局能说些什么，而现在……你们负责结账！”

两个密探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扬克维奇冷笑了一声。他什么话也不讲，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枚椭圆形金属徽章，那徽章系着链子，大小如同一块手表。他将这徽章在丧魂落魄的刑警局密探的眼前晃了晃。这是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的证章。

“认识这个吗？既然认识，就请结账吧，”他指了指桌子上的杯子、盘子之类的餐具，说道。“还要看一看，究竟谁是饭桶！”

顿时，形势完全改变了。马尔丘克和他的朋友不但按账单付了款，而且开始又点头又哈腰，不住地赔礼道歉，挖空心思地要平息刚才不愉快的风波。刑警局的密探把盖世太保的秘密警察视若洪水猛兽，不敢冒犯。

从餐厅出来，他们亲自把这位已有些发福的扬克维奇扶上汽车，送他回家。

扬克维奇并不是一个耿耿于怀，爱记仇的人。他不时地微笑着，忠告两位新朋友要仔细地观察人、认识人。最后，他甚至答应马尔丘克，要去他家串门。

马尔丘克大概非常喜欢这位如此巧妙地哄骗他们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后来，每次见面，他都邀请扬克维奇去他家，甚至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

这一切全是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舍夫丘克告诉我们的。当时，他因“公务”在身，离开罗夫诺市，来到支队营地。而他，就是那位“盖世太保秘密警察”。

舍夫丘克参加支队以前，就已经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

验。当年，波兰地主统治乌克兰时，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而坐过五年牢。1939年红军解放了他。他虽然已经快40岁了，但仍然要求参加支队。后来，他和同志们一起被空投到霍伊尼基车站附近。

对罗夫诺市他并不熟悉，但仍然自愿报名前去执行侦察任务。根据他本人的意见，他证件上填的名字是扬克维奇，这是个波兰人的名字。库兹涅佐夫交给他一枚徽章，他便成了“盖世太保秘密警察”。

进入罗夫诺市之后，舍夫丘克迅速地适应了环境。他象这里的大部分德国人那样，戴上一副墨镜，手持花束。尔后又从事起小本的投机生意。他不得不这样做：他的一个秘密接头地点就设在信托商店。为了掩人耳目，总要买点什么。他买的绝大部分物品都陆续送往支队了。有些物品他确实转手倒卖了，那都是支队用不着的。

餐厅事件之后，刑警局的密探大献殷勤，甘愿效劳，经常陪送扬克维奇到其住处。他们现在把他看作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不知马尔丘克是否告诉扬克维奇家的清洁工说，这里住着一位多么“显贵”的人物，但自那之后，清洁工就开始向扬克维奇——舍夫丘克报告，哪些人他认为是“可疑分子”。

舍夫丘克对此感到忐忑不安。为了使自己在罗夫诺市的活动真正合法化，他同自己一处秘密住处的女主人加娜·拉泽维奇举行了“订婚典礼”。

举行“订婚典礼”那天晚上，在他的住处，伊万·弗兰科大街16号——自此以后，它变得更加可靠——“客人”们聚集一堂。参加“典礼”的来宾，除了亲朋之外，还有盖世太保的秘密警察和刑警局的密探。他们都很高兴能借此机会痛

饮一场，而自己却分文不花。

尽管科利亚·格涅久克也渴望参加这一盛会，舍夫丘克却没有向他发出邀请。

“我是盖世太保的秘密警察，”舍夫丘克告诉他，“而你是谁？投机商？”

“我不是投机商，我是商业家！”格涅久克反驳道。

“请你记住，扬克维奇，不久我就要结婚了，而你也别想会收到我的请柬！……”

科利亚·格涅久克，或者用姑娘们赞美他的话说“科利亚——美妙的眼睛”，确实是蜚声商界的大人物。想必他真的具有商人的才能，因为他经商一帆风顺，从推销商品中，获取了巨额利润。

然而，格涅久克的获利“商业”好景并不长。他很快就开始使我们花费大笔的钱，因为他这个“商业”获得的利润支付不了他的开支。自从格涅久克的活动引起刑警局密探的注意之后，这种开支就变得漫无节制了。

格涅久克慷慨地向密探们提供贿赂，以此为基础，他同他们建立了最良好的关系。这是格涅久克从事重要的侦察工作而自己又安然无恙的保证。

正如所有我们在罗夫诺市的侦察员一样，格涅久克也搞到好几个秘密住处。所有这些住处的主人都是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他们不但向游击队的侦察员提供住房，而且完成侦察员交给的某些任务。

有个名叫利季娅·利索夫斯卡娅的波兰妇女。她是格涅久克的一个邻居。她长得既年轻，又漂亮，德军军官常常到她这儿，纠缠不休，这一情况引起了格涅久克对她的注意。他轻而易举地就了解到她的姓名，并且知道了，她的已故的

丈夫原是波兰军官，1939年同德军在华沙城郊作战时阵亡。

“难道说，”格涅久克暗想，“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法西斯破坏了她的家庭和幸福，造祸于她，她能忘记这一切吗？难道说她能满不在乎地接受任何德国佬对她讨好献殷勤吗？”他觉得，利季娅不可能忘记自己的苦难。

他决意要结识她。

第一次，他到了利季娅·利索夫斯卡娅家，借故说是出于偶然。第二次，仿佛是想建议她买一双物美价廉的长筒袜子而来她家。第三次他再去她家时就不需要任何借口了……利季娅非常乐意跟他交谈。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格涅久克决定向她承认他是游击队员。侦察员的洞察力和经验提醒他，要采取大胆的步骤，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这一步他没有走错。

利季娅没有掩饰她认识格涅久克的喜悦心情。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象对自己的亲人那样毫不隐瞒地向他叙述了悲惨的遭遇。法西斯匪徒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弄得她家破人亡。她赖以生活的一切，她的精神寄托统统被法西斯破坏了。她说她对杀害她丈夫的凶手怀着深仇大恨，她愿意帮助格涅久克，他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她建议，就在当天，只要法西斯军官来，就照游击队的方式收拾他们。格涅久克问道：

“为什么您要在自己家里接待他们呢？”

利季娅眼泪汪汪地哭诉道：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同他们交往我就可能免于被送往德国去做苦役。但是现在……”利季娅以信任的目光看了看格涅久克说，“第一个到我这里来的德国

人，我要用我的双手把他掐死。您同意我这样干吗？请您帮帮我！”

“不行，”格涅久克反对道，“这可使不得。我们非常需要这种交往，应该重视这种关系。”

从此以后，科利亚·格涅久克成了利季娅·利索夫斯卡娅家的常客。和他的其它住处相比，在这里也许是最为安全的了：到这里来的希特勒军官事先就把利季娅的住处警卫起来，防止可能进行的搜捕。每当市里发生紧急情况，格涅久克就到利季娅这儿，放心地等待着危险过去。

不久，他又找到一位难能可贵的帮手。这就是利季娅的表妹——迈娅·米卡托娃。她虽然和德国军官没有什么交往，也没有舒适的住房，但不管格涅久克让她干什么，她都十分乐意帮助他。格涅久克让她结识一些用得着的人物，让她经常去利季娅家监视去她那儿的客人，想方设法让客人把她介绍给他们的朋友，用这种办法来扩大必要的交际范围。

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利季娅结识了一位名叫保利·齐贝特的年轻军官，一个东普鲁士大地主的儿子。他富有、开朗、平易近人、落落大方。不知是齐贝特看上了利季娅本人呢，还是在她家聚会使他感到开心。总而言之，齐贝特开始常到利季娅·利索夫斯卡娅这儿来了。

这种来访使利季娅深感不安。齐贝特有个习惯，来访不事先打个招呼，又没有个固定的时间，所以，他能够在利季娅家碰上格涅久克。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几次。利季娅遇到这种情况就要赶紧把游击队员送到另一个房间去，一般是安排在她自己的卧室里。

有一次，情形正好相反：先来的是齐贝特，不久格涅久

克也来了。利季娅给科利亚开了门，她没放他进去。

“你应该赶快离开，齐贝特在我这儿。”

“别说是他一个，就是一个营，也无妨，”格涅久克不动声色地说，并且走进过道：“我的证件就是希姆莱也挑不出毛病。”

“你小点声！”利季娅恳求道，“会把他吵醒的。”

“他睡着了？”

“他说，昨晚有行动……一来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你走吧，上帝保佑，不要冒险！”

然而，格涅久克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在哪儿？在卧室里吗？”

“你说到哪儿去了！”利季娅激愤地说，“我还能把任何坏蛋都放进卧室！他在饭厅里，躺在沙发上。”

“在沙发上？”格涅久克吃惊地问，“但是，那里不是藏着武器吗？”

“他正好睡在那儿。”

“嗯，让我去瞧瞧！”格涅久克提议道。

利季娅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

“你往哪儿去？这对你对我都不好……如果能把他们打死就好了！”

“嗯，这个不难。只是为了这样一个人值不值得动手？”

利季娅立即告诉格涅久克，不知怎的，她对这个德国人特别反感，也许由于他戴着法西斯的徽章，也许由于他总是那么有钱——他肯定是个大强盗。

“他是什么军衔？”格涅久克一本正经地询问道。

“中尉。从外表看，他是个典型的普鲁士人。他自称父亲是普鲁士的一个大地主。而他本人，我认为，在盖世太保

工作。”

“嗯，这么说是值得动手的，”格涅久克同意了。“只是如何结果他呢？开枪是不行的！”

“我有毒药，可以把它撒到咖啡里，”利季娅建议道。

“药管用吗？”格涅久克表示怀疑，“也许，它不过使他闹几天肚子罢了？”

“哪儿的话！这就是他们在集中营毒害俘虏的那种药。”

“那么就行动吧！你先把咖啡端进去，然后再叫醒他！”

他们就这样决定了。

几分钟之后中尉已经在桌旁坐下了。格涅久克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想从锁孔里看一看这个德国人。他看了一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又看了一眼——这一次他把门开一条缝——他完全惊呆了。

“库兹涅佐夫？”

“格涅久克！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然而，格涅久克先从库兹涅佐夫手里抢过杯子，送到厨房，他把咖啡泼掉，把杯子摔碎，这才告诉迷惑不解的库兹涅佐夫和感到莫名其妙的利季娅，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只好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

一天，有两个侦察员——马茹拉和布什宁，从罗夫诺市回到支队报告说，他们摸到了盖世太保的一个秘密警察，一个波兰人的情况。

“请允许我们把他干掉！”他们请求道。

原来，他们甚至连这次行动的计划都制定出来了，他们认识一位叫加娜的罗夫诺姑娘。那个盖世太保的秘密警察常

去她家。他们商定，让加娜劝说秘密警察带她去桑林散散心，布什宁和马茹拉在那儿“迎接”他们——这个盖世太保的秘密警察将从此永远销声匿迹。

“怎么，他妨碍你们吗？”听完这个计划，卢金问。“也许，不值得为干掉他一个而打草惊蛇吧？”

“问题正是在于他碍我们的事，中校同志，由于他，我们无处可以落脚。”

“怎么解释？”

“这个下流坯，他开始追求加娜，而她家正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接头地点。”

“他的装束长相是什么样？”卢金继续询问道，“你们都了解他些什么？”

“一个老魔鬼！戴一副墨镜，手里总是拿着花……甚至清洁工也知道他是秘密警察。”

“对不起，请等一下，”卢金让他们停下。“他从事投机倒把的活动是不是？”

“那还用说！这一点，谁都知道。这个坏蛋……”

“尽管如此，你们也不要动他！”卢金已经猜出来这个所谓的盖世太保的秘密警察是谁了。他再次强调说：“无论如何你们也不要妨碍他去你们的加娜那儿，明白吗？”为了真正说服两位侦察员，他又补充道：“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此后不久，舍夫丘克同加娜·拉泽维奇的“订婚典礼”就举行了。

曾在罗夫诺市工作过的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接受了特殊的任务。

在罗夫诺市存在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活动，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侦察员的工作独立于地下工作者的活动，他们互不相识，这是理所当然的。令人感到高兴的是他们和我们的秘密工作都组织得很好。然而，同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同他们的总部可以而且应该建立联系。

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刚从卢茨克回来不久。在那里，他组建了一些侦察小组。尼古拉并不是一个人从卢茨克回支队的。他还带了一个同志来。当地地下组织派该同志来同我们进行联系。这是一个浅色头发的小伙子。看他那样子，在战俘营待过：穿着一件已经退色变黄的军衬衣，打着裹腿，那双士兵皮鞋又旧又破，已变了形。他名叫鲍里斯·久科夫。在军队服役大约两个月就被俘了。他从战俘营里跑了出来，但又被盖世太保抓住了。后来，卢茨克的地下工作者把他救了出来。

坐在游击队的篝火旁，人们很快就变得亲密无间了。就在抵达支队的第一个晚上，久科夫给我们的游击队员朗读了自己写的几首诗。这些诗是他战前写的。

“我带来一位诗人！”尼古拉进城到我的窝棚，自豪地说。他刚才还在听久科夫朗读自己的诗。如果不是有急事找他，他或许不会离开篝火的。

“就这么决定了，科利亚，”我让他坐在我旁边的圆木上，告诉他，“你明天就去罗夫诺市。你的任务和从前一样——搞侦察。不过，还不止这些。你在卢茨克期间，罗夫诺市的地下工作者又一次传出信息，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确实是存在的。现在，全城的人都在纷纷议论传单的事情。这些传单时而在这里，时而又在那里贴出来。我们应该找到这些人，无论如何也要想法找到他们。通过我们熟悉的人，通过

那位东布罗夫斯基，通过各种途径。并且越快越好。”

“是！上校同志，保证完成任务！”尼古拉象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回答得很干脆。

(二)

春光明媚。罗夫诺市的中央广场被德军宪兵队团团围住了。希特勒的军队在广场上集合整队。在悬挂着法西斯国旗的主席台四周，聚集着“贵宾”——军官，帝国专署的行政官员和德国侨民。主席台的下方，挂着希特勒的巨幅肖像，他那双虾米似的眼睛，花花公子似的小胡子，以及垂在窄窄的脑门上的一绺额发，同他的拿破仑式的姿态，是根本不协调的。主席台中央站着一个人法西斯军官。他高大而肥胖，身穿将官礼服，双手垂直，上身略向前倾，象一具僵尸，他有一张虚胖的脸。和肖像上的人一样，一绺额发挂在脑门上。那双浮肿的眼睛正在东张西望。

士兵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在士兵和人行道之间的空地上是三三两两的市民人群。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是什么迫使他们来到广场，参加希特勒生日庆祝活动的？

人群中有一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帽子上佩着三叉戟徽。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挽着一个棕黄色头发的上等兵，那上等兵正在用牙签剔着牙。还有一个头戴圆顶礼帽的大汉，穿着旧式大衣，好象是被从樟脑球堆里拖出来的——他要么是经纪人，要么是个老板……

不远处，在市民人群中，闪现出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的波兰四角帽，再后面便是舍夫丘克的黑呢帽。

而站在主席台周围的客人中，可以看到人们所熟悉的衣

着讲究的中尉，以及靠在他胳膊上的清瘦的姑娘。

站在主席台上的将军对着麦克风，用嘶哑的嗓子喊叫着。那个姑娘更紧地靠在自己男伴的身上，小声问：

“他是谁？”

“他是政府主席保利·达格尔，”男伴用同样的小声回答说。

“是科赫的第一副手吗？”

“是的。”

将军在继续演讲。扩音器把他那象狗叫似的断续而嘶哑的声音，送到广场上各个角落。

“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发号施令，让那些不喜欢这一点的人知道，我们对他们是决不会留情的！”

“霍赫①！”法西斯匪徒齐声叫喊道。

“霍赫！”库兹涅佐夫喊得比别人都响。

“站在左边的那个是谁？”瓦莉娅目不转睛地望着主席台，继续问。

“哪一个？”

“达格尔右边那一个……”

那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将军，也身着礼服，胸前挂满了奖章、勋章。他用那仿佛是吡着牙的嘴一样的凸出来的眼睛注视着广场。现在，他的目光扫过“宾客”席，瓦莉娅觉得，这个瘦长条将军冲她看了一眼。

“他也是纳粹省党部的副头目，”库兹涅佐夫耳语道，“乌克兰首席法官。”

“冯克？”

① 德语中“万岁”的译音。

“不错，轻点。”

“是他？”瓦莉娅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又问：“那个头号刽子手？”

“正是他。”

“我们要抛弃怜悯！怜悯——这是强者的耻辱！我主张残酷无情！”

这时，一个刚抵达广场的将军登上了主席台，他身材高大，脸色发红。

“科赫？”瓦莉娅耳语道。听得出来，她的声音里充满着希望。

“不是，”库兹涅佐夫答道。“这是冯·伊尔根，特种部队的司令，讨伐队的头头。”

埃里希·科赫没有来。看样子，他今天不会来参加庆祝活动了。库兹涅佐夫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已为之做好思想准备的行动，他如此牵肠挂肚、紧张、激动地等待的行动，是实现不了了。舍夫丘克和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克鲁季科夫、格涅久克以及混在人群中的其他侦察员——库兹涅佐夫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库兹涅佐夫——全都在等待着库兹涅佐夫发出的信号，现在看来，也是空等一场了。他们等着他的信号，等得心急如焚，如饥似渴，急不可耐，而库兹涅佐夫也是怀着这种心情等待科赫的出现，这样他好开始“支配庆祝活动”，然而，庆祝活动已近尾声，而最高行政长官、纳粹党部的头目始终没有登上主席台。

“这下完了，”瓦莉娅轻轻说道。库兹涅佐夫听见，她长叹了一口气。

主席台上的人开始走动了。达格尔将军离开自己的位置

狗出口走去。主席台上的人一动，顿时影响到“宾客”席：他们说起话来，并开始散去。有个人向库兹涅佐夫招呼了一声。他转过身来，看到是他最近结识的一个“朋友”，他长着一张哈巴狗似的小脸。

“哦，马克斯·亚斯科韦茨！”

“见到您很高兴，中尉！见到您很高兴，小姐！”

亚斯科韦茨今天没有穿盖世太保的黑色外套，而是穿了一件作工考究的浅色便服大衣。他身上的一切——浅色大衣，黄手套，那颗脑袋，哈巴狗似的小脸，高高竖起来的深红色耳朵以及那副虚情假意、故作殷勤的嗓子——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使人感到厌恶。库兹涅佐夫看着亚斯科韦茨，他似乎觉得，只有现在他才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他没有如原来想往地那样开枪，没有“支配庆祝活动”，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现在，他又得听亚斯科韦茨乱吹一通，而且要同他和类似他这种人一起瞎吹，就这样无所事事，直到深夜。然后他才能一个人待几个小时。不过，那毕竟只有几个小时而已。一到天亮，亚斯科韦茨，那些陌生、格格不入的人，以及那些令人恨之入骨的东西就又来了……

“我们走，瓦莉娅，”他说，“时间不早了。”

广场上的人陆续离去了。

从广场出来的时候，他发现，斯特鲁京斯基兄弟在不远处没精打采地徘徊，舍夫丘克正在离开广场，还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好象也是从支队来的……他们这么多人都到了这里！真想走近他们，说几句话诉诉行动受挫的苦闷和忧愁……然而，不行，他不认识他们，他是德国人，是老普鲁士的后裔。他走着，把头高高抬起，把女伴的手臂挽得更紧了。

而亚斯科韦茨在这却碰上了许多熟人，他一会儿同这个

人，一会儿又同那个人打招呼。这些人一无例外全是军官。这倒不坏。这些人的情况各不相同。对一些人，亚斯科韦茨或者点头致意，或者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或者深深地鞠躬——真是看人下菜。而对另外一些人，亚斯科韦茨认为有必要攀谈一番。这不，他老远看到一位少校同一位衣着漂亮的姑娘手挽着手地走过来，他招呼了一声，张开双臂，快步朝他们迎去。不一会，少校、姑娘以及咧嘴大笑的亚斯科韦茨就来到瓦莉娅和库兹涅佐夫的面前。

“你们还不认识吧？”

姑娘从容大方，向四个人露出甜蜜的微笑，爽朗地说：

“让我们认识一下……我叫迈娅。”

“冯·奥尔特，”少校自我介绍道。

“齐贝特。”

“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您……”少校注视着新相识说。

“有可能，”库兹涅佐夫表示同意道。他嘴角掠过一丝笑容。“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地方，可以不费劲儿地见到军官……”

“男人之间的谈话开始了，”迈娅故意带着委屈的神色，插言道。“小姐，我们不听他们谈话，”她对瓦莉娅说，并伸手挽起了她的臂膀。“我们到前面去。”

库兹涅佐夫告别了他的新“朋友”，送走了瓦莉娅，往家走时，天已很晚了。他住在城郊普里霍季科的哥哥伊万家里。夜色中，他一个人沿着万籁俱寂的街道往前走，唯有沙沙的细雨声打破了这沉寂。只在此时，他才能够想一想四月二十日这一天给他带来的一切，认真思索一番。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他原准备开枪打死科赫——但是科赫没有出席庆祝活动。他的枪声原应该成为动员人民群众奋起反抗的

信号，成为对法西斯头目采取惩罚行动的信号。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他也已做好自我牺牲的准备，甚至就此给支队写了一封信。可是，自我牺牲并没有实现。他深深感到孤单和无能为力。

突然，他放慢了脚步，接着停下来。不远处，在一所屋子的墙上有什么东西隐约可辨。

他往四下望了望，从衣袋里掏出电筒，一束光线射向贴在墙上的传单。

“达格尔在撒谎，”库兹涅佐夫读道，“我们的土地永远也不会成为德国人的！胜利属于我们！……”

熄灭了电筒，库兹涅佐夫依然站在传单前。

他意外地发现，一个身影在马路对面闪了一下。他穿过马路，仔细地用目光搜寻着，一个人也没有。旁边的墙上也贴上了传单。他再次打开电筒，发现传单的内容相同！

“同志！”库兹涅佐夫压低嗓门叫道，“同志！……”

附近连个人影也没有。马路上空空如也。

库兹涅佐夫沿着马路，迈着坚定的脚步，满怀信心地往前走。他又感到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好象推着他的脊背，督促他沿着夜深人静的马路前行。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有同志们在活动。他恨不得放声大叫，要让大街小巷，要让那关门闭户熄灯沉睡的幢幢房屋听到，要让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揭露达格尔谎言的人们听到，他不是一个人，乌克兰还活着，她没有向厚颜无耻的敌人卑躬屈膝。

……第二天早晨，库兹涅佐夫见到瓦莉娅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她，地下组织在活动。他的情绪异常激动、热烈。言谈之中流露出对进行公开斗争的人们的羡慕之情。

“前两天我遇见一个熟人，”瓦莉娅说，“他是本地人，

老早就同我们全家人认识。他承认，他曾经和波兰人的地下组织联系过，但是他离开了他们。他说：我想干一番事业，但他们却在那里按兵不动。他向我打听，问我知道不知道谁是罗夫诺市的苏联地下工作者。”

“这人怎么样？对我们有没有用？”

“要观察一下。他们家的人都很好。他把地址给我留下了。”

“你介绍我同他认识一下！”

第二天他们就见面了。

这位新相识原来是个身材虽然不高，但却长得相当结实的波兰青年。他俄语讲得不好，而且有点胆怯，也许是库兹涅佐夫那身制服把他给窘住了。

他叫扬·卡明斯基。

“您在罗夫诺市有熟人吗？”库兹涅佐夫当即问道。

“很多。”

“是德国人吗？”

“德国人也有。有一个叫施密特。”

“他在哪里工作？”

“在帝国专署的一个机关。他负责训练军犬保卫科赫。”

“您曾参加过的那个波兰人地下组织叫什么名称？”

“用俄语说是《武装斗争联盟》。它与华沙总部和伦敦方面保持着联系，他们招兵买马，积聚力量。高谈阔论，可从来没有主动出击过一次。他们这样干，和当合法议员差不多。我不能这样，我要斗争！我看到的是，在波兰，在这里，在整个乌克兰，希特勒匪徒把无辜的人民关进地下室，在每一处空地上都竖起了绞刑架！我应该进行斗争！”卡明斯基

好象非常喜欢“斗争”这个字眼似的，不断地重复道。

库兹涅佐夫看着他那红通通的脸和那饱含激情而闪闪发光的眼睛，暗暗寻思：

“这个青年讲的也是要斗争，他想进行公开的反抗……遗憾的是……又要让他大失所望了！”

想到这儿，库兹涅佐夫告诉卡明斯基：

“您要干一番真正的事业，这很好。但是您要明白，不论您走到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完全象您想象的那样，手持武器，公开地向敌人开枪射击，短时间内还做不到这一点。而且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干。您能不能向我们提供一些情况，帮助我们？如果说您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真正希望波兰获得解放的话，那么，您要完成我们要求您完成的一切任务。”

“我同意。”

“好，您把誓言写下来吧！”

卡明斯基顺从地点了点头，把铅笔拿在手里。

卡明斯基慢慢地读了一遍自己所写下的誓词，然后在誓词的下方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您要记住，”库兹涅佐夫提醒他，“要一声不响，绝对保密。您的任务是搜集希特勒军队的情报以及法西斯匪徒在乌克兰的活动情况。您将执行由瓦莉娅传达的命令。您明白我说的话吗？”

“我明白。”

“明天将向您布置具体任务，见面的地点和时间由瓦莉娅本人告诉您。还有一点：不要忘记——您同我互不相识。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没有得到我的指示，您都不要露出认识我的样子。”

库兹涅佐夫紧紧地握了握卡明斯基的手，和他告别了。

晚上，“朋友们”聚集在瓦莉娅的房间里。桌子上摆满了吃的、喝的。一伙人有说有笑坐在桌旁：冯·奥尔特，迈娅，齐贝特，同纳粹省党部头目一起从克尼希斯贝格市米罗夫诺的帝国专署工作人员格哈德，荷兰籍盖世太保分子彼得——谁也不知道他姓什么。还有马克斯·亚斯科韦茨。

保利·齐贝特和往常一样，活泼、开朗而不知疲倦。

“迈娅小姐！”他转向姑娘说道，“您应该唱支歌，我们请您唱歌！……”

“我唱不了……”迈娅娇媚地拒绝道，“我不会唱歌，保利。”

“请唱一支吧！”军官们响应说。

这伙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不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这就是瓦莉娅。她靠在沙发背上，默默地观察着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她的那双眼睛，也许是由于灯光太刺眼，也许是烟熏的，差不多是眯着掠过客人们的脸。迈娅终于答应唱歌，装腔作势，等人安静下来。瓦莉娅把脸转向迈娅，她们的目光相遇了。迈娅这是怎么啦？为什么她还不唱？她在沉默寡言的瘦削姑娘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指责？鄙视？然而你瓦莉娅本人不也是同希特勒分子打得火热吗？迈娅——库兹涅佐夫看得十分清楚——是以仇视的目光回敬了瓦莉娅一眼。然后，她开始唱歌了。起初她唱得强烈而愤恨，仿佛是为了向瓦莉娅进行报复。这时，迈娅已经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看着瓦莉娅。她唱的是一首德国夜总会上的流行歌曲，既富有刺激性又粗犷下流。

“好极了！”迈娅唱完时，齐贝特第一个赞叹道。迈娅

向听众送了一个飞吻。“我为女人干杯！”

“为女人干杯！”冯·奥尔特响应这一提议，端起了杯子。“诸位，为女人干杯！”

“为那些，”齐贝特接着说，“美化我们战时生活的人干杯！”

肥头大耳的格哈德，嘴里一直不停地吃着，这时也郑重其事地说道：

“请起立，先生们！……”

“请听我说，齐贝特，”冯·奥尔特放下空酒杯说，“我知道，您反对在一起谈论公务方面的事情，但有时候……”

“我绝对反对，少校，”齐贝特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娱乐。”

“我同意，我同意，”冯·奥尔特笑道，“您，齐贝特，真是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人，我真舍不得离开您！”

“您要走吗，少校？”彼得的目光投向奥尔特。

“有这个可能。”

“很远吗？”

“接到命令，我才能知道路线。”

“诸位先生，”齐贝特坚决要求道，“不要谈论公务方面的事情！”

然而，围绕着冯·奥尔特要离开这件事，谈话还在继续。

“我真羡慕您，”格哈德对冯·奥尔特说。“只要能离开这个可恶的国家，我愿意献出一切。”

“又发生了什么事？”瓦莉娅问。

“穆尔巴赫中校昨天晚上在街上被人打死了。”

“哪一个穆尔巴赫？”齐贝特顺口问道。

格哈德就说出了穆尔巴赫原在师的番号。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师驻在科韦尔市，正准备开赴前线，穆尔巴赫这次到这里来是为了办理自己的一些私事，呵，这下子可好……”

“是啊，”马克斯·亚斯科韦茨证实道，“游击队的活动太猖獗了。夜里上街是很危险的。即使在这儿，在首都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农村啦！”

“亲爱的，”迈娅对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冯·奥尔特说，“您可曾见过真的游击队吗？”

“我？”冯·奥尔特哈哈笑道，“我？……过去有谁见过他们？只是今天我才有幸同他们的一个喽罗谈话。给您，开开眼界吧！”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份揉皱的传单，交给正在吃东西的格哈德。格哈德仿佛害怕被伤着似的，用两个手指头夹住传单，接了过来。然后又用同样的动作把传单传给库兹涅佐夫。

库兹涅佐夫看了看传单，这正是检阅那天夜里他见到过的。

冯·奥尔特继续说：

“你们猜这个喽罗是什么样的人？原来是个上了岁数的，四个孩子的父亲。”

“传单是他一个人印的吗？”瓦莉娅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是夜里在街上被发现抓获的，当时他正在贴这种传单。他当然只是干这种勾当的那伙人中的一个。他拒不供出其他人的名字。”

“您是如何同他交谈的？”迈娅关切地问。

“非常简单，”冯·奥尔特心平气和地答道，“取一根小钉子，就象这个，”说着便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钉子。

“把它放在火上烧得红红的……”

“别说了！”迈娅突然用哭腔喊道，她眼中噙着泪水。

“别说了，”齐贝特请求道：“女人受不了这个。今后我们说妥了谁也别谈公务方面的事情。我们最好还是喝酒吧！”

库兹涅佐夫定期向支队发回报告，把法西斯部队的部署变化，罗夫诺市希特勒匪徒机关的活动以及帝国全权代表科赫的最近计划等情况，通知支队。每次他都在信的结尾请求允许他采取积极行动。

“我不能，”在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我不能和他们并肩地坐在一起，和他们一起谈笑並随声附和、唯唯诺诺。我要把他们干掉！为什么不让我这样做？难道我同大伙一样是一个战士吗？”

对他的请求，支队的答复始终如一，即：

“要继续进行侦察工作，积极行动还须等待。”

使库兹涅佐夫深感苦恼的工作是至关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他所提供的情况，我们都立即报告了莫斯科。大概这些情况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统帅部的重视。库兹涅佐夫所结识的朋友对他开展工作大有帮助。正是这些库兹涅佐夫所建立的关系使我们在罗夫诺市真正站稳了脚跟，並能够最终采取积极行动，而这正是库兹涅佐夫梦寐以求的。

在新结识的朋友中，库兹涅佐夫尤其重视冯·奥尔特。

他们俩经常在一起。他们常在娱乐场会面。那里的环境非常适于两个人推心置腹地交谈。不久，齐贝特中尉对盖世太保的奥尔特少校已经了如指掌，而盖世太保的这个少校仅仅知道齐贝特中尉的一些简单情况。他们的交谈不涉及任何公务秘密，也没有提过什么敏感的问题——没涉及过任何可能使这位饱经世故、阅历深广的盖世太保少校警觉的问题。他们谈论人生，谈论女人，甚至谈论他们双方都谙熟的艺术。这都是些无碍大局的议论，不外是对往事的回忆，对未来的憧憬、幻想将来战争结束后在定居地如何休假等等。然而，这些海阔天空的闲聊比那些使一个侦察员感兴趣的谈话更能吸引库兹涅佐夫。而他同冯·奥尔特在一起时却总是避而不谈那类话题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觉得奥尔特是一个有经验的秘密警察，同他交往应小心谨慎，更主要是因为冯·奥尔特身上有一种别的东西使他感兴趣。这些东西不可能成为任何情报，也不可能成为发往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报告。然而，库兹涅佐夫却如饥似渴地、执拗地想弄清这种东西的实质。

一天，他们谈论起俄国。冯·奥尔特蹦出了一句“俄罗斯人心神秘莫测”的话。这些陈词滥调，库兹涅佐夫听到过多次。很多德国人喜欢重复这句话。尤其是那些象冯·奥尔特一样的刚脱下大学生校服，穿上军装的人。他们全都无一例外地愚蠢而令人作呕地高谈阔论这个“谜”。奥尔特虽然讲起俄语不比库兹涅佐夫讲起德语来得差。如果库兹涅佐夫对冯·奥尔特其人的灵魂不是深感兴趣的话，他也许会忽略这句话的。冯·奥尔特的灵魂对于库兹涅佐夫来说，简直是个谜，所以他决意要解开这个谜。

这期间，这伙朋友的人数不断增加。齐贝特中尉以其思

路敏捷、善于交际，主要的是慷慨大方，成了这伙人的真正首领。在法西斯军官中间，自己吃喝玩乐而让别人掏腰包者不乏其人。在德军占领区使用的马克，我们能够一车一车地从敌人那里抱过来。因此，库兹涅佐夫手头是不缺钱的。他的做法也正如俄罗斯谚语所说：“有猪槽在，还怕找不到猪。”

库兹涅佐夫和瓦莉娅经常与之交往的“社交界”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痛苦。听了冯·奥尔特恬不知耻的自白以及格哈德·彼得和亚斯克韦茨是如何刑讯和折磨我们的和平居民的讲述，库兹涅佐夫和瓦莉娅怒不可遏。每当这种“友谊”晚后之后，出于愤恨，也由于疲劳，他们真想呻吟。库兹涅佐夫变得愈加沉默寡言和抑郁。他可以整天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瓦莉娅同迈娅继续相互嫉恨，迈娅不知道瓦莉娅是游击队的侦察员，而瓦莉娅也不知道，迈娅按照科利亚·格涅久克的指示，已经工作一个多月了。

没过多久，出了一件麻烦事，差点使我们把瓦莉娅召回支队。一天早晨，库兹涅佐夫顺便到瓦莉娅那儿，走了一趟，看到她正心神不定。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是的，我收到了通知书。”

“什么通知书？”

“动员去德国，”她颤抖着说。

“应该回支队去，”库兹涅佐夫说。

“得了吧，”瓦莉娅被激怒了，“回支队，就会丢掉一个接头地点！”

“这有什么办法！”库兹涅佐夫深思着道。他突然向她建议，“试一试，逃开动员，你看怎么样？”

“可以。但是，怎么个逃避法呢？”

“这得动动脑子，好好想一想。”

“请你的朋友冯·奥尔特帮帮忙怎么样？”

“不妨请他帮忙，但是，别急！……”

一个念头闪过，库兹涅佐夫站起身，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还有一个人，我设法去见见他，无论如何，我们不会让你到德国去。以后见到奥尔特或是哪个‘我们’熟识的军官，可顺便就通知书的事放放风，就当是误会和笑话说给他们听。”

“如果非回支队，就太可惜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安排好了这一切。再说，在支队我又能干什么呢？”

“你先别急，还没有到非回支队不可的时候。再说，小姐，您别忘了，您是德国军军官的未婚妻。如果他不能使未婚妻免遭不幸，他就一文不值。”

从这一天起，库兹涅佐夫成了“弗里德里希大街”一家娱乐场的常客。据扬·卡明斯基讲，经常去这家娱乐场的还有一个帝国专署的军犬教练员，名叫施密特。他是科赫的副官巴巴赫上尉的同乡，他曾向卡明斯基夸口说，他同上尉过从甚密，卡明斯基一个劲地建议库兹涅佐夫同这个施密特谈谈自己的心事。

……施密特，这个棕黄色头发，满脸雀斑的上等兵，奴颜卑膝地望着使他有幸在娱乐场进午餐的中尉，牢骚满腹地诉说着自己不称心的差使。

“军犬都喜欢我，可我的待遇很差，齐贝特中尉先生。

我过去一无所有，将来回到家里还是一无所有。别人回去后将开小店铺，结婚——等待他们的是舒舒服服，安居乐业，生儿育女。”

“请您相信我，我将把您带到我父亲的庄园去！”中尉当即许愿说。

“您的心肠太好了！”施密特感恩不尽地反复说道：“您的心肠太好了！”

施密特告诉库兹涅佐夫，在地方长官军犬舍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已经提供了七只受过训练的军犬。现在他正在训练第八只。这只军犬就卧在“帝国训犬员”的脚边，很讨他的欢心。其实，中尉对军犬也非常感兴趣。

“八只军犬中，这是最好的一只，”施密特兴奋得简直上气不接下气了。他说：“我向您发誓，它能闻出谁不是阿里安人！”

“这个我相信，要是游击队呢？”

“噢！……游击队——一公里之外也能闻得出！”

然而，这仍然不能使这个上等兵的心里感到舒坦。他继续抱怨自己不幸的命运。

“我在罗夫诺市有一个女朋友，真象个馋猫，她是波兰人，一个凶猛的姑娘。而我，中尉先生，从小就喜欢凶猛的东西……但是，她给我带来莫大的痛苦。谁能相信，一个满脸麻子的盖世太保常去她那儿，并带给一些礼物。今天送她一条裙子，明天送给她一块小表，后天又送她什么金银首饰。这些玩意儿对于他来说，搞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只要进行一次搜捕——就什么东西都有了。我的美人就这样和盖世太保粘糊上了。”

“我的亲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库兹涅佐夫

叹了口气说，“就拿我来说吧，我有的是金钱，”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搞得到……”

“真的？”

“请您常到我家来，我送您点东西，保您美人喜欢。我说的是真的……”

“这怎么说呢？！”

“为了友谊，施密特，我喜欢您。为了您的了不起的军犬干杯！”

“施密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库兹涅佐夫长吁短叹地继续道，“我的未婚妻竟无法作为德意志人进行注册，她父亲被暴徒杀害了，所有的证件都落入暴徒的手中。她怎么也不能证明她是阿里安人……”

“那是，那是，”施密特同情地摇起了头。

“但是，还不止是这些，”库兹涅佐夫俯身凑到上等兵的耳边，“我的未婚妻被动员去德国！”

“啊呀，真是，不幸！”

“您瞧，每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不错，不错，”施密特深感痛心地说，“如果小姐能在帝国专署工作就好啦！”

“难道能找到这么一个能替我安排这事的好心人吗？”

“这相当困难。如果小姐能有证件的话……”

“不知是真是假，”库兹涅佐夫探问道，“听说只有赫赫长官一个人能决定这种事？”

“不错，唯有他一人，”训犬员证实说。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同乡：“巴巴赫副官是我的至交好友，我同他的关系嘛……也许让小姐写份申请，我们悄悄地塞给他……”

“谢谢您，施密特，”中尉谢道，“您的事情我会关照

的，您尽可放心。我要带您去我们家的庄园。也许，您需要钱用吧？”库兹涅佐夫取出一大叠钞票。

“这可真是，我怎么好意思……”施密特的脸上露出非常激动的神色。

“啊，这么客气干吗！帮助朋友是我们的神圣天职，难道您不是基督教徒吗？”

“我懂得这些高尚的品行！”训犬员激动地说，一边急忙把钞票藏入衣袋。

他们约定下次再见。第二天，还是在那个娱乐场，等待训犬员的是和昨天一样丰盛的午餐。施密特报告说，行政长官外出了，要到五月上旬才能回到罗夫诺市。

“现在他在柏林，参加冲锋队参谋长吕策的葬礼。等他一回来，我们就把瓦莉娅小姐的申请递给他。关于她的情况，我先同巴巴赫聊聊。噢，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五月十日这天，施密特来见瓦莉娅，得意洋洋地告诉她，科赫已经回来了。他还说，他同副官的谈话卓有成效。

“巴巴赫副官让我转告，希望齐贝特中尉也同您一起去。也许行政长官先生想亲眼看看。”

瓦莉娅好不容易才等到库兹涅佐夫到来。他刚一进门，瓦莉娅就迎向前去，把从施密特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是这样，”库兹涅佐夫慢声说道，“好吧，既然他们发出了邀请，那就是说，应该去。”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真正想建立功勋的话，你就应该把科赫干掉！”瓦莉娅急不可耐地说。

“可支队长允许吗？”

“你一定要得到允许吗？要知道上次庆祝大会……上次

庆祝大会时我们就打算把他干掉的！”

“那是公开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市民的面，我们会得到支持的。况且，那一次也不只限于杀一个科赫，而是要把全体上层人物都干掉。这一次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那怎么办？”瓦莉娅抑郁不欢地问了一句。

“应该写信告诉支队长。”

说来也巧，这天晚上小科利亚来了。他匆匆走进房间，往椅子上一坐，一句话没说就动手拆起裤子上的秘密口袋。两天来，小家伙跑完了从“了望站”到城市的六十多公里，风尘仆仆，累得面如土色。他给库兹涅佐夫带来了一大笔钱，还有一封信。来信中指出，指挥部特别感兴趣的是驻扎在罗夫诺地区的敌军由哪些兵团部组成。瓦莉娅安顿小家伙吃饭，然而他没吃几口就倒在桌子上酣然入睡了。

库兹涅佐夫把他抱起来放在了沙发上。

“真舍不得叫醒他，”库兹涅佐夫说，“但是必须叫醒他。”

“是的，”瓦莉娅同意道，“你先坐下，给支队长写封信吧。”

时间是宝贵的。科利亚应该赶回营地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回来。在他们应召去科赫那儿之前——这也许很快会发生，——科利亚应该带着指挥部的答复赶到这儿。尽管如此，他们迟迟下不了决心弄醒小家伙。

瓦莉娅终于轻轻地唤了科利亚一声。

小家伙没有醒。

“科利亚！”她又叫了一声，一边推了推他的肩膀，“你快起来！”

科利亚仿佛听到了口令，一骨碌折起身，揉了揉眼睛。

库兹涅佐夫把一封信递给他，说：

“你把它藏好！”

科利亚掀起衣服，把信藏好，然后俯身拿起帽子，从帽子里取出针线，一丝不苟地把口袋缝了起来。

科利亚走后，库兹涅佐夫若有所思地说：

“瞧这个小家伙……”

他这么讲不知指的是什么，也许是夸奖这个小家伙，也许，是为现在的“孩子”却要经受如此严峻的、非孩子所应经受的考验而感到哀痛。

“是啊……”瓦莉娅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句。

这时，瓦莉娅陷入了沉思。

她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阴森、昏暗的大厅。低低的、象低垂的乌云似的拱门悬挂在半空。大厅深处是一张笨重的大桌子。旁边坐着一个肥头大耳的人，一束额发耷拉着，垂在鼻梁骨上，一双闪着绿色幽光的、在昏暗中隐约可辨的眼睛。这时，库兹涅佐夫全身发光，他走进这座地下室，把一切照得如同白昼。在他擎起的手中，手枪闪着兰光。库兹涅佐夫愈是逼近那肥胖的家伙，那家伙就愈往后退缩。他退向墙角，浑身颤抖着，那双眼睛被刺人、耀眼的光照得眯了起来……

突然，一个简单、清晰、明确的念头排斥了一切，闪现出来：

“他如果只见我一个人怎么办呢？”

“如果他见你一个人……”库兹涅佐夫重复道，“那也无妨，你来试一试。”说着他掏出手枪，下掉子弹，枪机咔嚓响了一下。随后把枪递给瓦莉娅：“你来试一试。”

瓦莉娅用手指扣住板机，使劲往后拉，拉了好大一会也

未能勾响板机，终于绝望地把枪放下了。

“不行，这一支我用不了。给我换一支！有一种手枪我能打响，给我找来，你听见没有？”她对库兹涅佐夫强调说，“你想想：万一他只见我一个人呢！……”

库兹涅佐夫把另一支手枪递给瓦莉娅。这是一支“瓦尔特”二型手枪。

瓦莉娅手握枪柄，食指紧压板机……手指的力量自然达不到击发的程度。于是，瓦莉娅改用双手握枪，嘴唇、眉毛、眼睛——整个脸都绷得紧紧的，枪机终于发出了击发的声音。

“成功了！”

“你打算用两只手射击吗？”库兹涅佐夫接出手枪，微笑着说。“你现在最好还是坐下来写你的申请书吧。”

瓦莉娅顺从地坐下来。

“作为一个父母都是纯阿里安人血统的德国人，”库兹涅佐夫口授道，“作为被苏联游击队杀害的人的女儿，我请求帝国全权代表先生……”

瓦莉娅抬起了眼睛：

“当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向他开枪！”

“好的，”库兹涅佐夫应道。“你继续写：‘我请求帝国全权代表先生允许我留在罗夫诺……’”

瓦莉娅一行字还没有写完就又停下了。

“你一定会开枪吗？”她问。

“是的。我想，支队长会同意的。我一定开枪……”他迟延了一下，又补充道：“如果我确信我能把他打死的话。”

无论是库兹涅佐夫还是瓦莉娅，那时谁都没有想过，对

于他们本人，对于他们的个人命运来说，“打死他”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三)

五月中旬，微风轻拂，阳光灿烂。一天下午将近四点钟，一辆马车，装饰得漂漂亮亮，由两匹高头大马拉着，威风凛凛地出现在罗夫诺市一条主要街道——“德国大街”上。车上的乘客不可能不引起过往行人的注意：一个衣冠楚楚的军官，身边坐着一位姑娘，他们对面是一个棕黄头发的上等兵。一只军犬卧在他们的脚下。马车从“德国大街”拐向“弗里德里希大街”，径直向它的尽头跑去。“弗里德里希大街”是德军机关集中的地方。大街的一头是帝国专署所在地。就在此处一条死胡同里那高高的架着带刺的铁丝网的围墙内便是帝国全权代表埃里希·科赫的府邸。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匪徒，手持冲锋枪，沿着人行道，走来走去地巡逻着。

库兹涅佐夫穿着一套在将官缝纫社定做的新制服，肩章银光闪烁，胸前衣袋上方，缀饰着国社党党员徽章，徽章旁边是两枚铁十字勋章。他那身新崭崭的制服，擦得油光锃亮的皮鞋，说明他是一个战功卓著、出类拔萃的军官。

马车前沿，手拉缰绳、坐在驭手座位上的是科利亚·格涅久克。“马车夫”的衣袋里藏着手枪，而在座位底下是几颗手榴弹。

军犬，就是那只在一公里之外也能闻出游击队的军犬，一动不动地卧在“帝国训犬员”的脚下打盹。他要把它带到帝国全权代表府邸，将其交给军犬舍主任。

当马车驶近帝国全权代表府邸大门时，训犬员第一个跳

到了人行道上。

“我们先去警卫室，”训犬员向库兹涅佐夫建议道，“让小姐在这里等我们一下。”

在警卫室，他冲着一个小窗口问：

“齐贝特中尉和多夫格尔小姐的通行证准备好了吗？”

对训犬员特别熟悉的党卫军匪徒，甚至连证件都没让出示，就把早已准备好了的两个通行证递了出来。

科赫的私宅位于一个大花园深处。周围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橡树、椴树和槭树。树荫遮住了林中小路和绿色的草坪。几个花匠正在花坛里忙着给花木修剪枝条。在一条主干道旁有一座小丘。这里的丁香花灌木丛中，有几排舒适的长凳——不言而喻，这是全权代表在酷暑时节乘凉休息的地方。靠右侧，在太阳能晒得着的地方是一个大游泳池——全权代表显然是在这里游泳。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不能逃脱库兹涅佐夫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

除了科赫住的一幢独立的那层楼之外，围墙内还有几幢房子，那是保卫行政长官大人的军犬舍、副官住宅、公务员及贴身警卫员住的房子。

元首的这位全权代表，简直象是龟缩在铜墙铁壁之中。在乌克兰人民面前，他草木皆兵、惊恐万状，不得不使用武装到牙齿的卫兵来保护自己。

我们制定了不知多少次奇袭这个全权代表府邸的计划，而终于没能付诸实施，这是因为我们确信，即使我们全都献出性命，也仍然不可能接近科赫。

“请您们先去副官那儿，我去转交军犬，”施密特对库兹涅佐夫指了指大门入口说。

这时，就剩下库兹涅佐夫和瓦莉娅两个人在一起了。

“保利，”瓦莉娅轻轻地叫了他一声。她把握不准能不能叫他的真实姓名。

“你想说什么，我的亲爱的？”库兹涅佐夫眉开眼笑地问。不知道他这样称呼她是郑重其事呢还是继续演戏。突然，他俯身对她耳语道：“你从科赫那儿一出来，一分钟也不要停留，赶快去到街上，坐上马车，在城里你将见到斯特鲁京斯基，然后你们就一同返回支队，不要耽搁。”

瓦莉娅急忙把头一扭说：

“不！”

“这里有一人就够了，瓦莉娅，”库兹涅佐夫还是那么轻轻地然后又是坚定不移地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我决不会轻松的，如果他们把你也……”

他推开了门。

巴巴赫副官，一个非常讲究衣着的军官，身穿上尉军服。他领着他们上了二楼，走进了接待室。这里已经有几个军官在等着接见。靠近窗户的椅子上坐着的是一名将军，他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在等着叫他的名字。

“我去通报一声说你们到了，”巴巴赫说完就进去了，并且随手关上了门。

一个小个子、狡黠的陆军军官，向瓦莉娅点点头，诡密地问库兹涅佐夫：

“您的？”

“我的，”齐贝特打量了他一下答道。

“听说今天地方长官的情绪特别好，”军官仿佛为自己不得体的发问表示歉意似地说。“我们已经等他一个多小时了。”

沉重的门开了一条缝，副官来到接待室。

“长官要接见您，”他对瓦莉娅说。

说着他拦住了已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的库兹涅佐夫：

“只接见小姐一人。”

库兹涅佐夫心里有点发慌。他没有料到，召见的不是他，而是瓦莉娅。他控制住自己，对那位陆军军官随口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仍旧坐回到椅子上。

……在科赫的办公室里，瓦莉娅刚刚向前迈了一步，一只高大的军犬跳跃了两下便窜到了她跟前。瓦莉娅吓了一跳。

这时有人大吼了一声：

“回去！”那只军犬便走开了。

在办公室深处，希特勒肖像下面，摆着一张笨重的大办公桌。桌后，科赫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他膘肥体壮，留着希特勒似的小胡子，长着两道长长的棕黄色眉毛。三名盖世太保的秘密警察，身穿黑色制服，站在离他稍远的地方。

科赫一声不吭，指了指办公室中央的椅子示意让瓦莉娅坐下。瓦莉娅刚走近椅子，一名盖世太保分子立即站在她和科赫中间，另外一名站在瓦莉娅的椅子靠背后面，第三名靠墙站在科赫身后稍靠右一点的地方。在黑色帐幔的衬托下，科赫的那身盖世太保的服装难以分辨，唯有他身上的纽扣、皮带扣以及各种徽章，闪闪发光，使他显得更加凶神恶煞。瓦莉娅发现，帐幔动了一下，在这一瞬间，她看见在沉甸甸的帐幔褶皱中，露出了那只军犬的呲牙咧嘴的脸。

“为什么您不想去德国？”瓦莉娅听见科赫在问她。他坐在那里。两眼盯着面前的一张纸。她认出来那是她写的申

请书。瓦莉娅有点犹豫，一时不知从何讲起，没有立即回答。“为什么您不想去德国？”科赫抬眼望着瓦莉娅又问了一遍。“您作为一个具有德国血统的姑娘，在祖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妈妈病得很厉害，”瓦莉娅轻轻地说，努力把话说得令人信服。“妈妈有病，除了她，我还有几个妹妹……父亲死后，我一个人工作养活全家。长官先生，我请求您让我留在这儿。我懂德语、俄语、乌克兰语和波兰语，我在这儿也能为德国服务。”

“您在什么地方同齐贝特军官认识的？”科赫盯着瓦莉娅问。

“是偶然认识的，在火车上……后来，他从前线回来顺路到了我们家……”

“您有没有证件能证明您的祖先是从小德国迁来的？”

“证件在我父亲身上。他被害之后，证件就散失了。”

科赫的态度变得和蔼了些。他一会儿用德语，一会儿又用流利娴熟的波兰语同瓦莉娅交谈，询问姑娘罗夫诺市民的情绪，尤其关心她还同哪些德国军官认识。在自己熟识的人中，她不仅说出了帝国专署工作人员的名字，而且说出了几个盖世太保人员，其中有一个就是冯·奥尔特。听到这儿，科赫放心了。

“好吧，您可以走啦。让齐贝特中尉进来。”

瓦莉娅同副官一起回到了接待室。

在接待室，那几名军官仍在坐等科赫的接见。在众目睽睽之下，瓦莉娅不能同库兹涅佐夫说上半句话，以防露出什么马脚。然而，她是多么想把她在办公室亲眼见到的一切全都告诉给库兹涅佐夫啊！库兹涅佐夫发现，在她的眼睛里流露

出某种犹豫不决的神色。他抬起头，仿佛想说：“没关系，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的。”然而在他的目光中显示出的却是请求：“你赶快离开这儿！……”瓦莉娅等到库兹涅佐夫消失在那扇沉重的大门后，这才摆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在那张离正在打盹的将军不远的椅子上坐下了。这时，她觉得自己心神不宁，如坐针毡。

“希特勒万岁！”一跨进办公室的门坎，库兹涅佐夫伸出手臂，大喊了一声。

“万岁！”从桌子后边传出了一个懒洋洋的声音。“您可以坐下啦。我不赞成您的选择，中尉！如果我们的军官都来庇护被战败种族的姑娘，那么谁在我们的工厂里干活呢？”

“小姐是阿里安血统，”库兹涅佐夫委婉地反驳道。

“您有把握吗？”

“我认识她父亲，这个可怜的人成了暴徒的牺牲品。”

科赫那刁钻、搜寻的目光落在了库兹涅佐夫胸前的铁十字勋章上，落在了带有“卍”字样的圆形徽章上。

“您是国社党党员吗？”

“是的，长官先生。”

“您是在哪里获得的十字勋章？”

“第一枚在法国，第二枚在东线。”

“您现在在干什么？”

“我负伤之后临时负责本部队地段上的供给工作。”

“您的部队在哪里？”

“在库尔斯克。”

“在库尔斯克？”

科赫那搜寻的目光同库兹涅佐夫的目光相遇了。

“可您，中尉，一个前线的军人，国社党党员，打算同

一个出身值得怀疑的姑娘结婚吗？”

“我们已经订婚了，”库兹涅佐夫摆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承认道，“而且我即将获准休假。我打算带未婚妻去见我的双亲，求得他们的同意。”

“您的出生地在哪里？”

“克尼希斯贝格，我父亲拥有世袭的领地……我是独子。”

“打完仗您打算回家吗？”

“不，我打算留在俄国。”

“您喜欢这个国家？”听得出来，科赫的话里不乏讽刺之意。

“我的职责就是竭尽全力让我们大家都喜欢这个国家，长官先生！”库兹涅佐夫回答得十分坚决、果断。表现出他对自己所说的一切的正确性坚信不疑。

“说得好！”科赫赞扬道。随后把放在他前面的瓦莉娅的申请书往自己身边挪了挪。

在这一刹那，库兹涅佐夫的身体第一次如此明显地感觉到了右侧裤袋里的那支张着机头的“瓦尔特”手枪。他的手慢慢地往下滑动了一下。他抬眼看见那只军犬正张着嘴、呲着牙，几个盖世太保匪徒也虎视眈眈盯着他。他似乎觉得，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他这只刚刚滑向口袋而此时不动的手上。

开枪？根本不可能。他们决不会允许你把手伸进口袋，更不用说掏枪了。稍有动静盖世太保匪徒就会猛扑过来。而站在椅子靠背后边的那个秘密警察，体向前倾，离得那么近，连喘气都听得到。他随时都准备抓住你的胳膊。

这时科赫往椅背上一仰，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象您这样打算为征服东方的土地而献身的人，要能记

往点东西是十分有益的。中尉，您认为，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谁更危险，乌克兰人还是波兰人？”

中尉对此有他自己的见解。

“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对于我们同样都是危险的，长官先生！”他这样回答。

“中尉，我所需要的一点也不多，”科赫继续说。“我们需要的是，波兰人碰见乌克兰人时，便打死乌克兰人，或者反过来，乌克兰人打死波兰人。如果他们在狭路相逢相互残杀之前，都能先向犹太人开枪的话，这将是求之不得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是个高明的设想，长官先生！”

“这有什么高明的，一切都十分简单。有些人把日耳曼化想象得特别天真。他们以为，我们需要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以为我们应迫使他们讲德语。但是，无论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是波兰人，我们都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肥沃的土地。”他的嗓门越提越高，“我们需要的是把土地日耳曼化，而不是人！”科赫不容反驳地吼道：“这里将是德国人生活的地方！”

他喘了一口气，死死地盯着中尉。

“但是我看您在政治方面不怎么强。”

“我是一个士兵，对政治一窍不通，”库兹涅佐夫谦虚地说。

“既然如此，那就别和姑娘们到处闲逛了，尽快返回自己的部队。我要提醒您注意，正是在你们的库尔斯克地段，元首为布尔什维克准备了一份‘礼物’。不用说，关于这一点您不应到处乱说。”

“您尽管放心，长官先生。”

“您在前线同伴的情绪怎么样？”

“噢，大家都士气高涨！”中尉注视着科赫的眼睛，机智地答道。

“最近的事态是不是使许多人感到害怕？”

“您指的是伏尔加河流域的战事吗？”中尉没有接着说下去，也许是为了集中思想，或许是为了首先运足气好一古脑儿说出想好的话：“它坚定了我们的斗志！”

行政长官显然对如此乐观的回答感到十分满意。他又一次把好奇的目光投向中尉，然后终于着手办理他女朋友的申请，在申请书上写上了批示。

瓦莉娅在这段她觉得是漫无尽期的时间里，一直坐在接待室。一双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那扇沉重的大门，高度紧张地注意着里面发出的每一个声响，每一秒钟都在盼望着听到枪声。“就要响了……”她想着，“就要响了……”不行。她不能，也不想离开行政长官的接待室，虽然这是库兹涅佐夫所一再坚持的。即使这里也用不着她，即使这种冒失之举可能使她送命，她也不能把他一个人留下不管。然而，他为什么还不开枪？他还在磨蹭什么？

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一开枪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说这个油嘴滑舌的小军官，絮絮叨叨说个没完，令人感到腻烦，他坐得离她最近，当然会第一个抓住她。副官一定会冲进办公室去。而如果库兹涅佐夫把卫兵击毙，又会怎样呢？……“还有那只军犬！”瓦莉娅想起来了，“军犬是不会放过他的……”

小个子军官一刻不停地说着，她得回答他的问话。“嗯，有女伙伴，”她仿佛说梦话似的，机械地重复着他的话，并机械地笑着，“是的，都很漂亮。是的，一定介绍，会安排

的……”

此刻她觉得，这个小军官又在用他那冷酷险恶的目光盯着她。她把自己的视线转向门口。为什么他不开枪？为什么他迟迟不动？

“不过，您的朋友可能要多耽搁一会儿。”小军官说。

肥胖的将军，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看了看表。

她盼望着这枪声，仿佛它给她和库兹涅佐夫带来的不是酷刑，不是死亡，而是欢乐和解脱。“快点！”她在心里催促着库兹涅佐夫，“快点！”

沉重的门开了。库兹涅佐夫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他面带笑容、泰然自若，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喂，怎么样？”他走近瓦莉娅，挽起她的胳膊，小声说。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那是她的申请书。

军官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把他们围住了。

“行政长官给您写了什么批示？”

“‘留在罗夫诺市’，”巴巴赫读道，“‘安排在帝国专署工作。’噢，祝贺您，小姐，也祝贺您，中尉！”

军官们顿时议论开了。

“是啊，朋友，你真走运！”

“听说，您是他的老乡？”

这时，瓦莉娅觉得，她两腿发软，就要倒下。

库兹涅佐夫小心地用手臂挽扶着她。

“你怎么啦，亲爱的？”

“小姐太激动啦，”巴巴赫说，“小姐担心会送她去做工。噢，不会的，小姐，长官不会拒绝一个前线军人的请求的！请您收下！”说着伸手向齐贝特递过来几包香烟。

“谢谢，谢谢！”齐贝特谢道。

这是好烟，也许行政长官本人吸的就是这种烟。

“为什么不开枪？”刚一走到街上，瓦莉娅就急切地问道。

“这是不可能的，瓦莉娅，你自己也亲眼看到了那种形势，不等你把枪掏出来他们就会发现的。”

“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毫无办法！”

“毫无办法？应该去冒险！”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您也许是过分吝惜自己的生命了。”

“但是，瓦莉娅……”库兹涅佐夫低声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突然，所有使他懊丧不已的一切全消失了：他想起了库尔斯克！要知道，科赫刚刚从柏林回来——不言而喻，这是最新的情报！……同时，他又想起了科赫就法西斯在乌克兰的政策而发表的议论，还有，他的批示。正是由于这一批示，瓦莉娅将成为帝国专署的工作人员。这次接见产生了出人意料、但却令人可喜的结果。库兹涅佐夫立即把这个令人高兴的想法告诉了瓦莉娅。

“那又怎么样？”她懊丧地应道，“什么‘帝国专署的工作人员’！您要明白——这种机会再也不会有的啦！”

她的声音颤抖了一下。她心中的痛苦和烦恼，她所经受的种种磨难以及在接待室里等候库兹涅佐夫时的惴惴不安——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化作了一种感情，即：对库兹涅佐夫的极度失望和责难。

(四)

凡是当年在罗夫诺市待过并路经过赫梅利大街的人，都会注意到那儿有幢并不起眼的两层楼房。楼房墙壁上的灰泥

不是这儿脱落一块就是那儿脱落一块。大门上挂着一块已经锈得发黑的牌子，上面写着：《毡靴厂》。也许，现在这幢古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了。只有这座城市的那些熟知每座建筑物历史的老住户还记得那块黑铁牌子，那两扇吱吱作响的大门以及站在门旁边的德国士兵。那些曾在工厂附近住过的人肯定记得这个哨兵。也许他们还会想起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件有年头的深棕色上衣，打着黄色的皮绑腿，头戴一顶深色的长舌便帽。他总爱把帽子拿在手上，裸露出正在变秃的头。这个人很难被人发现：他常常站在大门口，迎送一辆辆货车，他本人倒是骑自行车上下班。门卫一见他来便立正站好，挺直身体，将一只手臂伸向前方，向他敬礼。这个身着深棕色上衣的人常常是漫不经心地挥挥手，象是要拍拍哨兵的肩膀。

可想而知，希特勒匪徒的长官们相当器重这个人。不然的话，卫兵决不会如此热情地向他敬礼的。事实上，假如有谁能看到一个上了岁数的、眼睛高度近视的负责经济事务的军官来厂时常握着他的手，问长问短並一口一个“厂长先生”地称呼他，要么干脆叫他的名字和父称——捷连季·费奥多罗维奇——以示尊敬，假如有谁能象工厂的职员那样观察到这种情形的话，那么，他准会得出结论说，这位身穿深棕色上衣、打着黄绑腿的人，得到了占领军老爷们的信任和赏识。因为那位高度近视的军需官对他的尊敬正是更高一级长官垂青“厂长先生”的标志。

一天，工厂的职员们亲耳听到，高度近视的军需官用他那不伦不类的俄语，高声一本正经地对他们的厂长宣布道：

“我奉命向您转达谢意，感谢您为前线提供大量产品。德国将不会忘记您的功劳，诺瓦克先生！”

对此，厂长谦虚地垂下眼睛，答道：

“我很乐意效力，拉普勒先生，很乐意效力。”

然而，局外人未必有谁能够想象得到，半个小时之后，这位厂长就到了库房（那是他平时呆得时间最长的地方），对两名正在包装毡靴的年轻工人说：

“伙计们，不要吝惜硫酸，尽管喷——不要舍不得，硫酸有的是。德国佬全冻死才好呢。”

有谁能够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战线上（不过入冬之前它已经不再是遥远的了）的士兵们，那些活该倒霉摊到他们用罗夫诺市这家工厂产品的士兵们，恰恰在开始上冻时，没有毡靴穿，因为罗夫诺这家工厂生产的毡靴通常只穿上一个星期就报废了。

厂长以其非同寻常的方式向这两个年轻工人表示了自己对伟大德国的“耿耿忠心”。这两名工人的工作是独出心裁的：他们把硫酸从容积为半升的特制瓶子里倒出，喷洒在毡靴上。这道工序进行得既迅速又熟练，显然是已经经过了长期实践。

厂长离开库房，穿过车间，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估价员正在那里等他。这人个头瘦小，其貌不扬，薄薄的嘴角总是隐忍着笑意——仿佛他知道别人不愿意泄露的什么秘密。当厂长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时，他用那神秘莫测的眼睛朝厂长望了一眼。

“你有什么事，伊万·伊万诺维奇？”厂长问道。

“没有什么，捷连季·费奥多罗维奇，”估价员答道，“今天我看到你同上来的人讲话来着。”

“怎么，这不好吗？”

“不、不，你做得很得体，只是不应把眼睛垂下来。”

“我真担心，伊万·伊万诺维奇。”厂长在桌旁坐下来，摊开双手说，“如果再有一分钟，我就会笑出声来了。”

“我也发现了这一点。”

“嗯，现在事情总算过去了。你的情况怎么样？你计算过了？让我看看结果。”

伊万·伊万诺维奇把一个文件夹递给他。

“都在这儿。”

“有多少？”厂长不等打开夹子便问。

“每双毡靴赢利六个马克。”

“太少，伊万·伊万诺维奇，别忘了——除此之外，我们再没有地方可以搞到钱了。我们需要钱，这个你是知道的。”

“我想法再搞一些。”

“再想想办法，态度要温和，”厂长说着用手抚摸了一下纸夹，并且用他那双善良同时又近乎调皮的蓝眼睛望着伊万·伊万诺维奇。“让你多费心啦！”

“我要看一看，在哪些方面还可以节约一些，”伊万·伊万诺维奇说。

“完全正确！”厂长附和着说，“要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制度，降低成本！我们要使每一双靴子获纯利十到十二个马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得住脚，才能够向人们提供帮助。”

“这么说，破坏发动机的事一件也不能干了？”

“一点不错！不能出现任何停工现象，工厂应该开足马力投入生产！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

“坚决执行！”伊万·伊万诺维奇略略点了下头说道，

“不过产品质量，你可要严加把关。你刚才到库房去了吗？”

“去过了，那里一切正常。我们将提供第一流的产品。”

送走了伊万·伊万诺维奇之后，厂长在办公室里坐了不大一会儿便起身朝走廊走去。他接连走过三个房门，顺着台阶而下，来到地下室。他站在地下室门前找了好一阵钥匙，才把铁门打开。铁门内有条砖砌的阶梯通向更深的地下。下到底之后，他又打开了一道门，进到一个不大的房间。房间拱顶下面挂着一盏灯，强烈的灯光把屋子照得一片通明。这里也在进行着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与毡靴生产毫不相干。两台打字机嗒嗒作响。厂长走近打字小桌，拿起刚刚打好的一张蜡纸，贴在眼前看了起来，一边还小声念道：

“苏德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问题的实质在于，法西斯德国变得越来越衰竭、虚弱，而苏联的后备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时间不利于法西斯德国。”

“在每一页上都应打上这是谁说的话，”诺瓦克对打字员说。打字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梳着一头乌黑乌黑的短发。

在另外一台打字机旁，一个年约三十岁的男子只用食指在打字，他的淡褐色的头发直垂到那宽阔的、方方的额头上。

诺瓦克把已经打出来的文件读了一遍，改正了几处错误，然后要求同志们把打出来的命令对照原稿尽量细心地校对好，这才离开地下室，往办公室走去。

晚上还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诺瓦克正在为此做准备。一切都应该记在脑子里。他手捏着铅笔，不禁发起愁来。要

是允许写的话，他在一刻钟之内就能把自己所有的想法写得一清二楚。然而，现在什么也不能写。他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严加保密。

(五)

在戈夏，库特科韦茨是以一个农艺师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的。以前他从来也没有当过农艺师，只是战前在农艺系一年级学习过。

不久，他又有了一个相当有影响的“助手”和庇护者——戈夏新的地方长官——埃里希·克里格尔先生。库特科韦茨的才能立即博得了克里格尔的赞赏，特别是他的德语造诣，虽说不上精通，但是作为一个区的农艺师是绰绰有余的。伊万·库特科韦茨成了戈夏区总农艺师同时兼任克里格尔先生的私人翻译。

库特科韦茨随地方行政长官克里格尔一起来到村里，库特科韦茨对农民翻译了克里格尔的讲话。

他的翻译颇值得一听：

刽子手埃里希·科赫声称，为了供应法西斯士兵及其家庭，他要从乌克兰抢去最后的一点东西，”库特科韦茨翻译说，“为此目的，区地方行政长官克里格尔先生才来到你们这里。他想要你们供给他猪油、鸡蛋和黄油。用这些东西挽救快要灭亡的希特勒帝国。但是，猪油、鸡蛋和黄油你们最好还是留给自己吃……”

对于库特科韦茨的翻译，克里格尔挑不出一点儿毛病。他所熟悉的诸如“区地方行政长官”、“地区主宰”、“克里格尔先生”、“科赫先生”、“阿道夫·希特勒”、“新

欧洲”一类的词这里都有。假如克里格尔懂乌克兰话或俄语的话，他一定能听出他的私人翻译官打着强有力的手势、慷慨激昂地翻译，其实却是在指名道姓地臭骂他们。克里格尔非常欣赏库特科韦茨说话的风度。他坐在那儿，每当翻译官提到他或希特勒的名字时，他都洋洋得意地点点头。而库特科韦茨认为自己完全能够左右局面，因此无所顾及，想怎么骂就怎么骂。他大骂所谓的“新欧洲”，大骂克里格尔，大骂帝国驻乌克兰代理人，以及希特勒本人。在结束翻译时，库特科韦茨告诉农民们，让他们“各行其是”。

听众有时忍不住发出阵阵笑声。翻译官对此并不怎么喜欢。他气冲冲地要他们注意听。待他们安静下来之后，他才继续“翻译”。

库特科韦茨十分了解人们的心理，而且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来点“发挥”。他顺手牵羊地给农民提出了一些“农艺学方面的建议”。这些建议归根结底就是不向占领者提供食品——他指点农民，怎么样才能得到“土地证”。库特科韦茨和农艺师——他的助手——在同农民聊天的时候，也建议他们推迟打场、脱粒，使占领者无法把粮食运走。农艺师向农民讲述了法西斯苦役的残无人道，号召他们全力抵制德国人的“动员令”。农民们通过农艺师的谈话了解到了前线发生的重大事件，伏尔加河会战的真实情况。

如果库特科韦茨能有一支手枪以便应付一切不测的话，那就好了。因为它迟早总会用得着的。

怎样才能搞到一支手枪呢，他绞尽脑汁，考虑了很久。向诺瓦克要一支？他不想这么做，——罗夫诺的同志要搞到武器也并非易事。缴希特勒匪徒一支？赤手空拳是不会成功的。后来，库特科韦茨终于得到了一个搞枪的机会。

有一天，他到上司家作客。克里格尔是个手紧的家伙。他们开支从不用在狂喝滥饮上，而是派到更为划得来的用场上。他常常把食品换成各种古旧家用什物（一名勤务兵专跑罗夫诺办理此事），然后大包小包地寄给他的伊丽莎。久而久之，许许多多不起眼的包裹里的东西就成为一笔相当可观的资本。然而这一天克里格尔招待客人却显得格外大方：原来这天是他的生日。桌子上摆满了酒，周围用绿油油的松枝装饰着，红色的大蛋糕上插着四十五支蜡烛。客人们纷纷发表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其间自然少不了提到上帝和阿道夫·希特勒，颂赞主人不愧为虔诚的基督徒和元首的忠实仆人——总之，一切进行得都很合克里格尔的心意。

整个晚上克里格尔的情绪甚佳，把客人送走之后，他甚至用鼻子哼起小曲来了。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由于元首的恩惠，他“管理着俄罗斯大汉”，他对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权威，放在伊丽莎卧室的镶嵌着图案的盒子里的金银首饰增多了。他已经脱下衣服准备睡觉了，突然想起来，他的“瓦尔特”手枪没放在枕头底下。在这个国家什么突然的事件都是可能发生的！克里格尔站起身，走到前厅，摸遍了他外套的大小口袋，都没找到手枪。克里格尔把所有的衣服抖了又抖，把制服翻来复去地察看了一遍，又拉开抽屉，甚至用手电往衣架底下照了一遍。手枪还是无影无踪。他开始回忆每个客人的面孔，回忆当天晚上所有的细节。他终于想起来了，他的副手杜尔。这个巴伐利亚州人对他的手枪早就垂涎三尺了。“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克里格尔自言自语地骂道。

早晨，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把杜尔叫来审问。但他转念一想，审问是无济于事的。“这个该死的猪猡一定不会承

认，”他想，“我不知道，还有哪里的贼比巴伐利亚人更狡猾的了。”克里格尔采取了他的“愤懑的良心”提示给他的措施。他坐下来，草拟了一道撤换他的副手的命令。

杜尔的倒霉事并没有就此完结。罗夫诺当局看了由克里格尔对杜尔做的鉴定之后，降了杜尔的职，並把他送上了前线。

伊万·库特科韦茨没有被怀疑到。不仅如此，克里格尔还亲自向他讲了手枪丢失的经过，并且说他认定手枪是杜尔偷走的。

库特科韦茨对长官表示深切的同情，对忘恩负义的巴伐利亚人的行为深表愤慨。

(六)

游击队和地下组织之间建立的紧密联系使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局面，唤发了我们的活力，振奋了地下工作者的精神。现在，无论是我们还是罗夫诺居民，都有可能去实现在昨天看来还是遥远将来的，或者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最遥远的计划也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其中的一项计划就是要对埃里希·科赫进行惩罚。这项计划，我们不仅没有由于库兹涅佐夫受挫而放弃，而恰恰相反，我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急切地渴望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

这时，地下工作者也参与这件事情了。我们原认为我们在市里的人员有限，恐力所不能及。现在可以放手让他们来组织了。从这时起，在“弗里德里希大街”靠近行政长官宅邸的地方，我们每天安排了人员去进行监视。

“农艺师”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越来越经常地离开

他所在的村子。他常徜徉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手摸着衣袋里的手枪，目不转睛地盯着行政长官可能出入的大门。几个小时之后，卢茨接替索洛维约夫，然后再由尼古拉·波采卢耶夫接替卢茨。

这种轮流监视，或者按照地下工作者的说法叫作“狩猎科赫”，倒真有点象是打猎。“值班人员”的极大耐心，其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最主要的是带着强烈的欲望，屏住呼吸，等待乌克兰头号法西斯刽子手，最高行政长官的出现，这一切与猎手所包围兽穴的情形几乎毫无二致。

也许其他地下工作者所表现出的这种欲望谁也没有波采卢耶夫那样强烈。什么地方要采取积极的行动，那里就肯定少不了这个热情而坚毅的年轻人。这种机会他从不放过：他往往在毡靴厂忙了一天，又赶紧“启程”，开始了他称之为沿街散步的轮流值班。这种散步的目的只有一个，收拾希特勒匪徒。不能说尼古拉·波采卢耶夫特别精于分析。他对最高行政长官和一般德国上尉都怀有同样的仇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要他们一旦落入波采卢耶夫手里，他们统统要送命。这个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饱经磨难的人，对敌人怀着无比的仇恨，无论什么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止他复仇。

有一次，他乘自行车作例行的“巡察”时，城市正沉浸在暮色的朦胧之中。在街道的拐角处，波采卢耶夫发现了一名法西斯军官，正在摩托车旁边忙活着。波采卢耶夫四下一看——附近别无他人，就在离法西斯军官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下了自行车，推着车子走上前去。到了摩托车跟前，波采卢耶夫拔出手枪，一枪就把法西斯军官击毙在地，随即捡起敌人的枪，骑上自行车，沿着自己的“巡察”路线飞驰而

去。

猎获科赫成了尼古拉·波采卢耶夫最热心的一件事情。每当波采卢耶夫走到最高行政长官宅邸附近去值班的时候，他都满心希望，科赫这天一定会出现，他波采卢耶夫一定能实现复仇之举。

然而，科赫却没有露面。即便是在他来到“首都”的那段不长的时间里，也根本无法见到他。最高行政长官从不离开“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府邸。为了防备科赫乘装甲列车到罗诺夫市，卢茨在毡靴厂不远的铁轨枕木上埋设了带有电引信的地雷。地下工作者在厂里安装着刀形开关的地方夜以继日地值班。假如科赫乘飞机飞抵罗夫诺市的话，那么，等待他的是埋在机场附近公路上的一颗同样的地雷。

但是，帝国驻乌克兰行政长官却始终没有出现。一说他一直蹲在柏林没有出来，一说他同希特勒一起待在文尼察城郊的大本营里，还有传闻说他一直在克尼格斯贝格“管理”着东普鲁士，同时兼理东欧的许多大企业的事务。他成了这些大企业的股东。这第三种说法好象最可信：众所周知，经商做生意是行政长官最强烈的欲望。库兹涅佐夫十分担心，关系到巨额利润的工商业务可能使埃里希·科赫在远离罗夫诺市的地方滞留很长时间。这里正在急不可耐地在等着他！

库兹涅佐夫有时也同冯·奥尔特谈起这方面的事情。他也倾向于行政长官忙于商务的说法，但是他又透露了一种情况，即科赫迟迟不来罗夫诺市，是因为他对这座城市感到厌恶。冯·奥尔特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掩饰他对上司的讽刺之意。显然可以看出，他有根据认为行政长官即使不算胆小鬼，也绝称不上是一个十分勇敢的人。

冯·奥尔特的言谈话语之中所流露出来的这种讽刺之意，库兹涅佐夫早在他谈到比科赫地位更显赫的人物时就已经发现了。这一情况很长时间内都使库兹涅佐夫迷惑不解。一方面，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虔诚的信奉“生存空间”邪说的希特勒分子，一个推崇绞刑架和贩卖奴隶的家伙。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样一个正统的法西斯分子和希特勒的信徒，有时却非常露骨地说出一些挖苦自己上司的话。对这些人库兹涅佐夫任何时候也不能允许自己冒着立即被怀疑、被揭露的危险说三道四的。例如，冯·奥尔特用最不尊重的语言评论行政长官的副手们，认为他们全都是些近乎无赖的胆小鬼。有一次他谈到行政长官本人，说他是胆小鬼、唯利是图的商贩。他直言不讳地说戈培尔及其吹鼓手们是不屑一提的寄生虫和毫无头脑的糊涂蛋。还有，有一次他谈到希特勒的“闪击战”思想时，认为它是对俄国一无所知的人杜撰出来的毫无意义的冒险……这一切使库兹涅佐夫警觉起来。有时他产生了怀疑——这该不是冯·奥尔特的故意寻衅吧？这个盖世太保少校所持的极端观点和他身份显得太不协调了。

在同冯·奥尔特交谈时，库兹涅佐夫一如既往，不露声色，什么也不打听，尽量表现出一副头脑简单的样子，好让冯·奥尔特认为自己是个比虽然富有、但却幼稚、对实际情况鲜为了解的中尉要强的人。而冯·奥尔特却真的为这种优越感所陶醉，说话时总是摆出一副庇护弱者的腔调，好象是对缺乏经验的中尉进行说教，向中尉灌输那种即使他本人也未必认识到的思想。就这样，冯·奥尔特有了象齐贝特中尉这样一个对他感恩不尽，并且易于接受知识的学生，更主要的是一位忠诚的朋友，这位朋友随时准备用金钱救助、慷慨宴

请，对任何事情都乐意效劳，并且认为这首先是他本人的荣誉。

冯·奥尔特身上的那些前不久似乎还令人不可理解、不可捉摸的疑团，渐渐地被库兹涅佐夫解开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人内心隐藏的晦暗的东西也暴露无疑了。

如果说，库兹涅佐夫从与冯·奥尔特一认识就抓住了他的一个特点，即：虚荣心极强，然后就巧妙地加以利用，那么现在他又抓住了冯·奥尔特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特点。这一特点能够使人更真切了解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冯·奥尔特其人。冯·奥尔特的这一特点就是他的犬儒主义。

这是一种可怕的犬儒主义。它使人毫无人性、廉耻，如同禽兽。冯·奥尔特效忠于自己的主子，但又不相信他们。他认为他们也象他本人那样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除了贪欲之外，他不承认任何思想。他笃信，贪欲支配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在政治生活中是这样，在私人生活中也是这样。他在盖世太保供职。为的是什么呢？因为这对他的口味，可使他的一部分愿望得到满足，并可以指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使其另一部分愿望也得到满足。统治人的权力他现在已经有了。他需要的是财富——这有什么了不起，他会弄到它们的！如果要为此而改变信仰，他也会这样做的。他可以为别人效劳，有奶便是娘，不管什么人只要能给他带来好处。难道别的任何人处在他的位置还会是另外一个样吗？

“喂，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一次谈心时冯·奥尔特极力想使齐贝特相信，“现在有谁为了诸如义务、祖国之类的抽象概念而牺牲个人的利益或者放弃发财的机会呢？你？我？不错，我们在口头上也说为了元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是，平心而论，你就不珍惜你个人的财产、你的小小的资

本吗？如果你能够通过比如说那些英国人的帮助来扩大自己的资本的话，那么，难道你会因为某些‘崇高的思想’而放弃这种机会吗？但是，这是不是说我同你要背叛元首？绝对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亲爱的，我们的元首所关心的恰恰也是扩大我和你的资本。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他自己，”讽刺的目光在冯·奥尔特冷冰冰的眼睛里闪了一下。“我认为，我们不是同别人，而正是同元首一起来捞钱的。我忠于元首，我真地要追随他赴汤蹈火。这只会证实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你同意吗？”

从这次难以忘却的谈话中，库兹涅佐夫得到了对一个侦察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从而他才真正了解了自己对手的本质。正是这种认识成为他克敌制胜的保证。此后，他能够更加随便、更加无所顾虑地与冯·奥尔特周旋了。他大胆地给他钱，请他去喝酒，用各种可能的办法获取侦察情报，因为库兹涅佐夫常常感到，他远比怙恶不悛的职业侦探技高一筹，而且他已经预感到自己会在这场决斗中取得胜利。

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冯·奥尔特又一次见到库兹涅佐夫时，推心置腹地向他透露说，他可能回西德去，并且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如果能成行的话，冯·奥尔特将去一个生产新式秘密武器的工厂工作。

库兹涅佐夫在定期返回营地时，向我们报告了这一具有重大军事和政治意义的情报。情报表明，在德国秘密工厂里正在生产有翼飞弹，其目的是要对英国各大城市实施轰炸。

我们从库兹涅佐夫、格涅久克、斯特鲁京斯基兄弟、舍夫丘克及其它侦察员那里，收到大量情报。与此同时，诺瓦克所领导的地下组织也源源不断地送来报告。这些报告反映

出了数十人正在耐心细致而鼓舞人心的工作着。从这些报告中我们还看到了俄国人公墓看护人的工作成绩。他显然是手握铅笔，坐在自己房间的窗前，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那条战略公路。我们还看到了记下有关敌军用物质情况的兽医及许许多多昼夜监视敌人的爱国者的功绩。

现在，罗夫诺同戈夏之间每天都保持着联系。在目前的工作阶段需要这种联系。

为保持这种联系，索洛维约夫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工作人员。

远在索洛维约夫来到本村的头几天，他就认识了柳霞·米拉舍夫斯卡娅。这是一个长着一双兰色眼睛的性情开朗、活泼的姑娘。她随父母住在村里。柳霞的父亲过去是一个巨大的地主庄园的管理员。这一点在姑娘的思想上和她对生活的态度上打上了烙印。索洛维约夫同柳霞的第一次谈话是以激烈的争论而结束的。年轻的苏联学者、莫斯科人索洛维约夫惊异地听着柳霞谈自己对未来的看法。这与他的观点怎么也无法吻合！然而同时，索洛维约夫又在暗自为柳霞辩解：一个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和受教育的象她这么大的姑娘，怎么可能了解别的东西呢？索洛维约夫下定决心要努力重新教育她。

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打心眼里仇恨德国侵略者。这一共同点使索洛维约夫可能去实现自己的决定。

索洛维约夫建议柳霞参加地下组织，她同意了，虽然索洛维约夫还是照例把她的未来描绘得漆黑一团。

诺瓦克不赞成索洛维约夫提出让柳霞担任罗夫诺和戈夏之间联络员建议；

“她能胜任吗？你自己也说，对她还要做点工作的！……”但是，“农艺师”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柳霞接受任务启程了。

此后，柳霞经常不断地往返于罗夫诺和戈夏。她从戈夏把索洛维约夫和库特科韦茨搞到的文件及武器带给诺瓦克，而从罗夫诺给戈夏带回支队下达的任务、苏联的出版物、苏联新闻局的战报。她在罗夫诺市内有熟人，因而她的这些行动在村里谁也不感到奇怪。

柳霞通常是乘坐德军军官的小汽车往返。她满走运。只要她一走上公路，向过路汽车上的乘客启齿一笑，妩媚地挥动几下手，汽车就会停下来。车上的军官们宁肯自己坐得再挤一些，也要给她让出坐位。柳霞德语讲得不错，一路上谈笑风生、说个不停，总使旅伴们感到开心。有时，柳霞及时传递给诺瓦克或索洛维约夫的情报，正是从这些谈话中获得的，这和柳霞所担负的使命是并行不悖的。

工作开展得一帆风顺。挫折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对挫折、失败和同志们遭逮捕我们已有思想准备。但是它们并没有发生。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经费充足的德军侦破机关戒备森严，由多民族的特务所组成，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出色的侦察机关。它在罗夫诺市的“全乌克兰盖世太保”总部纠集了强大的力量。而我们的侦察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二十多人，在罗夫诺市干得如此干练，行动自如，仿佛他们不冒任何风险、不会遭受任何损失似的！

我们对情况做了周密细致的研究，如果这是敌人的圈套怎么办呢？我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考虑这一点。如果盖世太保对于我们的活动了如指掌，它们不妨碍我们侦察员的工作只是因为它们在巧妙地向侦察员提供分明是假情报怎么办？

这个可怕的、使人深感不安的疑虑深切地袭扰着我们，当时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来到了营地——他是坐罗夫诺市帝国专员贝尔博士的小汽车来的。原来，斯特鲁京斯基在帝国专员的车库安插有他自己的人。他在这里已经呆了三周。他如此自由地使用车辆，恰如那是他私人车库似的。库兹涅佐夫和格涅久克也不止一次地使用这个车库的汽车。从现在起，汽车库可以向任何同斯特鲁京斯基有联系的侦察员提供小汽车，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提供货车。斯特鲁京斯基同我们见面时表示，他完全有可能把贝尔打死或者把他活捉并用他本人的汽车运来。无论是打死还是活捉，都未列入我们的计划。

我们长时间地向斯特鲁京斯基询问他工作的各方面情况，询问得如此详尽而挑剔，以致使他本人也终于感到了怀疑和不安。他的话里充满着犹豫和惶恐，不时地以疑惑的目光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卢金。他还汇报了他在罗夫诺市遇到的一件事。几天之前，他结识了一个名叫拉莉莎的姑娘。她在盖世太保那儿当清洁工。拉莉莎乐意当一名侦察员。依照斯特鲁京斯基的建议，她现在开始特别尽心地“打扫”盖世太保的住处。她的上司对她很满意，尼古拉对她也很满意。

“这就是她工作的成绩，”他汇报完之后，就打开几张迭得整整齐齐的已经用过的复写纸。

有几张复写纸几乎完整无损，纸的光面上现出一行行透明的字纹。卢金拿起放大镜，凑近复写纸读了起来。

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份发往柏林的秘密报告，它已没有特别的价值。然而，下一张纸使卢金警觉起来。“罗夫诺市立监狱在押犯人名单”，他对着放大镜读了一遍标题。

我们在对这几张复写纸加以分析之后明白了，斯特鲁京斯基所物色并使之参加工作的这个盖世太保的清洁工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可贵的，如果……

光是这个“如果”就足以使我坐卧不安了。

“是谁介绍你同她认识的？”我们向尼古拉打听道。

“她战前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到了盖世太保那儿？是谁给她出主意，让她去收集用过复写纸的？……”

尼古拉全神贯注、尽量准确而详尽地述说了，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样同拉莉莎认识的。原来介绍他们相识的是阿法纳西·斯捷波奇金。他原是战俘，是个经过考验的人，在支队里颇有威信。他早就认识拉莉莎，曾不止一次地同她谈过心，并也以头为她担保。德军占领之前，拉莉莎在技校学习。她在盖世太保机关当清洁工纯属偶然——她干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逃避去德国服苦役。收集用过的复写纸是尼古拉让她干的。拉莉莎曾告诉尼古拉，她干这种事不费吹灰之力。她请求让她承担更为重要的工作，如：偷盖世太保工作人员写字台的钥匙，从抽屉里取出一切可能有用的东西。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尼古拉特来支队征求我们同意。

一切都进行得异常顺利，令人难以置信的顺利……难道这是圈套吗？……

如果在这种时候让我们的指挥机关受到盖世太保假情报的蒙骗，那真是太可怕了！

不久我们即遭到了第一次挫折，那时我们的感情是复杂的、很难用言语来表达。不过，无论第一次挫折如何使我们痛心，无论我们如何为陷入敌人魔爪的同志怎样担心，我们仍然不能不感到慰藉。我们坚信，我们取得的成绩不是假的，而是真的。我们的侦察情报是可靠的，不是盖世太保在欺骗

我们，而是我们巧妙地捉弄了他们。

这种慰藉的感情，这种无限兴奋的感觉是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才换来的。

侦察员卡拉佩强先后几次去罗夫诺市。他曾是战俘，于1943年初参加支队。卡拉佩强执行任务表现出色，没有理由不派他去罗夫诺市。在市里他通常住在秘密接头的地方，那套住宅里住着一个红军中尉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一天，卡拉佩强喝多了，醉醺醺地回到了住所。正好有两个陌生人在屋里，卡拉佩强竟忘乎所以，当着陌生人的面，吹起牛皮来：

“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法西斯感到危险的人物！”

站在陌生人背后的女主人直向卡拉佩强使眼色：你快住嘴吧！

“这个我知道，用不着你吭声！”卡拉佩强回答道。“赤手空拳是抓不住我的，瞧这个，见过吗？”于是他把自己随身带着的手枪和手榴弹亮给他们看。

陌生人听他胡言乱语了一阵儿，便急忙告辞而去。

“你这是怎么搞的！”女主人惊恐地把双手一拍说道。“他们是密探！你快跑吧！”

卡拉佩强顿时酒醒了，急忙跑出房子，隐蔽起来。

对这件事情他回营地后只字未露。过了一天，他又被派回罗夫诺。然而，同样使用这个秘密接头地点的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很快从罗夫诺市赶回营地报告说，女主人及两个孩子被盖世太保带走了。

卡拉佩强立即被召回营地，在支队部受到了审查。他对上述情况供认不讳。这种罪行是不能饶恕的。根据支队部的决定，他被枪决了。

这种实为背叛的行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个最可靠的秘密接头地点被破坏了，女房东，一个忠诚的苏联妇女，连同孩子被弄到了盖世太保，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死亡。此外，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匪徒得以窥探出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的踪迹。因为出事时他去过因卡拉佩强而遭破坏的秘密接头地点，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叛徒们探出了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的踪迹之后就开始了反间行动。

“喂，小伙子，”一个穿着军不军民不民的家伙，在大街上叫住了他，抓住他的胳膊说，“有事找你。”

“找我有何事？”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问。

“我们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别拒绝我们。我们想投奔游击队，我们要打德国人，头头欺骗了我们。”

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了解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对他们的话并不感到奇怪。不过，他还是说：

“您如果想使人相信您，就应该把头头们捆上带来。”

那家伙同意了。他同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约定在城外一公里的一个地方见面。三天之后投诚者应该带着被捆住的军官到那里。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找到哥哥，同他商量。哥哥表示同意。接头地点兄弟俩是很熟悉的：小时候他们常常骑着自行车在这条小河的岸边玩耍。

“在那里见到他们之后就带他们直奔‘了望站’，”尼古拉说。“一定要小心！别忘了，你是在同谁打交道。”

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在约定的时间到达碰头地点。起初他觉得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但接着便从树丛里面站起两个人来。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对他们说了几句暗语：

“小伙子，水凉吗？”

“我们还没有下去游过。”他听到了对方准确无误地对上了暗语。

就在这时，突然从树丛里，从芦苇丛里，从山丘后面——从四面八方跳出许多盖世太保秘密警察。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一见黑色的制服便认出了他们。

他拔出手枪就向叛徒和盖世太保分子射击。

“抓活的！”他听见身后什么地方有人这样喊道。

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的子弹打完了。他纵身跳入河中。这时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腿。

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被抓住捆了起来。伤口鲜血直流，被拖进了盖世太保机关。

(七)

……有一次象往常一样，莫斯科不是命令，而是询问道：

“你们能否拨出一个破坏分队到科韦尔地区执行破坏任务？”

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

“完全可以。”

于是5月29日，一个由65人组成的工兵连从楚曼森林向科韦尔林区进发。

一路上困难重重：要摸索着步行六七个昼夜，梯恩梯炸药全靠个人随身背着，这是支队里剩下的全部炸药，我们一包不留，全让他们带上了。这些炸药足以炸毁12节军列。

为了使工兵连顺利到达科韦尔地区而不被敌人发觉，不

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避免有人负伤，我们为他们准备好了全程的食品——向他们提供了食糖和熏制的香肠——所有这些都都要工兵们自己背上。

工兵连由弗罗洛夫少校领导。

出发前，他把队伍集合好就来叫我，让我向战士们发表临别赠言。

我一开头就提醒战士们，一路行军要谨慎小心。

“你们都很清楚，”我说，“希特勒匪徒为了对付侦察分队，组织了配备有机枪的二三百人组成的伏击队伍。你们还知道，只要我们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们马上就会出动大批讨伐部队来对付我们。希特勒匪徒既不喜欢我们，也不害怕我们。但是现在还不是我们同他们摊牌的时候。这就是说，要使敌人不知道，你们是我们支队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你们无论在任何地方、无论对谁都不要讲。你们相互之间也不要谈论这一点。请忘掉我的名字，忘掉弗罗洛夫这个名字。他也是敌间谍机关非常熟悉的人。从今天起你们就叫弗罗洛夫为‘沃洛佳舅舅’，或者简单地叫他‘队长同志’……”

工兵连就要出发了。在林中小路的两旁，支队各分队成仪仗队站好，这是离开营地的必经之路。许多同志在游击队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成了朋友，现在就要长期分别了。很多人在工兵连里都有亲人：兄弟、父亲、丈夫。“很可能我们将要永别了”，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这样想。

康斯坦丁·格里戈里耶维奇·马利科夫中尉受命担任工兵连的连长。

按所受教育而论，他是工程师。也象我们所有的莫斯科人一样，他是自愿报名参军的。他参加过莫斯科会战。特别

是在苏军坦克开始著名的大反攻之前，在清除敌人雷区的工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参加支队他同样是自觉自愿的。

我记得，大约在起飞前三天，他到了我那儿：

“可以向您谈谈我的私事吗？”

“您说吧，马利科夫同志。”

“我爱着一个姑娘，我想同她到民事登记处去一趟，这需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我能请几个小时的假吗？”

“您可以去几个小时。但是为什么您要急着结婚呢？您可以等打完了仗回来再结婚嘛。”

“她是个医生，今晚上就要去前线了，”马利科夫沉着地答道。

(八)

通信员急匆匆地来到了我的帐篷里。

“支队长同志，沿茹拉维奇村旁边的道路发现一队德军。队伍前面是骑兵，后面的是乘坐大车的士兵，还有火炮，”他报告道。

通信员是一个秘密观察哨派来向我报告的，这个观察哨设在离营地两公里远的路旁边。

我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一情况加以分析，又有两个人同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跑来。其中一个是从负责警卫营地的哨位上来的战士，另一个是在营地附近林中空地上放牧的游击队员。他们两人都证实说：看见了德国骑兵。

毫无疑问，德国人是从三面向我们营地紧逼过来。

我让斯捷霍夫带一个值班排向敌人所在方向运动，在那里建立指挥所。我本人则留在原地，以便组织各分队做好战

斗准备和同其它哨位保持联系。谢尔盖·特罗菲莫维奇刚刚走出200米，哒哒哒的机枪长点射就打破了森林的寂静。紧接着响起了一片冲锋枪和步枪的射击声。

我断定，这是我们的人在射击。我因为担心他们会白白地消耗掉我们本来就已经不多的子弹，就打算派通信员到斯捷霍夫那里传达命令：要瞄准射击，节约子弹。

然而，我还没有来得及给通信员下达命令，又有人向我报告：

“支队长同志，哨兵报告：道路上的敌人正在架起火炮。”

我命令巴扎诺夫：

“你带35名自动枪手，把火炮弄过来。”

巴扎诺夫一转身就在林中消失了。

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远处不断传来游击队员们雄壮的“乌拉”声。

“莫非斯捷霍夫带人发起了冲击？”我仔细地听着射击声，想道。“事先也不告诉我一声？”但是通信员回来向我报告道：

“您的命令已经传达，斯捷霍夫同志告诉说，是敌人在射击，我方射击不多。他惊异的是，从敌人那边不断传来俄国人的‘乌拉’声。”

“告诉斯捷霍夫，不许发动冲击，他的右翼有火炮，已经派巴扎诺夫去那里，让他同巴扎诺夫联系。”

情况仍然不明。为什么敌人方面响起“乌拉”声？森林里的火炮是从哪来的？莫非法西斯匪徒预先派来了叛徒？无论是我，还是留下和我在一起的卢金都迷惑不解。

后来，终于真相大白了。

随斯捷霍夫一起去的值班排长是鲍里斯·克鲁季科夫。他和他的战士们利用地形，在树林和树墩后面躲躲藏藏，悄悄地接近了敌人。突然，克鲁季科夫听得清清楚楚：

“你怎么了，鲍里斯，向自己人开起火来了？”一个女人从刚才进攻的队伍里向他吼道。

克鲁季科夫仔细地看了看，他几乎要惊呆了。他认出“女敌人”正是他的同学。他在基辅一所学校里学习的时候和她是同桌。他们扑向对方怀抱，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

而在附近，事态是这样发展的。

巴扎诺夫接近了道路，对方的火炮正在准备投入战斗。为了恫吓对方，巴扎诺夫故意高声命令道：

“全营注意，一连向右，三连向左，二连随我前进！”

这时，一个陌生人突然跑到他的跟前说：

“我营已经展开队形！”

“什么营？”

“科夫帕克的第二营！”

于是射击停止了，人们弃战言欢。向我们“进攻”的原来是科夫帕克的人！

我同谢尔盖·特罗菲莫维奇·斯捷霍夫一起向科夫帕克走去。

这一次是我们同这位传奇般的游击队指挥员的第二次相逢。

在我的想象中科夫帕克应该是一个高大魁梧、健壮有力、嗓门宏亮的人。所以，当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一个年迈、削瘦的游击队员，从外表看去，起码也有60岁时，我确实感到惊异。他讲起话来生动、活泼，甚至可以说是娓娓动听。金星勋章和列宁勋章，在他胸前闪闪发光。

“您好，梅德韦杰夫同志！”科夫帕克说。“在布良斯克大森林的时候我就听说过您。现在，在乌克兰这儿相逢了。”

科夫帕克向我提起一连串问题：我们在这个地区是否已经很久？我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我们还要在罗夫诺市郊待很久吗？我把一切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他。

“我们要一直待到红军打来，”我最后说。

这时，房间里又进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仪表堂堂，军便服胸前也缀饰着军功章。他面带倦容。

“来认识一下，这是我们的政委谢苗·瓦西里耶维奇·鲁德涅夫，”科夫帕克指着进来的人介绍道。

我们亲切握手，互致问候。谢苗·瓦西里耶维奇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您在罗夫诺市内也有自己的游击队，这是真的吗？”他问道。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鲁德涅夫就开始询问所有的细节：我们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我们的人持什么样的证件进入罗夫诺市的？如何同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诺瓦克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如何共同组织行动？

“我们现在也应该这么办，科夫帕克，”鲁德涅夫对科夫帕克说。

西多尔·阿尔捷莫维奇请我向他们的侦察队长提供适当的证件。他又接着补充道：

“适合于进城的人我们这里可以找得到，可就是没有德国人。”

“什么德国人？”鲁德涅夫问。

“他们有一个游击队员是以德国人的身份在罗夫诺市进行工作。”

“怎么？他真是德国人还是……”鲁德涅夫问我道。

“不，是我们的人，一个苏联工程师，但他精通德语，而且完全掌握了德国军官的所有作派。”

“这倒很有意思……我可以见见他吗？”

“真不巧，今天见不到了，他正在罗夫诺市，”我回答说。

“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您的这位‘德国人’了解到我们在罗夫诺州进行破坏活动的效果呢？”

我答应把这项任务交付给库兹涅佐夫来完成。

一天，科夫帕克和鲁德涅夫到我们这儿来了。我把刚刚从罗夫诺市回来的库兹涅佐夫介绍给他们。

“噢，果然名不虚传，”听着库兹涅佐夫介绍自己的工作情况，科夫帕克说。

……科夫帕克的兵团告别了我们，沿着自己的路线，继续前进了。

分别之前，我们编制了专门的密码本，规定了进行无线电联系的时间和代号，以便相互交换所有对两个支队都有用的情报。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库兹涅佐夫报告说，希特勒将于最近几天离开柏林到大本营去。他的专列将从利沃夫——兹多耳布诺夫铁路上通过。

我们知道，科夫帕克的兵团可能要跨越这条铁路，于是给科夫帕克拟就了一封无线电报，然而，好象故意难为我们似的，我们的报务员三天三夜未能同科夫帕克的报务员联系

上。到后来虽然联系上了，发去了电报，而科夫帕克的部队已经越过铁路线，向西推进得相当远了。

(九)

埃里希·科赫……保利·达格尔……阿尔弗雷德·冯克……格尔曼·克努特……这些都是在希特勒匪徒所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人所共知的名字。希特勒匪徒的头目及其帮凶们涂炭乌克兰土地上的一切生灵。只要一提起这些名字，人们就不寒而慄，仇恨满腔。他们身后是拷问室和绞刑架，是被活埋的人的哭嚎、是抢劫和屠杀、是成千上万被无辜杀害的人尸骨。

“要让这些刽子手们知道，他们是无法逃脱自己的罪责的，他们一定要受到苦难深重的人民的惩罚。”

这些话我们都能背诵出来。这些话使我们时刻想起我们的爱国责任，想起对那些为了报仇而流血牺牲的人们的责任。这些话成了我们战斗的纲领。转入积极行动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所以，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再次急不可耐地擅自赶回营地请求我们同意他采取报仇行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阻止他。他打算收拾副行政长官保利·达格尔。

如果说是作为驻乌克兰的帝国全权代表兼东普鲁士省长职务的埃里希·科赫只是偶尔才来罗夫诺市待几天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说作为政府主席、科赫的副手、负责政治事务的保利·达格尔是常驻“首都”。他只是有时飞往基辅、尼古拉耶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或其它城市，以便坐阵指挥希特勒匪徒的警备司令及各省省长这伙人的“活动”。同时，那些民族主义叛徒也受达格尔的调遣。

库兹涅佐夫在支队待了几天时间。他同我们详细讨论了干掉达格尔的行动计划。在这之前，参与监视帝国专署的瓦莉娅·多夫格尔，仔细研究了政府主席的作息时间。无论是瓦莉娅还是库兹涅佐夫都还不知道，我们是否同意他们采取行动，不过，他们已经着手进行准备了。瓦莉娅向库兹涅佐夫通报了达格尔通常走的路线。她说，达格尔每天下午两点半钟从帝国专署出来到他自己的独门独户的宅院吃午饭。这时陪同他的只有一名少校副官，他通常用一只胳膊挟着一个红色的皮制文件夹。达格尔本人，库兹涅佐夫只是检阅那天见过一面。但是库兹涅佐夫坚信，他能认出他来。

达格尔住的宅邸位于罗夫诺市的一条主要街道上，法西斯匪徒称之为“施洛斯大街”。这条大街上住的全是希特勒匪徒的高级官员，当地的居民谁也无权光顾这里。

9月20日，罗夫诺专署的司机，原战俘卡里宁，向库兹涅佐夫提供了帝国专员个人专用的崭新的银灰色“奥培尔—首领”牌小汽车。

古尼拉·斯特鲁京斯基穿着德军士兵的军服，冒充司机，上了汽车。他旁边坐着库兹涅佐夫，身穿中尉制服，外加一件防雨军官斗篷。他们沿瓦莉娅所指示的路线驾车飞驰而去。达格尔离开帝国专署回自己宅邸的时间就要到了。库兹涅佐夫和斯特鲁京斯基两个人都深信，这次他们的行动定能取得成功。

如果把车停在街上等着，那太冒险了。街上有宪兵队在值勤，其中一个宪兵始终呆在达格尔的住宅旁。

于是库兹涅佐夫和斯特鲁京斯基把汽车停在了一个小巷里，从拐角处他们能够看见帝国专署大楼的大门台阶。

手表的指针快指到两点半钟的时候，从帝国专署大楼的

大门走出了宪兵队的司务长，他后面跟着一个穿便衣的人——显然是盖世太保的秘密警察。关于这些警卫情况，瓦莉娅事先告诉过库兹涅佐夫。而且，宪兵和盖世太保人员通常比达格尔早出来一两分钟，以便查看政府主席所需经过的路线。

两点三十分整，一个将军由一名少校陪同从刚才那个大门里走了出来，少校腋下夹着一个红色的文件夹。

“是他们，”库兹涅佐夫说。“科利亚，开车！”

汽车飞也似地冲向希特勒分子。库兹涅佐夫握着手枪，跳出驾驶室，举枪直射将军，接着又向副官射击。达格尔应声摇晃了一下，向后倒去。库兹涅佐夫又向两名法西斯分子“啷啷”补了两枪。

他什么也顾不上想了。他只是发现，那个将军的脸今天好象显得比那次检阅时要黑些。

库兹涅佐夫跳上汽车，顺手关上了急驶的汽车的门。然而就在他跑近汽车的那一刻，从他的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

那正是下班吃午饭的时候，大街上有很多过路的人。听到枪响，人们纷纷往四下里跑去，门窗噼噼啪啪地关了起来。刚才还是熙熙攘攘的街道，顿时变得沉寂无声了。当宪兵们跑到死者身边的时候，库兹涅佐夫他们的汽车早已无影无踪了。

一连过了好几天，我们都没有收到关于库兹涅佐夫执行惩罚行动的结果的报告。在往常，每天都有两、三个通信员从罗夫诺市来到营地。而这几天，正当我们急需了解市内情况的时候，仿佛故意作对似的，他们谁也不来了。显然，党卫军和宪兵对全城实行了封锁，使人无法离开。

最令人不安和纳闷的是没有一点消息。后来，当我们的

两个侦察队员终于来到营地的时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头一个迎向前去，一把接过他们带来的德国和乌克兰的报纸，读了起来……他顿时惊呆了。

“帝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格尔博士及其副官被暗杀，”他在第一版读道。在讣告栏里登有格尔的遗像，一张浮肿的脸，脑门上留着一绺希特勒式的头发。

格尔是送命前不几天才来到罗夫诺市搜刮民脂民膏的。政府主席达格尔殷勤招待，把他安排在自己的私邸下榻。

“哎哟，您怎么给弄错啦？”我问库兹涅佐夫。

“不知道，我也莫名其妙！我对达格尔的脸记得清清楚楚。我只是觉得这张脸比在那天检阅时黑了些。再说，那副官也夹着红色文件夹！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库兹涅佐夫惊异地说。他因为弄错了人而心情沮丧。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格尔长得和达格尔非常相似。

在库利科夫和加卢佐来到营地之后，小科利亚也来了。他带有瓦莉娅的信。在信中她也谈到了库兹涅佐夫的失误。

“她什么也没对我说？”库兹涅佐夫问。

“没有，”科利亚否定地摇了摇头说。

“让这个格尔见鬼去吧！”库兹涅佐夫又委屈又气愤地说。“下次开枪之前，一定要弄清他的姓名！……”

库兹涅佐夫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自己的这次失误。特别使他伤心的是，就连瓦莉娅——他了解这一点——也不原谅他的这次失误。因为她已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已经把行动计划给他“嚼碎”了，他只要咽下去就行了，而他却……

“请允许我再干一次，把达格尔干掉！”他坚持道。

“请镇静些，库兹涅佐夫！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错误。你知道，格尔是什么货色，他来这里是要干什么的！”

我们开始阅读库兹涅佐夫和加卢佐带回来的所有报纸。报上全都讲的是对帝国财政部要员的死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另外，死亡文告中宣称，虽然凶手穿的是德国军官的制服，但是当局很清楚他是什么人。

我们明白，希特勒分子“发现了线索”。我们明白了，也就高兴了。我们倒是曾经担心，库兹涅佐夫“失落”的皮夹未被发现。

有关这个皮夹还有一段小插曲。

在一次同民族主义分子叛徒的冲突中，一个曾作为斯捷潘·班杰拉的密使到过柏林的人，被我们俘获了。他交待说，盖世太保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很不满意。他们被蓬勃发展的游击队的活动吓破了胆，不但不敢同游击队交锋，而且在强大的德军警备部队的卵翼下躲躲藏藏。

“盖世太保命令我们立即投入全部力量同游击队斗争，”俘虏供认说。“我就是奉首领班杰拉的命令到这里来的。”

在这个密使身上，我们搜出一个皮夹子，是崭新的上等皮子做的，还印着柏林厂家的商标。皮夹子里的东西同俘虏的交待完全相符：进入西乌克兰领土的入境鉴证；乌克兰民族主义匪徒驻柏林组织的身份证及“首长”签发的要求立即集中全力彻底消灭苏联游击队的指示……

于是我们开始给皮夹子添东西。我们往这个皮夹子里放的东西和通常在被抓到的每一个俘虏或者在战斗中被击毙的民族主义分子身上发现的东西差不多：15个帝国马克，同样数目的美元，一张面值为5英镑的纸印，一些苏联卢布。我们还放进去几颗金牙套。民族主义分子把和平居民杀害之后，就从死者身上搜抢这些“值钱货”，把它们藏在自己皮

夹子里或者衣袋里。

皮夹子已经装满。最后，为了尽量做得天衣无缝，使希特勒分子信以为真，我们又往里面放了三枚沙皇时代的面值为10卢布的金币。

至于里面的指示，我们模仿原来的笔迹换上了新的，内称：

“亲爱的朋友！你至今尚未完成我们的命令，我们甚为诧异。德国人打输了这场战争，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应及时改弦易辙，而我们同希特勒匪徒的关系使我们的名声受到了影响。老爹毫不怀疑，你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完成任务。这一举动将成为今后反对德国人的一个信号。”然后是辨别不清的签名。

看了那些报纸之后，我们相信，皮夹子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我们获悉，在罗夫诺市因涉嫌杀害格尔而遭逮捕和枪毙的有38个最知名的乌克兰——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其中包括13名所谓“全乌克兰盖世太保”的工作人员。在希特勒分子的胁迫下用乌克兰语出版发行的《自由报》的编辑及另外一些“活动家”也遭逮捕，而且，这种逮捕并不仅仅局限于罗夫诺一个城市。

类似的消息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满意，然而它们却并不能使库兹涅佐夫感到轻松。

“我这是怎么搞的？”他仍然愤愤不平。“难道说应该公开地问其姓名吗？”

“从实质上看，达格尔和达尔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都这样安慰他。

不过，有一种情况同样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严重不安：关

于达格尔的被杀，在库兹涅佐夫报告的当天，我们就向莫斯科汇报了。好在，莫斯科的同志并不象在森林里的我们那样头脑发热，他们未核实之前没有报告统帅部。但是不论怎么说，我们陷入了可笑而难堪的境地，而且可以说欠了统帅部一笔债。

于是，我们同意库兹涅佐夫实施第二次暗杀行动。

我们的同志为了伪装罗夫诺市行政长官的灰色“奥培尔”汽车忙了一整夜，把车子涂成了黑色，换上了新的车牌，准备了新的证件。

9月30日，还是在第一次袭击那个位置，库兹涅佐夫向达格尔及其副官投掷了手榴弹。两个法西斯分子倒地。手榴弹的小碎片把库兹涅佐夫的左手擦伤了。但这并不妨碍他飞速上车。

这一次行动是冒着很大风险的。离爆炸地点不远处停着一辆德军“皮卡普”牌值勤汽车，斯特鲁京斯基不得不开车从它旁边绕过去。事发后盖世太保分子向“皮卡普”猛跑过去，但是司机给耽搁了：他吓得要死，怎么也发动不起汽车来。而当“皮卡普”终于启动的时候，黑色的“奥培尔”早已跑远了。

于是开始了一场追击。

在市郊，库兹涅佐夫看见了后面紧追他们的满载盖世太保分子的“皮卡普”汽车。他又发现，在他前面约一百米左右跑着一辆同样的黑色“奥培尔”。

“向左拐！”库兹涅佐夫向斯特鲁京斯基喊了一声。

斯特鲁京斯基来了个急转弯，险些翻车。他们穿过一个巷子把车开上了一条平行的马路上，然后调转车头，向森林方向飞驰而去。

盖世太保们继续追赶着前面那辆“奥培尔”。在城外的公路上，他们开了火。子弹打得车顶嗖嗖直响。于是“奥培尔”一头冲进了排水沟里。盖世太保们从汽车里拖出来一名吓得半死不活的德军少校，把他毒打一顿，捆起来送到了盖世太保机关。库兹涅佐夫和斯特鲁京斯基却顺利抵达“绿色了望站”，然后又从那里回到了营地。

在支队部的窝棚里，整个晚上都充满欢声笑语。库兹涅佐夫和斯特鲁京斯基两人激动地叙述了他们是如何炸死达格尔及其副官的，他们又是如何借助于一辆和他们汽车相似的“奥培尔”，从讨伐队的眼皮底下溜走的。他们的兴奋情绪也传染给了我们这些队部的工作人员。我们翻来复去地问这问那，竭力要了解这次惩罚行动的一切详细情形。就这样我们谁也没有睡觉，一直聊到天亮。早晨小科利亚回来了。他疲惫不堪、风尘仆仆。他带来了瓦莉娅的一封信。原来瓦莉娅没有按照指示呆在自己家里，而是从帝国专署大楼的楼道里观察暗杀的情形。这一次库兹涅佐夫没有弄错：他前面的人确实是达格尔。

但是，达格尔这一次并没有被炸死。手榴弹在马路上爆炸，紧挨着人行道。爆炸冲击波冲向着对面，手榴弹的柄把大街另一边上的一名德国军中校崩死了。

达格尔身负重伤，昏倒在人行道上，赶来的卫兵把他送回了府邸。

这是就瓦莉娅的信中所报告的一切。从信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出来，这一次她对库兹涅佐夫行动的评价也不怎么高。而后者本人则为这次行动的结果而大失所望。

如果不是有消息说，达格尔被送回柏林的话，库兹涅佐夫也许提出让他第三次暗杀达格尔。

政府主席的任期算是宣告结束了。

不久从柏林来了一大批盖世太保和宪兵队的地位显赫的“活动家”。他们接替了罗夫诺市这些机关的原任领导人——后者受到指控并被派往前线。看得出来，希特勒匪徒希望通过这种大换班，能够在罗夫诺市真正建成他们的“首都”，确立一种他们梦寐以求的那种平静的秩序。

而在“绿色了望站”，新的准备工作又开始了。从帝国专署车库弄来的一辆“奔驰”牌汽车刚刚在这里油漆一新。不等油漆干透，库兹涅佐夫和斯特鲁京斯基就坐了进去，准备开往罗夫诺市。

“要小心，油漆还没有干，你们会露马脚的，”小科利亚检查了准备工作之后说。

“不要紧，”斯特鲁京斯基开心地答道。“我们顶风开车，油漆很快就会干的！”

在一个哨卡，他们被拦住了：

“停车！你们的证件！”

库兹涅佐夫把他本人的、斯特鲁京斯基的以及机动车辆的证件都拿了出来。哨卡放行了。

过了一个街区，又是一个哨卡：

“停车！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库兹涅佐夫被激怒了：

“对不起，我们的证件刚刚检查过了！”

“请原谅，中尉先生，但是今天每走一步都要经过检查，”宪兵老实地解释道。“我们正在搜捕身穿德军军官制服的暴徒。”检查过库兹涅佐夫的证件之后，宪兵向他敬礼道：“请开车吧！”

“科利亚，拐进巷子里去，省得又碰上哨卡，”库兹涅

佐夫对斯特鲁京斯基说。

“不必担心，”斯特鲁京斯基答道，“我们的证件是可靠的。”

“证件倒是可靠，这个我也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去瓦莉娅那儿。万一我们受到暗中盯梢怎么办？最好还是先等一等。”

斯特鲁京斯基把车开进了巷子。

在拐角处，库兹涅佐夫让“奔驰”牌汽车停下，他下车上了马路。

“科利亚，你监视主要的街道，我来帮帮德国人。”

过了几分钟，库兹涅佐夫命令一辆开来的汽车停下：

“停车！要检查你们的证件！”

“中尉先生，我们的证件已经检查三次了。”

这辆车还没开走，又来了第二辆。

“停车！你们的证件！”库兹涅佐夫命令道。

“请放心，中尉，”这辆汽车里的一个乘客出示了盖世太保的徽章说，“我们也在搜捕那个暴徒……”

库兹涅佐夫检查证件两个小时，直到科利亚·斯特鲁京斯基告诉他说，其它街道上的哨卡已经撤去。这时，他们坐上汽车，放心地开走了。

当初，在检阅的时候，库兹涅佐夫和瓦莉娅在检阅台上看见过一个特别胖的人，他便是格尔曼·克努特将军，是负责乌克兰公共事务的副全权代表，也是“拍卖”事务所的头目。

格尔曼·克努特的本行就是掠夺。“拍卖”事务所的全部财产都是用冲锋枪和皮鞭从苏联人民身上搜刮而来的。克努特曾不止一次地亲自察看他的事务所的仓库。他常常仔细

观赏抢劫来的每一件物品，凡是 he 看中了了的，他就用手轻轻地摸一下。他的帮凶们对副行政长官的这个手势心领神会。克努特曾经指出，凡是 he 动过的物品，都是属于他的，都得将其送进他的私人仓库去。了解这一点就不难明白，副帝国全权代表何以会如此发胖了。

“拍卖”事务所座落在列吉昂大街，靠近铁路。库兹涅佐夫和斯特鲁京斯基从瓦莉娅那儿出来时，又带上了扬·卡明斯基。他们把车停在这条街上。他们无须等很久。以德国人的准确性，克努特六点整准时从办公室开车出来了。

卡明斯基把车门打开一条缝，欠着身，当克努特的车开到和他们的车并排的一刹那，他向克努特的汽车里仍进一颗手榴弹。

汽车的车头部分被炸毁了，汽车失去了控制，一头撞上对面的围墙。

库兹涅佐夫和斯特鲁京斯基立即用冲锋枪射击。当他们发现，已经无人可打时，这才如来时那样，镇静自若地疾驰而去。

在“拍卖”事务所旁边，汽车的残骸下面横躺着格尔曼·克努特的肥胖躯体，他旁边躺着他的私人司机的尸体。

法西斯匪徒埋葬格尔曼的时候曾大肆宣染张扬了一阵子，又是花圈，又是演讲，又是悼念文章。他们对于暗杀达格尔的事情也曾议论纷纷。而现在，关于克努特的死，报纸上连提都没有提。

克努特虽然被炸身亡，但是希特勒匪徒决定对此保持沉默。事实上，他们是“主人”，是他们建立了“新秩序”，他们是“胜利者”，而他们的头头在光天化日之下，却在罗夫诺市的大街上，在他们的“首都”，被身分不明的人击毙。

而且搜捕罪犯的行动毫无结果，因此最好还是一声不吭，免得自我难堪。

(十)

在罗夫诺市一个僻静的小街的边缘，有一所既简陋又狭小的房间，是个钟表店。门上那块“保修钟表”的招牌比房间的小窗口要大一些。窗口旁边总是有一位名叫季基的师傅在忙碌着。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接头地点。使用它的是舍夫丘克和另外三名同志。

一天，季基发现，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连续几次从他的窗口经过，每次都往里窥视一番。

第二天，舍夫丘克到了季基这儿。他递上自己的手表，当师傅检查手表的时候，他悄悄说了几句应转达给米佳·利谢伊金的话。然后舍夫丘克拿了手表，离去了。这时，季基又发现昨天来过的那个小男孩，站在马路对面。

“事情有点不大对头，”钟表匠想。

过了一个小时，又过了一个小时，小男孩突然来到钟表匠窗口，把头探进来问：

“叔叔！您知道，我怎样才能找到游击队吗？”

“你发疯了，还是怎么的？哪里有什么游击队？”

小男孩蓝色的眼睛里露出了恐惧的目光，吓得脸色也变了。但是，他仍然没有离开钟表匠：

“您也许认识和游击队熟识的人吧？”

“我怎么就会认识！”钟表匠摆出一副全然不知的样子，气乎乎地对他说。

“嗯，那么算了，”小男孩说完就走开了。

季基想了想，决定还是把小孩子叫回来。他跑出店门，

叫道：

“喂，小兄弟，我说小兄弟，请回来！”

小孩又跑回到窗前。

“进来吧！”

小孩走进钟表店。

“你找游击队干什么？”

“我没有权力说这个，只有对游击队长梅德韦杰夫我才能说。”

“原来是这样！那你先坐会儿。”

季基等着米佳·利谢伊金。不一会，他果然在钟表匠的窗口出现了。

“我这里来了个小家伙，”季基告诉他说，“您把他带上了解一下情况，您可要当心。”

在回答利谢伊金的询问时，小男孩回答说，他是列宁游击队兵团派遣去找梅德韦杰夫游击队的，该兵团驻扎在文尼察附近。

“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能跟您讲，”他断然地表示。

“我要见了支队长才说。”

“你叫什么名字？”

“沃洛佳。”

利谢伊金刚刚从季基口中知道了一个地址，汽车应该是从那里出发直接开往支队。舍夫丘克指示利谢伊金根据这个地址去找他。他要同库兹涅佐夫和舍夫丘克一起去支队营地接受新的指示。利谢伊金决定把那小家伙也带上。

在约定的地点有人给他们准备了一辆吨半卡车，车是从帝国专署车库开出来的。司机祖边科争取到了一次去卢茨克出差的机会。他领了通行证和货物——送给卢茨克的报纸和

传单——就悄悄地把车开来接游击队员。他们的关系很密切。

利谢伊金带着沃洛佳来到出发地点。早已站在汽车旁边的库兹涅佐夫大吃一惊，连眉毛都高高竖起来了。

“你从哪儿弄来个小家伙？”库兹涅佐夫耳语道。

“他在找梅德韦杰夫支队。他说，他是另外一个支队派来的。”

“先让他上车，回头再细问。”

但是正在这时，沃洛佳挣脱了利谢伊金的手，拔腿就跑。

利谢伊金两步追了上去。

“你去哪儿，小鬼？”

“叔叔，放开我，我是故意说我是游击队派来的。”

“啊，你这个小坏蛋！那么是宪兵派你来的？”

“你们自己才是宪兵呢！”沃洛佳呜咽着说，一旁狠狠地朝库兹涅佐夫瞪了一眼。

“哎呀，原来你被吓住了！”利谢伊金哈哈大笑起来。

“你让他给吓住了。”

他想都没想过，身穿希特勒军官制服的库兹涅佐夫会给小家伙造成什么印象。

利谢伊金俯下身，贴着沃洛佳的耳旁告诉他这个军官是干什么的，小家伙听了之后才同意上车。

卡车上共坐了六名侦察员。他们把自己的武器都藏在法西斯报纸堆里。库兹涅佐夫坐在司机旁边。

在出罗夫诺市的路口的哨卡旁边挂一块大牌子：

“单个车辆禁止出城。”

希特勒匪徒害怕游击队的袭击，所以只放车队出城。

在哨卡，库兹涅佐夫解释说，他不能等到汽车都到齐了

再走，因为他有紧急任务。这样他们的卡车给放行了。

然而，在前面，开出罗夫诺市大约10公里处，他们又遇到了严重的麻烦。

卡车快驶上桥的时候，侦察员从老远就看到，大桥附近有德军工兵在忙活着。

卡车刚刚停下，一名军官就走了过来。

“您瞧，桥被烧坏了，”他向库兹涅佐夫解释道。“再说，中尉先生，在这里单车行驶是很危险的：游击队活动得很猖獗。”

库兹涅佐夫提高了嗓门道：

“游击队算得了什么！照您这么说，有游击队，我们就应该在家里坐等吗？现在是战争！我有紧急任务！”

“请您对团长说吧。”军官耸耸肩说。“这不，他正往这儿走。”

库兹涅佐夫出了驾驶室，向德军少校迎上前去。

“希特勒万岁！”

“万岁！”

在卡车车厢里，侦察员们个个紧握着机头的手枪，子弹已经上膛，随时准备应付一切不测。沃洛佳刚刚还确信他已到了游击队。这时，在新的危险情况下，他躲到车厢的角落里去了。

过了不大一会儿，团长在同库兹涅佐夫交谈之后，他高声下达了口令。建桥的士兵们纷纷丢掉斧子和铁锹，向卡车奔来。

“呵，就要干了！”侦察员握住武器这样想。

这时，库兹涅佐夫不慌不忙地转回到卡车这边来了。

“一切正常。工兵们将把我们的汽车拖过桥去，”他对

自己的队友们低声说。

“要下车吗？”利谢伊金问道。

“你们坐着不用动！”

大约有50名德军工兵开始拉卡车，沿着泥泞的道路，绕过烧毁的桥面。

“加油干哪！我们可真受宠，”侦察员相视而笑地说。

这样过了大约一刻钟，工兵们刚把卡车拖到对面，往公路上一停，祖边科就加大油门，驱车向前飞驰而去。

侦察员们抵达营地时，天已经很晚了。听了关于沃洛佳的情况的报告，我让人安排他去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找他。但是，小家伙坚决反对，他要求现在就谈。他自己到我这儿来了：

“您就是梅德韦杰夫支队长吗？”

“不错。”

“我有秘密的事要告诉您。”

“你讲吧。”

“我只能对您一个人讲。”

这时，同我在一起的还有斯捷霍夫、卢金、库兹涅佐夫和采萨夫斯基。

“好吧，”我朝他们几个使了个眼色，“同志们，我们的机密不能泄露给你们。沃洛佳，我们进到窝棚里谈吧！”

进到窝棚里，小孩摘下帽子，把帽里子撕开，抽出一封信递给我。

我拆开信读了起来。信是打字机打成的。

“送信人系列宁游击队党组织书记的儿子沃洛佳·萨莫鲁哈，受领任务前去寻找梅德韦杰夫游击支队……”

列宁游击支队支队长请求向莫斯科报告，该支队依然存

在，并且一直在进行活动，但由于没有电台，所以未能同莫斯科联系。信里接着提供了他们所在位置的坐标，指定了日期和约定了信号，以便从莫斯科派出飞机给他们空投无线电台。在信的末尾还有一个请求：送沃洛佳去莫斯科。

我看了看小家伙。他把自己的裤子衬里撕开，又抽出一封信出来。

“还有一封信吗？”我问。

“这是一样的。假如我的帽子丢了，我还有一封。”

他把这封信也交给了我。

“就这样吧，你先在我们这儿住几天，如果有飞机来，我们就送你去莫斯科。”

“不，支队长同志，”沃洛佳坚决反对道，“我要留在您这里。”

“支队长同志，您就别把沃洛佳送走了，”利谢伊金走到我们跟前，帮着孩子说。“让他留下吧，小家伙挺不错！”

“好吧，我们看看再说，”我答应道。

(十一)

“刑警队的密探正在监视格涅久克。他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密探骑着自行车跟着他，”舍夫丘克向我们写信报告说。

格涅久克继续呆在罗夫诺市有被捕的危险。而且，最近一个时期，就连尼古拉本人的行动也不是一个侦察员所应该采取的行动了。原因是有一次在罗夫诺市一条主要街道上他碰上一件咄咄怪事。

格涅久克骑着自行车，在往马路对面拐去时，违犯了交通规则。一个站在那里负责指挥的宪兵，鸣起了警笛，然而

格涅久克没有理会这一套，还是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这时，另一名宪兵把他叫住了。那宪兵二话没说，上去就用橡皮棒子朝格涅久克猛敲了几棒。宪兵长得又粗又壮，格涅久克不准备还击他。他骑上自行车就飞快地向另一条街冲去。他怒火满腔，报复的欲望使他浑身发抖，脑子里嗡嗡直响。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科利亚—美妙的眼睛”，被法西斯宪兵毒打一顿，这还了得！

从此之后，格涅久克失去了镇静。他开始监视打他的宪兵，跟踪他，打算伺机在什么地方干掉他。他甚至一度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忘记了他在罗夫诺市的目的。

我们不得不把格涅久克从罗夫诺召回支队。

8月份，他被我们调到兹多耳布诺夫市执行一项任务：以更加秘密的方式重建兹多耳布诺夫小分队，把它变得更加坚强而有力，深入开展侦察工作，并且最终物色一个新的负责联系的通信员以接替列尼亚·克利缅科。后者连同他的汽车已经完全转隶罗夫诺市侦察员了。

与此同时，我们把德米特里·克拉斯诺戈洛韦茨叫到支队。

克拉斯诺戈洛韦茨在支队营地住了四天四夜，然后返回了兹多耳布诺夫市

从营地返回地方去的同志个个都欢欣鼓舞、情绪高昂。

克拉斯诺戈洛韦茨回去刚刚一个星期，我们就开始从兹多耳布诺夫市收到了关于铁路枢纽部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不仅写出了一昼夜通行的火车及车厢的数目，而且指出了行车路线：一辆辆列车从哪里发车开往何站；以及车上运的是什么货物；如果运的是技术装备，那就指明是什么样的装备，数量是多少，如果车上运的是部队，那就指明是什么兵

种，数量多少，而有时甚至报告了所运部队的番号。

对莫斯科来说，这样的情报是十分可贵的。在每一个数字后面隐藏着的是法西斯指挥部的新措施。在这些情报里，我们看到了顺利发展的苏军迅猛进攻的图景。这里面——当时我们曾这么想——也有我们的一份劳动，有我们同志们的一份贡献。

“谢谢，”莫斯科回答说，“请继续加紧进行侦察工作。”

我们当然遵照执行了。

在罗夫诺和兹多耳布诺夫，在卢茨克和萨尔内，我们的同志耐心而细致地搜集着一切可能有价值的情报。他们在战略公路上值班，夜以继日地呆在车站进行监视，努力寻找敌机场的位置，想方设法从希特勒分子的机关搞到地图和文件。

我们报务员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忙了。现在，从兹多耳布诺夫每隔三天就送来一次报告。几乎天天都有通信员从罗夫诺带回来库兹涅佐夫和舍夫丘克，斯特鲁京斯基和其他侦察员提供的情报。罗夫诺地下组织的成员进行着紧张的侦察工作。在罗夫诺——基辅的战略公路上，有兽医马特维·帕夫洛维奇·库岑和俄国公墓看护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莫伊洛夫在轮流值班。所有这些都需要报告给莫斯科。

原先同莫斯科联系是一个报务员，而且一天只有一次。现在需要两、三个报务员同时工作。

然而，在支队营地内只能有一个报务员工作，其他的报务员，为了不干挠他，应该到5公里之外的地方去工作。这就需要在把报务员派到远离营地的地方去的同时派出警卫战

士。

一天，报务员正在抄收兹多耳布诺夫小分队发来的报告。工作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刻，库兹涅佐夫发来紧急的、令人不安的通知：盖世太保匪徒向我们所在的森林开来三辆测向车，同时向别列兹诺耶、萨尔内以及拉基特诺耶等地派出了讨伐队。

通过测向可以准确地判定电台的所在位置，自然也就可知支队在什么地方了。首先确定支队的所在位置，尔后包围和除掉它——这就是占领军这又一次行动的目的。

库兹涅佐夫的报告得到了证实。第二天，侦察员报告说，米哈林村来了一辆满载士兵的汽车。天刚蒙蒙亮，汽车就开出村外。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是不见的，”当地的农民这样告诉侦察员，“两公里之内，谁也不让接近。”

侦察员们还报告说，希特勒匪徒分成小组在林中的小路上走来走去，他们头戴耳机，身背箱子。

如果现在电台继续工作，那就等于把支队驻地暴露给敌人。然而如果中断同莫斯科的联系，也是不允许的。

还是报务员自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支队长同志，”莉达·舍尔斯特涅娃对我说，“我和伙伴们考虑了，打算这么办：我们先离开营地15—20公里，在那里工作一阵子，然后收起电台再返回营地。让法西斯匪徒测定那些地方，往那里派出讨伐队。”

连续好几个昼夜，报务员由小部分警卫保护，轮流朝不同的方向离开营地，继续向莫斯科发报。

法西斯匪徒的测向队员在不同的地方“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尔后讨伐队“包围”了这些地方，开枪扫射，而每一

次……当然是必定扑空无疑。

就这样，敌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东窜西跑，疲于奔命，直到我们自己对这种“游戏”也感到腻了。

我派出一小组游击队去抓获敌测向队员。伏击虽然不怎么成功，测向车也未能搞到，只是把离米哈林村不远的敌警戒小队给驱散了。然而，希特勒匪徒惊恐万分一度停止了围剿。

……一天，兹多耳布诺夫的通信员伊万诺夫，象往常那样，带来了新消息，以及格涅久克和克拉斯诺戈洛韦茨照例托付给他的包裹。包裹里是药品，装在一个陈旧的黑色布袋里，伊万诺夫对这个布袋是寸步不离。

“喂，路上怎么样？”我总是这样问他。

“一帆风顺，”伊万诺夫一如既往地答道，不过，他突然笑了起来。起初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才二十岁刚出头。

“那么，就痛痛快快地说说，您在路上的遭遇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支队长同志。”

“那么，情况总还是有的喽？”

“总还有？”伊万诺夫又笑了。“不过是小事一桩。”

想必是我坚持要他讲，他才说了路上发生的事，这种事大概发生不是一次了。

三天之前——当他从“绿色了望站”返回兹多耳布诺夫的时候，在克列瓦尼车站旁边的道口，他被德军哨兵给拦住了。伊万诺夫感到事情不妙，因为在他的布袋里装着几枚反坦克手榴弹和香肠。

哨兵要他出示证件。证件倒是天衣无缝，无可挑剔的。伊万诺夫正要走，一个法西斯匪徒猛然瞥了一眼他那个布

袋。

为了避人耳目，手榴弹都用抹布包着。哨兵摸着用抹布包着的手榴弹的把，一眼看见了香肠，问道：

“伏特加酒？伏特加？”

“不是，”伊万诺夫笑着回答，“回来就带伏特加，我正是去买伏特加的，”说着从布袋里掏出香肠，递给了哨兵。

“带伏特加来！”哨兵在已经离去的伊万诺夫背后喊道。

“一定！”伊万诺夫边走边回了他一句。

他不快不慢地讲了这件事，仿佛是讲一件滑稽可笑的事，仿佛他对这种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危险毫不在乎似的。

伊万诺夫这次带回来的消息特别重要。来自列宁格勒的德军军列从兹多耳布诺夫车站开过，驶向文尼察方向，兹多耳布诺夫的同志们报告了敌军的数量和部队番号。

这份报告还指出，平均每天有一趟拉有15个车皮的水泥和平车的军列从兹多耳布诺夫通过。平车上放的是已经做好的机枪巢——用钢筋混凝土制作的暗堡，上面带有机枪发射孔。货物终点站——别拉雅采尔科夫，别的同志也报告了这一情况。

“原来要在那儿构筑工事！”在去无线电排的路上，我这样想。兹多耳布诺夫的同志带回来的报告，说明近期内在别拉雅采尔科夫将有一场交战，表明乌克兰的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

“马丽娜，”我对值班报务员说，“请您将这份报告立即用密码发往莫斯科。”

夜间，莫斯科来了回电：

“火车途经兹多耳布诺夫的报告很有价值，谢谢同志们。望继续加紧侦察。再见！”

我真想马上就把这封电报告诉伊万诺夫，好让克拉斯诺戈洛韦茨、格涅久克和其他同志明天就了解这一情况。他们是否知道自己获得的情报的真正价值呢？来自莫斯科的这句简短的“谢谢”，将使他们受到何等的鼓舞，使他们多么振奋啊！

(十二)

米赫耶夫排长向我报告说，他的分队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事故：他被人盗窃，两千德国马克不见了。

“您敢肯定是在支队里丢的吗？该不是您自己把钱丢了？”我问道。

“钱昨天还在，支队长同志，”米赫耶夫满腹懊丧地说。

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原则问题。

“您去集合分队，”我吩咐米赫耶夫道。

当他回来报告说全排已经集合好之后，斯捷霍夫、卢金和我就到他们排去了。

“同志们，”斯捷霍夫开口道，“发生了一件可耻的事情。在我们支队——失窃了！你们自己也都明白，问题不在于钱多少，钱我们总可以弄到的。问题在于在我们中间有不体面的人。”

队列里传出同志们的呼声：

“搜查！”

“挨个搜查！”

接着，一名年轻的白俄罗斯族游击队员在得到允许之后说：

“这样下去无法生活，全排人都背黑锅，应该清洗掉这个污点。所以我们建议进行普遍搜查。”

我们把警卫队长召来了。他站在队列旁边。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向他走去，把手举得高高的，让他搜查，同时自豪地看着卫队长的脸。

个人的东西都进行了检查，甚至连游击队员睡过的地方也都搜查过了，但是毫无结果。钱没有找到。大家的情绪一落千丈。排里的战士默默地解散了。

第二天，米赫耶夫的分队被派到卢茨克的方向上寻找那些从希特勒集中营跑出来的战俘丢弃的武器，同时找人进行联络。

我目送着该排战士出发之后，就向卢金那里走去。我有一个疑点想告诉他。还在昨天搜查时，我注意到一个名叫瑙缅科的战士。他人已经不年轻了，头已秃顶，身穿蓝色军便服，脚上穿的是一双厚油布做的矮腰靴。他前不久刚到支队——是同一组逃跑的战俘一起来的。当宣布要进行搜查时，我觉得，这个瑙缅科的脸色发白，和其他战士不同，表现异常，目光迷茫，疑虑重重，举足无措。我问卢金他对瑙缅科的看法。

“瑙缅科几次出入罗夫诺执行我们的任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说。“通常是他自己请求派他去的，在战斗中表现也不错。但是，继续让他当侦察员未必合适。在城里他什么也干不了。曾让他去搞纸张，他没有完成，他所带回来的情报是混乱的。我认为，今后没有必要再派他去了。”

“是没有必要了，”我表示同意，接着我向卢金讲了我对他的怀疑。

过了一周，米赫耶夫排回来了。米赫耶夫汇报了执行任务的情况，接着他又说：

“出事了，支队长同志！瑙缅科失踪了！”

“怎么会失踪的呢？”

“不明白，出发的第二天，我们发现瑙缅科不见了，失踪了。”

“你们找过没有？”

“找了，整个森林，四面八方全找了，我们还设置了观察哨，但毫无结果……”

谁也不知道，瑙缅科出了什么事。后来，鲍里斯·克鲁季科夫从罗夫诺回来了。他报告说在路上遇见了瑙缅科。

“你去哪儿？”克鲁季科夫问他。

“去罗夫诺，”瑙缅科镇静地答道。

“去干什么？”

“和你一样，是支队长派我去的。”

克鲁季科夫没再耽搁，继续赶路了。

我们这才明白，在我们的队伍里出了叛徒。

罗夫诺市内的侦察员奉命千方百计查明瑙缅科的下落，尽一切可能把这个叛徒除掉。

瑙缅科逃跑以后过了几天，库兹涅佐夫和舍夫丘克报告说，罗夫诺市内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了。大街上到处都有奸细，盖世太保秘密的和公开的特务，他们几乎对每一个行人都要盯住审视一番，检查证件……

斯特鲁京斯基在他的报告中写道：“我看到瑙缅科同盖世太保分子一起坐着小汽车。”

希特勒匪徒频频进行全面搜查和兜捕。看样子，盖世太保决定要搜查全城每一个角落。他们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挨个封锁。盖世太保的密探带着宪兵在每一幢房子、每一户住家前进行巡逻。

就这样，他们也闯到了莉季娅·利索夫斯卡娅的家。当时，没有任何侦察员在那里，但是莉季娅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她的沙发里藏着武器，两支步枪和子弹，还有六枚反坦克手榴弹。

“请进，”莉季娅应了一声，当时一位年轻的中尉正在砰砰地敲门。

中尉带着两个士兵走了进来。他吩咐一个士兵守着正门，另一名士兵守着后门。

“只准进，不准出？”他命令道。

这个中尉呆头呆脑地搜查得很仔细，严格遵循一切搜查规则。莉季娅据此断定，这个家伙是个军龄不长的新手。他搜查了前厅、厨房和卧室。当搜查到餐厅的时候，莉季娅带着媚人的笑容请中尉招呼他的手下来帮忙。

“中尉先生，如果全靠您一个人忙碌，您很快就会给累坏的。”

她把中尉让到沙发上，自己也在他旁边坐下。在士兵翻动东西，挪动家俱的工夫，她同他一直进行着亲切的交谈。

搜查结束了，中尉从沙发上欠起身来，十分殷勤地同莉季娅道别，答应不久再来拜访她——那时就不象今天这样，担负着令人如此不愉快的差使了。

当天晚上，瓦莉娅听到敲门声，忙去开门。在门口，她

看到来的是舍夫丘克。瓦莉娅的感情是双重的。一方面，在自己家里见到与之要好的，她感到非常高兴。另一方面，舍夫丘克这一举动违反了秘密工作的所有规定。

总之，从实际情形看，所有的侦察员从事侦察工作的时间愈长，就会愈经常地聚集在一起，从而违反了指挥部严禁这样做的有关规定。这个友爱的集体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他们是：瓦莉娅，库兹涅佐夫，舍夫丘克，斯特鲁京斯基以及格涅久克。他们每个人都大致知道，其他几个人在干什么，谁在什么地方，同谁如何联系，等等。当初，他们见面并不多，只是偶然相遇罢了。后来，渐渐养成了见面的习惯。这种见面是瞒着指挥部进行的。一点风声都没露。我也好，政治副支队长也好，侦察队长也好，虽然有时对这种相聚有所了解，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明说，保持着心照不宣的沉默。

即使是指挥机关，又能怎么办呢？能让同志们以什么活动来代替这些个友好的聚会呢？在法西斯匪徒堆里进行活动，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在那可怕的、有时是非人所能忍受的紧张状态中，不用几天，人已精疲力尽。而每一次晚上的聚会就好象是一个通风口，他们可以借此排遣一下疲劳和苦闷。同朋友的每一次见面会使人得到安慰和温暖，受到鼓舞和支持的。

在这些相聚的晚上，他们相互能说些什么呢？而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能够谈。无非有人讲讲笑话，有人回忆一下战前的幸福时代，憧憬着未来，而大多数人只是开开玩笑。人们常常开格涅久克的玩笑，笑他寻找打他的宪兵；也斥责瓦莉娅吸烟……有一次，那是格涅久克已调往兹多耳布诺夫去之后，库兹涅佐夫去他那里住了三天。库兹涅佐夫回来之后，

长时间地讲述了自己的种种印象。他是乘车去的。那辆车是科利亚·斯特鲁京斯基，象历次一样向帝国专员贝格“借用”的。汽车从兹多耳布诺夫开回来，装了满满的一车苹果。这是那里的同志送给他们的礼物。库兹涅佐夫从兹多耳布诺夫开车直接到了瓦莉娅家，把全部苹果都卸在了她那儿。此后很长时间，无论他们在哪儿聚会，瓦莉娅和斯特鲁京斯基就带去一大篮子苹果招待同志们。

但到瓦莉娅本人这儿来找她是不合规矩的，而且，除库兹涅佐夫和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两个人之外，其他人是绝对禁止到她这里来的。

而今天，在如此令人担忧的时刻，舍夫丘克却到了瓦莉娅这儿。

他若无其事地来了，好象理应如此似的，坐到桌旁，要茶喝，而且说如果还是有苹果，那就来一个苹果。不过对于吃饭他则断然拒绝道：“吃不下。”看得出来，他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

瓦莉娅再三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舍夫丘克累成了这样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瞎说！”他答道：“只是因为跑了一天，太累了。”瓦莉娅明白，他是不想说，她也就不再问了。

舍夫丘克坐到将近十点。在十点钟时，他已经起身要走了，却突然说，他去哪都来不及了，于是欢迎也好，不欢迎也罢，他都不得不留在这儿过夜了。“只是这件事情对任何人都不要讲。”

瓦莉娅沉默不语，她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她母亲不等女儿回答就说：

“有什么好怕的，瓦莉娅！天都这么晚了，他能去哪

儿！……您别不好意思，舍夫丘克，您就躺在这沙发上，痛痛快快地睡一觉，睡到什么时候都行，需要几点起床，告我一声，我好叫醒您。”

舍夫丘克疑惑地朝瓦莉娅瞥了一眼。他看到的是那友好、调皮却又令人鼓舞的目光，他终于决定留下来了。

瓦莉娅的母亲叶夫多基娅·普罗科菲耶夫娜本来应该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把舍夫丘克叫醒。不料就在五点多钟传来了一阵长长的警笛，接着响起了枪声，把所有的人都惊醒了。瓦莉娅从自己的房间里跑了出来，一看到舍夫丘克，她立刻明白，他什么都听见了。

“我这就去了解一下情况，”她不安地说，披上大衣，就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就回来了，没用多长时间，就弄清街上发生的事情。

“街上有宪兵，在检查证件……”

在她的话中，他没有发现那种他所期待的、也是应该听到的那种责难。

接头地点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

舍夫丘克穿好风衣，把皮包拎在手里，但是立即被瓦莉娅叫住了：

“这是干什么！您到哪里去？您就坐在这里，您的证件放好了吗？”

舍夫丘克打开皮包，从里面掏出几个不同的证件，都放在衣袋里。皮包的底层有一颗手榴弹。

很快宪兵就来了。一个军官，两个士兵急急跨进房间，冷空气也随之涌入。他们看到的是平时那种平静的情形：姑娘穿着平时穿的灰色连衣裙，一位上了岁数的妇女，看来是

母亲，一位中年男子，穿着得体，戴着眼镜，正在喝茶。看见他们进来，姑娘立即用德语说：

“请进来，请进来！请把门关严一些。”

那军官，身材高大、匀称，一双淡淡的眼睛射出蛮横无礼的目光，他举手行礼道：

“小姐，要检查。”

这时，士兵已经冲进另一个房间。

“请检查，”瓦莉娅坦然地说道，“这是我的证件，只求你们快点，要不我上班就会迟到的。”

“不用担心，小姐，”军官冷笑着答道，“您可能要耽搁几个小时了……街上不通车，帝国专署不会因此对您有意见的。”

“真的吗？”瓦莉娅爽朗地笑起来。“噢，这么一来，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急的了。妈妈，”她对母亲说，“请给这位中尉先生端杯茶！”

“不，不，”军官既有礼貌而又坚决地推辞道，“现在我没有时间。”

“但是，瞧您有多冷啊！”

“如果小姐不反对，我下次一定来。”

瓦莉娅立即表示欢迎他来，但又补充说，现在喝杯茶也占不了多少时间。

“谁同您住在这儿？”军官问道。

“我同母亲住在这儿，”瓦莉娅流利地答道。“而这位，”她指着舍夫丘克，“是我的表兄。”

“扬克维奇，”舍夫丘克把腰微微一弯，有礼貌地自我介绍道。

军官以好奇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舍夫丘克。

“有证件吗？”

舍夫丘克把证件递给他。盖世太保的徽章，他没有拿出来。军官仔细地看了一遍证件。又拿着证件抬眼看了看舍夫丘克，说道：

“这上面写的您住在别处。”

“是的。”瓦莉娅插话说，“他昨天晚上来我们这儿，耽搁了没走成，我和母亲就让他在这儿住了一个晚上……”

皮包就在椅子上放着，舍夫丘克随时都可以把手榴弹掏出来。军官的目光曾落在皮包上，不过那只是一瞬间。假如他打算搜查房间的话，他当然要从这只皮包开始。这是不能允许的！

“表兄？”军官重复了一句，他先看了看瓦莉娅，接着又看了看舍夫丘克。终于把证件还给他。这意味着，检查已告结束。

军官走后，舍夫丘克向瓦莉娅解释，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昨天冒着可能使他们俩付出重大代价的危险突然来到了这儿。那原因正如自己表白的那样，是微不足道的：他感到寂寞、郁闷、孤单——而终于忍受不住了……

“这是对我的罚惩，”他苦笑着说，“他们恰恰今天来检查！现在看来要格外小心了。谁知道瑙緬科的无耻叛变还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瓦莉娅和舍夫丘克一直等到中午，当他们确信搜捕已经结束，他们才走出来。一到街上，他们就道别分手了。

这是舍夫丘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瓦莉娅这儿来。我们当然了解到了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没有立刻批评他：我们断定，他将从这次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行为中很好地吸取教训。

所幸的是，叛徒璘緬科同库兹涅佐夫、舍夫丘克、斯特鲁京斯基都没见过面，他谁也不认识。他既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不知道我们在城市里的秘密联络点。不过，他还是通过某种手段摸到一个秘密联络点的一些蛛丝马迹，并且报告了盖世太保。有两个同志——尼古拉·库利科夫和瓦夏·加卢佐——我们未能使他们幸免于难。

库利科夫和加卢佐住在市中心赫梅利大街上的一座不大的二层楼里。库利科夫战前是农村教师，加卢佐是农艺师。

加卢佐外表同库兹涅佐夫有些相象，而且盖世太保人员看来也相信，他们盯住的这个正是库兹涅佐夫。保利·齐贝特军官现在还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一天夜里，盖世太保包围了这幢房子。女房东首先发现了情况并且叫醒了侦察员。

加卢佐看了看窗外。

“安东宁娜·瓦西里耶夫娜，您赶快离开这儿。对他们编造一些理由就躲起来。我们留在这儿。”

女主人走了。

“俄国佬游击队，快出来！”盖世太保匪徒在街上喊叫起来。

这时，库利科夫和加卢佐迅速地用家具堵住了门和窗户，构筑了防栅，准备自卫。

盖世太保匪徒开始破门而入了。两个游击队员从窗户开枪还击，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打响了。

敌人用步枪、冲锋枪和机枪对着窗口射击，库利科夫和加卢佐用自己的手枪回击他们。希特勒匪徒发现他们的围攻不能奏效，而游击队员枪法准确，使他们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于是他们又调来援兵。

一辆汽车载着大口径机枪开来了。游击队员从窗口扔出一颗手榴弹，汽车和机枪被摧毁了。盖世太保匪徒不得不再次请求增援。

这场市中心的战斗，这场由两名苏联爱国者抗击大约一百名法西斯讨伐队的战斗，持续了六个多小时，天色已亮，街上交通中断，附近房屋的所有玻璃全被打碎了，两名勇士继续向敌人射击和投掷手榴弹。

后来，所有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光了，加卢佐和库利科夫销毁了全部文件。

经过了六个多小时的战斗，约有二十名法西斯匪徒送命，盖世太保匪徒仅“俘获”了两具尸体。

安东宁娜·瓦西里耶夫娜也未能幸免于难。她被捕了，受到残酷的拷问，所有的牙齿被打掉，头发被揪掉。瑞缅科也参加了审讯，参加了拷打。安东宁娜·瓦西里耶夫娜始终没有开口。她是在审讯时被枪杀的。

(十三)

帝国专署讨伐队长官克鲁格博士有一个习惯：每天至少有三、四次离开办公室，很难说，这全是出于公务。克鲁格博士常常是和他的同行们去最近的一家咖啡厅喝啤酒，用他的话说是去“提提精神”。“我去提提精神”，每逢这种时候，他就对自己的工作人员多弗格尔小姐说。“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告诉他，我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当克鲁格回来时，看他的脸色，不能说他已经提高了精神，倒不如说，恰恰相反。他的脸失去了平常那种心满意足、无忧无虑的神情，而变得昏昏沉沉，睡眼惺忪，而且皮肤松弛。他懒洋洋地坐到桌旁，过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就又出去了。啤

酒并不是克鲁格博士的唯一嗜好。他在尽一个作父亲的义务方面同样是十分热心和努力的。克鲁格在慕尼黑的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女儿。假如他不是为了定期给她们寄包裹的话，那么，他在乌克兰一定被认为是毫无目的的了。这项重要的工作是由一系列其它的、零碎细小的工作组成的：要弄到所需要的东西，要用适当的方法把它们收拾好，放在木箱子里，包好，钉好，在上面写上地址，最后，送到邮局寄出去。克鲁格不相信自己的部属能够做这些工作，认为还是亲自动手可靠。这是他经常外出的第二个原因。

上司频繁离开办公室也未必就会使瓦伦丁娜·多弗格尔小姐因此特别受累。她只不过得随时准备接听一个又一个电话，接收和发出帝国专署的邮件，派出信使。克鲁格博士对他的这位助手非常满意，主要评价她的任劳任怨，而主要的还是夸她谦虚。他对她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务方面都不保守秘密。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那串钥匙。克鲁格外出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的钥匙留在桌子上。

有一天，瓦莉娅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她象往常那样，朝保险柜里看了看，她发现里面有一份新到的文件。她立即跑到门口，轻轻地扭转了一下钥匙锁上了门。保险柜里放着的是已经开封的几份命令。命令的内容是她至今所不知道的。命令由副帝国全权代表冯克博士签发，注明的日期是昨天。很显然，文件刚刚才复印出来。

瓦莉娅浏览了一遍命令，本想拿走一份，但立刻就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它们都是编有号码的。于是，她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一行接一行仔细读完了命令的全文，然后把文件放回原处，打开办公室的门。巧得很，这时正传来上司走在楼道里那不慌不忙的脚步声。

“博士，”克鲁格刚走进办公室，瓦莉娅就对他说，“请允许我出去个把小时，我有件急事要办。”

她最担心的是上司不放她出去。他不喜欢她离开。

“急事……”克鲁格说了几句埋怨的话。他本人显然是出去买了点东西，而且看样子，在路上也“提了提精神”。

“那谁在这里守着呢？我需要把东西放到箱子里去。”

“我给您放，”瓦莉娅胆怯地提议道。

克鲁格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瓦莉娅，仿佛是在考虑，是不是有必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托她来办。看样子他已经决定，委托她没有必要，而放她出去还是可以的。他说：

“我给您五十分钟。”

瓦莉娅拎起大衣就跑了出去。

五十分钟之后她没有回来。过了一小时她仍然没有回来。她离开了整整一小时四十分钟。克鲁格见她终于回来了，火冒三丈，大骂了一通，跑了出去，把门摔得“砰砰”直响：他是急着要去邮寄包裹。

在街上同库兹涅佐夫短暂见面时，瓦莉娅告诉他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将由柏林来罗夫诺市。此人是希特勒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是纳粹主义的“理论家”，负责“东方诸省”的帝国部长。冯克命令在罗夫诺市各条街道组织特别警戒。

库兹涅佐夫告诉瓦莉娅，他当天晚上就回支队去征求同意收拾罗森堡。

在帝国专署里一天的工作结束了。瓦莉娅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的时候，吉捷尔少校向她走来。最近一个时期，瓦莉娅越来越多地在讨伐队的工作室里遇见他。

“我能送送小姐吗？”吉捷尔俯向她的肩膀，带着满嘴的酒气，问道。

“可以，请吧，少校先生，”瓦莉娅避开他，答道。

这个吉捷尔一向以态度温和、彬彬有礼以及甜言蜜语而出名。他相当年轻，穿着得体，走路带着硬马鞭，他总好表现自己是一个讲究衣着和仪表的人。

他们来到大街上，瓦莉娅再次产生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每次齐贝特同她挽着胳膊走路的时候，她都有这种感觉：她看到，行人纷纷让开，不看他们，闪到一边去了。

“小姐在班上感觉怎么样？”吉捷尔右手挽着瓦莉娅的胳膊，左手舞动着马鞭问道。

“谢谢您，少校先生！我感觉一切都好，”她不明白，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瓦莉娅的同事当中，谁也不知道，吉捷尔少校在帝国专署是干什么的。他的二楼办公室通常是锁着的。人们有时在这个地方，有时在那个地方遇见少校本人。吉捷尔是何许人瓦莉娅在很长时间内也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次，瓦莉娅下班之后在帝国专署大楼里耽搁了一会儿，当她往外走的时候，她朝一扇半掩着的门里瞥了一眼，看见吉捷尔正在干着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他在别人的抽屉里翻腾。瓦莉娅于是猜测到，这位棕黄头发、讲究衣着的人，在帝国专署里是干什么的以及他实际的工作地点了……

“小姐结婚了吗？”吉捷尔问瓦莉娅并且不等她回答，自己又接着说：“噢，我想起来了，小姐已经有了未婚夫。”

“完全正确，”瓦莉娅说，“他是位军官，对名声看得特别重。如果看到我同您在一起手挽着手，他未必很满意。”

她原以为，经她这么一说，也许就能甩掉这个死气白赖的少校。

然而，看来成功追逐女人并非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瓦莉娅渐渐懂得了，吉捷尔所负有的责任。

“而您的未婚夫，他在什么单位供职？”少校一边问，一边继续舞弄着那根马鞭。瓦莉娅注意到，那根马鞭非常漂亮：看去象似颅骨和蛇皮，发出银灰色的光……

“他是前线军人。”

“前线军人为什么不在前线服役？”吉捷尔眨了眨眼睛说。

“他分管军队的供给工作。”

“他常来罗夫诺市吗？”

“常来……工作要求他这样。”

“我问这个是因为在帝国全权代表的接待室里曾经偶然看见过你们在一起，”吉捷尔说。“从那时起，您和您的未婚夫……请原谅，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保利·齐贝特。”

“……您和您的未婚夫给我留下了最真切的好感。您不能提供机会，介绍我同齐贝特中尉认识一下吗？”

“可以，”瓦莉娅答应道。

显然，这就是吉捷尔所要从瓦莉娅那儿获得的一切。他送她到了家，彬彬有礼地同她告别，离去了。

瓦莉娅在家呆了不到十分钟，她需要立即找到库兹涅佐夫。

她知道伊万·普里霍季科的住址。虽然绝对禁止到那里走访库兹涅佐夫，她还是匆匆奔向那里。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趁库兹涅佐夫还没有出发去支队，见他一面，把她同吉

捷尔的谈话告诉给他。

这一次库兹涅佐夫对瓦莉娅异常地冷淡。他已经穿好了短大衣，一看便知，在他要离开的最后一分钟，瓦莉娅碰到了他。

对瓦莉娅的报告，库兹涅佐夫感到格外突然。

“这就是说，吉捷尔这家伙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了？”

经过考虑他们认为，库兹涅佐夫真的有必要会会吉捷尔，但这次会见不应由瓦莉娅，而应由莉季娅·利索夫斯卡娅或者由迈娅·米卡托娃来安排。她们两个，无论是谁，都早已“应聘”到冯·奥尔特的盖世太保机关工作了。

莉季娅和迈娅都认识吉捷尔。迈娅同他刚一见面就好像是顺便提起似地说她和表妹准备组织伙伴们玩玩，并且邀请吉捷尔也参加晚会。这时，她点出应邀参加晚会的人中间也有保利·齐贝特。

“齐贝特？”吉捷尔反问道。“这很有意思，我很乐意参加。”

“您就是为了这个齐贝特才来的吗？”迈娅受委屈地说。“我不明白，他有什么值得您对他如此感兴趣。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普鲁士人。我本来没有邀请他，但是他见到了我表妹，一再向她请求。”

“我觉得，他们似乎不是个‘普普通通的普鲁士人’，”吉捷尔诡秘地冷笑一声道，“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间谍。”

“您说什么，少校！”迈娅惊异地说。她接着一本正经地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您不把他抓起来？”

“就因为除了我，谁都不怀疑这个人，”吉捷尔不无自豪地答道。“这是我的发现，请您先不要对人谈论这件事

……我顺便插一句，也用不着我来教您。再说，为什么要抓一个英国间谍呢？他又不是布尔什维克，对他可以再等一等，看一看他究竟是什么大人物，怎么处置他更为有利……”

他们约定，晚会于最近一个周末在莉达家里举行。吉捷尔很高兴这个主意。告别的时候，他提醒迈娅说，齐贝特一定要邀请。

库兹涅佐夫从支队回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而是同瓦利亚·谢苗诺夫一起。后者扮充一个在希特勒匪徒那里供职的叛徒，穿着德军的服装，背着步枪。

于此同时，我们对地下工作者也下达了命令。以诺瓦克和卢茨为首的地下组织全体成员都行动起来，执行一项经过周密计划的行动。

库兹涅佐夫和谢苗诺夫回到城市的时候，正赶上这里在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德军士兵们打扫街道，人行道也用刷子擦得干干净净，篱笆被匆匆地油漆一新。显而易见，“贵宾”最近几天就要到了。

一天晚上，库兹涅佐夫在莉季娅·利索夫斯卡娅家里见到了奥尔特。他好象心事重重，不时地看表，甚至迈娅也不能使他活跃起来。他终于站起身，说他有急事要先走一步。

“您急着要去哪儿，少校？”迈娅想留住他。“再坐一会儿！您总是忙个不停。”

“唉，迈娅，”冯·奥尔特答道，“我们的勤务就是如此。瞧齐贝特，他多自由自在……”

“我暂时还不必返回前线，”齐贝特说。

“实际上，你还不如去前线，齐贝特，”冯·奥尔特友好地拍了拍朋友的肩膀说。“相信我说的话，现在那里比在这儿舒服。”

“据我所知，那儿也不怎么舒服。”

“总比在这个偏僻的后方要好一些。”

“既然这么说，你自己怎么不去？”

“我要去的，”冯·奥尔特说。“上一次虽然没有去成，但我不后悔。现在又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差使。不论怎么说，比在这里要舒服。”他补充道。

库兹涅佐夫由此断定，冯·奥尔特正准备离开。有一天晚上奥尔特说到他曾打算去一个秘密工厂，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话题上。显然是没有走成，所以奥尔特认为最好还是不再和齐贝特谈这件事情。但是，他最近几天越来越多地暗示，他可能有机会“官运亨通”，而今天他终于直截了当地说出，他要走了。

可能派他去什么地方呢？去前线？怕未必：象他这样的人，希特勒匪徒在后方是需要的。去沦陷区的其它城市？如果是这样，那么，奥尔特就不会说在那里比在这“偏僻的后方”会“更舒服”。

库兹涅佐夫一时还揣摩不透奥尔特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他推测的主要根据是奥尔特俄语讲得相当漂亮。难道他要去我们那边，去我们的后方？想到这儿，库兹涅佐夫坐卧不宁。

去问他？然而库兹涅佐夫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原则：任何时候他都不主动地去打听什么。

冯·奥尔特离去了。

库兹涅佐夫又坐了不大一会儿也起身要走了。和莉达、迈娅告别的时候，他告诉她们说，他对冯·奥尔特的去向很感兴趣。

他决定顺便去瓦莉娅那儿。她或许能知道罗森堡什么时

候到。不过，他自己也知道什么时候——那就是明天。

在去瓦莉娅的路上，他愈加经常地发现自己有一种念头，就是故意想出某种借口，以便证明他们的碰头是必须的。就拿今天来说吧，他打算问的事情，其实他自己完全知道。他只不过是见见瓦莉娅，看看她的面容，她的眼睛，她的微笑，听听讲话的声音……

如果他听任自己倾诉这种感情的话，他可能首先感到，他现在的生活——穿着这身象铠甲似的德军军服——使他受到多么大的痛苦和折磨。

瓦莉娅证实，阿尔弗莱德·罗森堡明天将到罗夫诺市。不出所料，他将下榻在科赫的底邸。

她和库兹涅佐夫谈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晨，库兹涅佐夫照例出去散步。然而，他沿着“德国大街”没有几步就被拦住了。一宪兵中校要他出示证件，并对证件，翻来复去地看了好久，才还给库兹涅佐夫。

“中尉，我不得不请您离开这条街，您可以走另外一条平行的街道。”他说。

“但是，我要去的是帝国专署啊！”

“今天那里不会客，什么机关都不会客。”

库兹涅佐夫伸出胳膊，敬了个礼，就转身向一个小巷子走去。

半个小时之后，他又来到“德国大街”。这里已经布满军队。宪兵队的宪兵间隔五米，一个接一个地排开，象两条长长的锁链，站在街道两旁，背朝马路，面向人行道。当高音警笛鸣响起来的时候，宪兵们荷枪实弹对着人行道，摆出射击的架势。库兹涅佐夫看到，有七八辆轿车疾驶而去。他

明白，在这儿下手是不可能的，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

地下工作者的所有尝试也都未能奏效。

瓦利亚·谢苗诺夫在罗夫诺市内呆了整整四天。有一天，他在教堂旁边的长凳上坐着的时候，两个宪兵给他拍了照。谢苗诺夫把这件事告诉了库兹涅佐夫之后，就立即回支队去了。

“没交好运！？”他后来常常懊丧地说。

(十四)

齐贝特同冯·奥尔特在“德国大街”的一家咖啡厅见面了。虽然顾客换了一批又一批，歌女在叮咚作响的钢琴伴奏下已经是第三或者第四次演唱自己最叫座的歌曲《我梦见了你》，然而他们两个仍然坐在那里谈个不停，没有离去的意思。

长时间以来，可以称得上谈心的，这是第一次。也许是老相识的关系使他们相依不舍，也许是烟雾缭绕的大厅、周围陌生的面孔和没完没了的“我梦见了你”的歌声使他们可以倾心交谈。而且今天晚上，他们对所谈的一切互相都坚信不疑。在过去，他们对对方的谈话是宁可不置可否的。

开始的时候，他们仍象往常那样，谈些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事。后来，就转了话题，不知不觉地接触到一些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他们每个人早就有自己的看法。

“你对这次的‘库尔斯克事件’怎么看？你对所说俄国人在进攻怎么看？”冯·奥尔特问道。

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已经包含有信任的成份。只有互相互非常了解的人可能谈论库尔斯克和伏尔加河流域的战斗情况。

“我该怎么给你说好呢……”齐贝特含糊其词地说，“我从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穿丧服也是有其相当充分的理由的……但是，我不喜欢丧服，我不是政治家，对这种事不甚了了，但我想说……你如果认为这很可笑，我会感到委曲的……我想，历史上有这种时候，失败者在胜利者面前具有某些个优势。你认为可笑吗？且慢，我还没有说完自己的意思。在胜利的日子里有什么东西迫使你考虑到严重的形势？什么也没有。胜利会使人冲昏头脑。而失败呢？失败甚至迫使我也在思考，”齐贝特冷笑一声，继续说，“德意志需要的是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精神，这两者不是在胜利中产生的，而是在失败中产生的。”

“说得好！”奥尔特赞叹道。“齐贝特，你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理论家。趁现在还不晚，去见见阿尔弗莱德·罗森堡，不然的话，再过一天——他就回柏林去了。你当面向他说说你的观点，他一定会让你当他的助手的！”

“我顺便插一句，我父亲同他曾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我想，他如果见到我，也一定会记起我来的。”

“不错。你和他不是同乡吗？不过，听说罗森堡是在俄国出生的。这样看来，与其说你，不如说我是他的同乡。”

“你？可你很不象是秋明人！”

“秋明！”冯·奥尔特笑道，“你知道秋明在什么地方吗？”

“好象是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地方。”

“不，在乌拉尔山脚下，甚至可以说在乌拉尔山那边，你瞧，我还是了解俄国的！”

“出于好奇？”

“不如说是职业的责任感。”

“你说你是在俄国出生的人，这也是职业的责任感吗？”

“你相当机灵。但是，我们谈的是库尔斯克……你注意，齐贝特，说真的，我不是理论家，但在政治方面还不糊涂。我告诉你：假如元首能找到正确的方法对待俄国的话，这个国家也许早就被肃清，而我们也就能在这里快快活活地生活了。”

冯·奥尔特慢慢饮完杯子里的酒，又倒了一杯，继续说道：

“什么叫找到对待俄国人的正确的方法呢？这就是，应该了解其民族的性格。你审讯过俄国人吗？如果审讯过，你是否发现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从不请求宽恕！”

“是的，我注意到了这一点，”齐贝特说。

“我们接着说，”冯·奥尔特情绪激昂，继续说道，“这个民族不是那种可以与之和平相处的民族。你还记得我曾经给你讲过的那个贴传单的老头吗？他始终没有供出任何人，拷问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讲，而走向绞刑架的时候，他高呼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对待这样的民族采取什么办法呢？我们这里喜欢采取的办法是绞死一百人，而把一万人赶去做工，并且向他们散发戈培尔和罗森堡的传单。但是，请你不要见怪，所有这些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们都是吃闲饭的。那些被抓的人加在一起顶不上一个普通的破坏者。我们既不需要传单，也不需要这种劳动力。”

“但是，这种劳动力可是免费的啊！”齐贝特插话道。

“怎么能不要呢？”

“这就是你们的不幸，普鲁士的地主先生！”冯·奥尔特激愤地说，“你们唯利是图，追求暴利，你们需要廉价的

劳动力——正是这一点把我们给害了。对，一点不错，假如不谋求利益，而坚决果断地把整个民族消灭掉，使这个国家成为我所用的真空，那么，一定奏效！”

“你，这是说，主张把俄罗斯人全消灭掉？”

“对于我来说，他们是什么人种倒无所谓，俄罗斯人也好，乌克兰人也好，法兰西人也好——我们应该从他们手中把欧洲解放出来……为了自己。”

“这不完全是你的独创，行政长官科赫也这样认为。”

“这当然。他完全正确。”

这时，一个歌女穿过整个大厅，面向冯·奥尔特宣布说，她应顾客要求而演唱。她身材高大肥胖，已经不年轻。她浓妆艳抹，脸上涂了厚厚一层香粉，看去好象是一块粗麻布，两道刚描过的黑眉，涂得红红的嘴唇。只有一双淡灰色的眼睛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大厅里的军官们又是欢笑、又是拍手、又是高谈阔论。歌女终于唱起了一首名叫《上尉之梦》的歌，这首歌和有名的《我梦见了你》相比并不逊色，颇受听众的欢迎。

这首歌的大意是，上尉梦见了自己女友那纤嫩的嘴唇，梦见他们在俾士麦大街上舒适的房间和基辅城下的大片土地，那是上尉为自己的心上人争夺来的土地。

“我担心，基辅——这已经成为过去，”听到这里，冯·奥尔特指出。“战斗已在别拉雅采尔科夫打响了，而明天……不过，谁能料到，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喂，我说保利，你有钱吗？……”

“你正在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奥尔特！”齐贝特说着把一叠五百马克的钞票放到了桌子上。

“不，”冯·奥尔特数着钱深沉地说，“我不应该认

为，我们可能输掉这场战争。俄国人会绞死我的。不过，我愿意投向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凭着我的专业知识是不会无路可走的，了解俄国的人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

“而你认为你是俄国问题的专家？”

“嗯，不错。”

“借助于皮鞭和棍棒来了解人民的灵魂？”

“为什么非要这样？我曾在莫斯科呆过，”冯·奥尔特把钱放进衣袋，泰然自若地说。

“在莫斯科？”

“你奇怪什么？我曾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多。”

“想必这很有意思！”

“还是不要这样讲！我在那里好象生活在沙漠之中。”

“那里没有自己人吗？”

“这是原因之一。第二，在沙漠你是走在赤热的沙土上。”

“你是想说，在那里你碰了钉子？”齐贝特端起酒杯问道。

“是这样，你差不多说对了。真是奇怪的民族，只要你稍微有点可疑的东西，你遇到的哪怕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淘气包也会把你拉到警察局里去。”

“所以你大概在莫斯科干得不大顺利吧？”

“是的，在那里我不走运。”

“不要灰心，奥尔特。不过，对你们的活动，我不知为什么总不怎么佩服。你们吃得酒足饭饱，穿得象是去参加舞会，拿的工钱象部长一样多，而且留在后方。可实际上，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捕捉年轻无知的共青团员，抽打农民，强奸少女。而我们在前线随时都在玩命，但是什么荣誉都没

有。”

“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们，齐贝特。一个人如果他的大脑和心脏停止了工作，这个人就要死亡，而我们就是德国的头脑和心脏。”

这时，有一个人向他们这边走过来。他中等身材，秃顶，身穿蓝色军便服，衣襟露在裤子外边。他慢慢走过来，提心吊胆地望着这两位军官，不敢走近，但同时似乎又想说些什么。

“怎么，是瑙緬科？”冯·奥尔特用俄语问道。“你到这里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看到了您，就走过来向您致意，”瑙緬科咧着个大嘴，陪笑道。

“你真有礼貌，”冯·奥尔特说。“没事？那好，你走吧……”

瑙緬科若无其事地鞠了躬，走开了。

“你想象不出他是什么人吧？”冯·奥尔特问道，“他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本地的盟友。应该为俄国人说句公道话：如果他们之间有变节者的话，那么，这一定是个不能与之为伍的窝囊废。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喜欢同这种人打交道。你知道他为什么走过来吗？”

“当然知道，他要的是钱。”

“我们是付给他酬金的，齐贝特。这个人干的事实在太少了。人到了游击队，在那里呆了一两个月，跑回来了，这就是他的全部功劳。现在他死气白赖地要求同我一起去，要求预先付款，这个下流坯！带上他，还是怎么的？”

“你说，你不喜欢同这类人打交道！”

“一般说来是这样，但是这次情况特殊……在我们将去

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这个废物可能还有点用。”

齐贝特总是坚持自己对什么事也不打听的习惯。而且，对方也赞赏他这种谦虚的态度。

“喂，保利，”冯·奥尔特突然提议道，“你同我一起去怎么样？噢，这是个好主意！我向上帝发誓，我们在那里一定不会感到寂寞的！”

“我将会是一名不称职的侦察员，”库兹涅佐夫含糊其辞地说。

“呵，我会教你成为一名出色的侦察员！”

“但是，作为一个好的侦察员需要掌握某些专门知识，要有能力……”

“这些你都有。你向往美好的生活，向往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欢乐。如果元首让你发大财，你将说什么呢？说看看？你可以想象，例如说，元首把沃林城送给你，或者再好一点儿，把地中海沿岸一个地方的土地和果园赠给你，送给你种种礼物，你对此愿说些什么？”

“我就问：我应该为此而干些什么呢？”

“不多，一点也不多，只让你冒一次生命危险。”

“仅此而已吗？”库兹涅佐夫笑道，“你在开玩笑，奥尔特。我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冒生命危险我不止一次，但是除了胸前的授带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得到。”

“问题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去冒险。今天元首需要我们的帮助……是的，保利，今天到了我们应该帮助元首的时候了。当然，这时我们也不应忘记我们自己……”

保利静静地听着。

于是，冯·奥尔特终于告诉他，他要准备去什么地方。他要去前线一个最有决定意义的地段。这时，保利第一次提

出了问题：

“它在哪儿，这个决定性的地段？在莫斯科吗？或者可能空投到秋明？见它的鬼去吧，无论它在哪儿，对我横竖都一样！”

“你将因此获得第二枚铁十字勋章。不，我亲爱的中尉，决定性的地段不在你猜想的地方，而且用不着空投，而是舒舒服服地去，坐高级轿车，还要特别记住：要习惯于穿便服。”

“我不懂，你让我猜谜语，奥尔特！”库兹涅佐夫的话里充满着讥讽。“请问，你的这个‘决定性’的地段究竟在何处呢？”

“在德黑兰，”冯·奥尔特笑着答道。

“德黑兰？这可是在伊朗啊，一个中立的国家！”

“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于十一月份正好在那里开会……”冯·奥尔特于是告诉库兹涅佐夫，他前不久曾到过柏林，受到米勒将军的接见，接受了一项相当有诱惑力的使命，其意图齐贝特大概能够猜得到。不过，奥尔特也可能直接告诉他：准备消灭三巨头，並物色参与这一行动的专门人选。如果齐贝特提出想参加，冯·奥尔特会为他游说的。有一所学校设在哥本哈根，专门训练去德黑兰的恐怖分子。这一点当然是不应该随便议论的。“现在你总明白了，元首将会怎么慷慨地嘉奖我们了吧？”

“我懂了，”齐贝特点了点头说，“但是，你有把握让我去吗？”

“这是什么话？你首先应了解一下，在整个行动中谁是主角。”

齐贝特没有吭声。

“是我！”冯·奥尔特兴奋地说，并且笑起来，为自己突然亮出这张牌而感到得意。

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

当天夜里，库兹涅佐夫就找到了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

“你的车准备妥当了吗？”

库兹涅佐夫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急着要去支队。如果可能的话，他恨不得一分钟也不耽搁，立刻就走。然而不行，他还有一件事要办。这件事不能往后拖延，事情虽然令人不愉快，但是必须去办，这就是去同吉捷尔少校见面。

在去莉季娅·利索夫斯卡娅家参加晚会之前（吉捷尔也要出席的），他到了瓦莉娅家。同她见面——这是使他能稍微冲淡一下因为呆在市里感到苦闷的唯一办法。

他发现她忧心重重。

瓦莉娅获悉，特别部队的司令冯·伊尔根将军对他最亲近的同僚吹牛说，在短时间内，罗夫诺地区将变得没有一个游击队员。伊尔根说，他调来了专门的讨伐队，由法西斯匪徒称之为“杀人专家”的皮佩尔将军亲自指挥。伊尔根宣称，在游击队的队长未抓到他的集中营受审之前，他决不会善罢甘休。

……在莉季娅·利索夫斯卡娅的晚会上，吉捷尔感到惊异的是，除了莉季娅、迈娅和齐贝特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人了。齐贝特早已在等着吉捷尔少校，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他为能有机会同少校认识感到荣幸。齐贝特不是一个人来的，他的勤务兵也来了。不知为什么他要把勤务兵带来出席晚会。

晚会持续的时间不长，吉捷尔就被捆了起来，嘴里塞着

破布，从后门拖到了院子里，那里早已停着一辆汽车。勤务兵坐到了方向盘后面，汽车驶过几条街和哨卡，就开到了公路上，又沿公路向前开了几公里，便拐进了森林。

库兹涅佐夫回到支队后给我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打算打死冯·奥尔特。

“他极力控制自己才没有在咖啡厅当场把他打死。”

“你能控制住自己，这样做就对了，”我说。“应该全面考虑要不要干掉奥尔特。”

“支队长同志，”库兹涅佐夫声音颤抖，压低嗓子坚持道，“这个盖世太保的坏蛋妄图谋害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您怎么能阻止我！”

“您刚才说过，奥尔特领导着赴德黑兰的整个恐怖分子小组，而您了解这个组织吗？不了解。在罗夫诺这里您能够干掉的仅仅是一个奥尔特，可那些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人自然会去德黑兰。奥尔特不应该被打死，而应该生擒，并且悄悄地把他们弄出城市。在这里我们要设法从他嘴里了解到，都是些什么样的喽罗在准备德黑兰之行，他们有什么特征，如果可能，还要了解到他们在德黑兰的住址……明白了？”

“我明白了。”

“您坐下，先把奥尔特本人的详细特征写出来。您所讲的一切以及他的种种特征，我们今天就报告给莫斯科。”

库兹涅佐夫取了纸，推敲着每一句话，仔细地描绘了自己“朋友”的特征，使其形象更加完整、逼真，读后令人感到奥尔特活脱脱地站在眼前。

“您想想，”写完之后，库兹涅佐夫说，“这个老奸巨滑的间谍战前已经妄图在莫斯科活动了！”

“在莫斯科？似乎有点象，应该认为，他在那里并不顺利。”

“那是当然的啦！他说，他那时好象是走在滚烫滚烫的沙土上。他们不懂得，在苏联，全体人民都是侦察兵！”

库兹涅佐夫返回支队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已经向莫斯科拍发了一份电报，转发了库兹涅佐夫的详细报告，描绘了冯·奥尔特的相貌特征。

对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同库兹涅佐夫的意见完全一致。

“支队长同志，请您允许我，”我们发报之后，库兹涅佐夫说，“不让冯·伊尔根将军等着皮佩尔这个‘杀人专家’带着他的讨伐队来到罗夫诺市。这事已迫在眉睫！我能够让伊尔根现在，一分钟也不拖延地同您在我们的营地举行对话。”

于是，我们立刻着手制定劫持冯·伊尔根的计划。在进行这个困难而复杂的任务中，除了库兹涅佐夫和科利亚·斯特鲁京斯基之外，瓦莉娅·多夫格尔，扬·卡明斯基和小科利亚等也发挥的重要作用。

(十五)

在磨坊大街，德军驻乌克兰特别部队司令冯·伊尔根将军的办公楼门口，总有哨兵在站岗。一天，天刚亮，一个小家伙就在这幢房子附近晃来晃去。他穿着短裤，嘴里吹着口琴，几次走到哨兵跟前。

“你在那里干什么？”

“吹着玩玩，没干什么。”

“走开！这是将军办公的地方，快走开！如果让我抓

住，没你的好！”

小家伙走开去，但不一会又钻出来了。

这时，瓦莉娅手里拿着文件夹走近了大楼。

“您好！将军先生还没有来吗？”她问哨兵道。

“还没有。”

“那么，谁在那儿呢？”瓦莉娅指了指大楼问。

“勤务兵。”

“我进去等等将军，这里有帝国专署给他的紧急文件。”

最近一个时期，瓦莉娅不止一次地给将军送文件，哨兵们也都认识了她。

迎接她的是“哥萨克”勤务兵，他跟伊尔根才只有几天的时间。

瓦莉娅了解这一点，但故意摆出一付惊奇的面孔问道：

“老勤务兵在哪儿呢？”

“早已到柏林了，”“哥萨克”回答。

“他去那儿干什么？”

“运送战利品去了，请小姐进去等着吧。”

“不，我不等他了。我还有别的急件要送，返回的路上我再来。将军快到了吧？”

“应该快到了。”

瓦莉娅走了出来。她对哨兵说，过一会儿再来，就离去了。过了拐角，她见到了在那儿等着她的那个小家伙。

“科利亚，快跑去报告，一切正常。”

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

战线日益迫近。冯·伊尔根将军真地关心起他在乌克兰

“搜集”的宝物来了。他担心这些宝物将会回到它们的合法主人的手里，于是决定把它们送回柏林。

这些宝物足足装了二十个手提箱。所以，为了运送它们，不得不组织一个运输队，运输队由将军的副官——一名少尉——亲自带队。副官带一名勤务兵及另外四名士兵出发了。他们都是经常在将军身边，做过警卫的人。这些个“纯阿里安人”走后，将军只得临时让一些“哥萨克人”来服侍自己。

“哥萨克”是希特勒匪徒对那些表示愿意为他们服务的苏联战俘的称呼。他们之中有些人是为了活命而丧失了良心和人格的胆小鬼。然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有良心的。他们常为背叛祖国而感到耻辱。他们想对希特勒匪徒进行报复以雪耻，同时寻找机会立功赎罪。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从法西斯匪徒那里得到的武器，跑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

冯·伊尔根暂时放在身边的就是这种“哥萨克人”。其中一人做了他的勤务兵，和他住在一起。剩下的人均来自兵营，轮流值勤，负责他办公楼的警卫。

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已了如指掌。

小科利亚拼命往回跑。在秘密接头点等着他的是库兹涅佐夫、斯特鲁京斯基、卡明斯基和格涅久克，他们穿的都是德军军服。

“瓦莉娅说，可以去了，一切正常，”科利亚急冲冲地说。

“你立即去‘了望站’。今天留在城里很危险。你先跑吧，我们能赶上你。”库兹涅佐夫说。

“我这就走！再见了！”

几分钟之后，库兹涅佐夫和他的同志们已经到了冯·伊

尔根的办公大楼。库兹涅佐夫身穿上尉军服（他已晋升一级），首先跳下汽车，径直向大楼走去。

哨兵看见来的是德军军官，就边打敬礼边说道：

“上尉先生，将军还没有到。”

“我知道了！”库兹涅佐夫用德语说了一句就进去了。

斯特鲁京斯基也随他走了进去。

“我是苏联游击队，”库兹涅佐夫直截了当地告诉勤务兵，“想活命就帮助我们。如若不然的话，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勤务兵顿时惊呆了：德军军官竟说他是游击队！勤务兵吓得嘴唇直哆嗦，吞吞吐吐地说：

“我听您的吩咐，我们都是被强迫来的，不得已才干这个……”

“你自己看着办吧！”

垂头丧气的勤务兵还不相信德军军官竟是游击队，木然地站在那儿。

“你叫什么名字？”库兹涅佐夫问道。

“库兹科。”

“你坐下来写。”

按照库兹涅佐夫的口授，勤务兵写道：“承蒙你们给我一日三餐，谢谢。我要去游击队，我把将军带走了。哥萨克库兹科。”

他们把这张便条放在伊尔根将军办公室写字台上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

“现在趁主人不在，我们干我们的事情，”库兹涅佐夫对斯特鲁京斯基说。

库兹涅佐夫和斯特鲁京斯基在房间里进行了认真搜查，

取出了文件和武器，把它们捆了起来。

斯特鲁京斯基同勤务兵一起留下了，而库兹涅佐夫折回到哨兵那儿。格涅久克早已站在哨兵旁。库兹涅佐夫快步走上前去的时候听到：

“你瞧你！”格涅久克重复道，“本是哥萨克人，却当了德国佬！”

“趁你还活着，快跑吧！”哨兵拿不定主意地回答道，“你怎么能说我是德国佬！”

“既然不是，那就帮助游击队好了！”

“怎么样，商量妥了？”从后面走近的库兹涅佐夫问道。

哨兵立即睁大了眼睛，向他转过身来。

“跟我来！”库兹涅佐夫命令哨兵道。

“军官先生，我不应该进楼去。”

“应该不应该，这无关紧要。喂，把你的枪给我，”就这样库兹涅佐夫解除了哨兵的武装。

哨兵跟着库兹涅佐夫，慢慢地上了楼。

科利亚·格涅久克充当哨兵站岗。卡明斯基也跳下汽车，在大楼附近走来走去。

这一切发生在黄昏时分。当时，天还相当亮，大街上不时地有行人通过。

五分钟之后，斯特鲁京斯基从楼上下来时，已经换上哨兵的服装，手端着步枪。他站在哨兵的位置上，格涅久克向大楼走去。

一切都安排好了，而冯·伊尔根还没有来。过了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以至四十分钟，将军仍然没有来。

“哥萨克”哨兵从恐惧中清醒过来，他突然对库兹涅佐

夫说：

“可能会有麻烦，很快就该换岗了。请让我再去站岗吧。我既然决定同你们站在一起，就会帮助你们的。”

“你不搞鬼？”

“我给您讲的是真心话！”“哥萨克”回答说。

格涅久克只好把斯特鲁京斯基叫上来，重新换过衣服。哨兵向他原来的岗位走去，由卡明斯基监视着他的行动。

这时，传来汽车驶近的隆隆声，是冯·伊尔根回来了。

“好壮实的家伙，一个人对付不了他，我去帮一把，”斯特鲁京斯基看到下了汽车的将军，这样说。

冯·伊尔根刚走进楼来，脱了外衣，库兹涅佐夫就从勤务兵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我是苏联游击队，如果您表现出明智的话，您就安全无恙，几个小时之后，您可以同我们支队长在支队营地进行对话。”

“叛徒！”冯·伊尔根吼道，一边伸手去抓手枪。

但是，库兹涅佐夫和赶上来的斯特鲁京斯基立刻抓住了将军的双手。

“我们的身份已经向您明说了。您到处搜寻游击队，现在您看见了，他们就站在您的面前！”

“叛徒！……”伊尔根又吼道，同时挣扎起来。

四十二岁的将军，身强力壮。他扭动着身体，拼命挣扎，摔倒在地还咬人，侦察员只好手脚并用了。他们用手帕塞住他的嘴，把他捆了起来，拖向汽车。但是，正当推他上车的工夫，手帕从他嘴里掉了出来。

“叛徒！”冯·伊尔根又吼道。

哨兵跑过来说：

“有人来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决不能让人靠近，他们会发现将军裤腿上的红色镶条。“如果来的是希特勒分子，那并不坏，”库兹涅佐夫想道，“可以把他们击毙，而如果是市民怎么办？怎么对待他们？不能打死他们！但又不能留下他们。将他们带走？汽车已经超载了。”

他心里盘算着，向来人迎了过去。

来的是四个法西斯军官。他们很可能不和他搭腔。

这时，库兹涅佐夫想起他有盖世太保的徽章，在此前他一次也没有使用过。他的手伸进口袋，猛地掏出那枚金属徽章。

“我们抓到一名穿着德军军服的暴徒。请出示你们的证件！”他对法西斯军官们说。

对库兹涅佐夫来说，重要的是赢得时间。他摆出一副对这些军官身份特别感兴趣的样子，长时间地检查他们的证件。他把三个军官的证件还给了他们，而第四个他说他要同他一起去盖世太保。这个人原来是行政长官科赫的私人司机。

“请格拉瑙先生，”库兹涅佐夫说，“作为见证人跟我走一趟，而你们各位先生，”他对其余的军官说：“可以走了。”

已经坐上五个人的“奥佩尔”汽车，又增加了两个，一共坐了七个人。

库兹涅佐夫、斯特鲁京斯基和卡明斯基他们把伊尔根和格拉瑙放在“绿色了望站”之后，就立即返回市内去了。

就在回去的当天晚上，库兹涅佐夫偶然碰到了马克斯·亚斯科韦茨，他告诉说，据传冯·奥尔特好象被打死了。

“噢，我的天！”库兹涅佐夫叹道。“怎么发生这件事？”

他人那么健壮、结实，活泼开朗……我真为他感到惋惜。”

“我也不明白，”亚斯科韦茨迷惑不解地说。“听说，事出偶然……他当时正在擦枪。”

“真不走运啊！”库兹涅佐夫继续表示惋惜道。“我顺便问一句，什么时候举行他的葬礼？”

“这一点还没听说，”亚斯科韦茨答道。不过他当即请齐贝特给他五十马克买花圈，他准备送给自己的朋友。

库兹涅佐夫觉得冯·奥尔特的自杀是可疑的。他不相信这一点还因为，这个坏蛋的死完全破坏了支队指挥部的计划。

自从受领了要劫持冯·奥尔特的任务之后，几天来，库兹涅佐夫一直没有见过他。不过，他仍在罗夫诺市。这一点库兹涅佐夫是从瓦莉娅那儿知道的：她曾好几次见到过奥尔特。所以库兹涅佐夫原相信今明两天他定能完成任务。

“行将举行的三巨头德黑兰会晤谁也不晓得，”库兹涅佐夫想道，“也可能这完全是这个盖世太保分子的杜撰，以便从我身上再获得一百马克……”继后他立刻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如果德黑兰会晤是真的，又怎么办呢？如何能了解到，哪个恐怖分子将前往德黑兰呢？……”

库兹涅佐夫决定到瓦莉娅那儿去一趟，再从她那儿到莉季娅·利索夫斯卡娅家。“她们也许了解某些详细情况，”他这样寻思。

瓦莉娅说，她也是从马克斯·亚斯科韦茨那儿听说冯·奥尔特自杀消息的，而在帝国专署里此事一点都没听说。消息没有得到证实，这一点愈加使库兹涅佐夫感到忐忑不安。他又赶到了莉季娅那儿。这回所听到情况证实了他自己的猜测。

“三天以前奥尔特到过我这儿，”莉季娅说，“是来向我告别的。他打算飞离罗夫诺市去某个地方。他离开的事，不让我告诉任何人。他说，如果人们传我不在了，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您不必辟谣。他答应我带贵重礼物来。当我听到关于他自杀的消息，我就觉得这里一定有鬼。明明是奥尔特出差了，而盖世太保却偏偏放风说他自杀了。我想立即把一切都告诉您，而您却象故意躲着似的，一直没露面。”

夜里，小科利亚离开罗夫诺市，受命前往支队。尽管夜色茫茫，漆黑一片，他简直不是在走，而是一路小跑。他带着库兹涅佐夫给支队的紧急信件。在这封信中，报告了冯·奥尔特“神秘”失踪的情况。他写道，他未能及时劫回奥尔特，给了他从市内溜掉的机会，他因此而不能原谅自己。

(十六)

阿尔弗雷德·冯克素有“党卫军元首”之称。在赴乌克兰任职以前，他曾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区“首席法官”，残酷镇压和迫害捷克爱国者。在这里，在乌克兰，冯克更加不遗余力地继续他那罪恶的活动。根据他的命令，一个又一个人质被枪杀，监狱和集中营里实行了野蛮镇压，数千名无辜的人惨遭杀害。

格尔和克努特被暗杀和唯一的副帝国全权代表达格尔受伤之后，冯克就发出了将罗夫诺监狱里所有被关押的人统统杀死的命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处死这个刽子手。

惩罚行动定于劫走伊尔根的第二天。应在希特勒分子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下手。瓦莉娅·多夫格尔和扬·卡明斯基，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和捷连基·诺瓦克及其伙

伴们一起精心准备了这次由库兹涅佐夫提议的新行动。

阿尔弗雷德·冯克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上午开始工作之前十分钟，要在最高法院旁边的理发馆刮刮脸。理发师，一个当地的居民，却是一名忠诚的苏联爱国者。扬·卡明斯基请他帮助游击队员，他满口答应。他们商定，只要将军一走进理发馆，理发师就将窗前的小窗帘拉开些。这是给卡明斯基的暗号，然后再由他给库兹涅佐夫发暗号。

就在那天上午全城都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当希特勒匪徒到处搜寻劫走伊尔根的游击队员，跑得疲惫不堪时，库兹涅佐夫到了最高法院二楼党卫军元首冯克的会客室。他伸展四肢，坐在靠背椅子里。

他到达这里的时间正是首席法官坐在理发馆的椅子上修面的时间。只有女秘书在会客室里。库兹涅佐夫就同她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一边不时地望望窗外。从窗口他可以看到，扬·卡明斯基正在街上来回溜达。

卡明斯基其实却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理发馆的窗帘，窗帘刚一拉开一条缝他就给库兹涅佐夫发了一个暗号。“他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如果恰恰在这时库兹涅佐夫没望窗外……”想到这里，卡明斯基决定不顾个人安危，采取冒险行动来“延长”发暗号的时间：他摘下帽子，认真地梳起头来。这个动作他做得如此明显长久，使库兹涅佐夫感到不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呢？冯克不来了吗？但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扬·卡明斯基也就不会给任何信号了。“噢——”库兹涅佐夫猜测着，“冯克是来了，但大概不刮脸就径直上楼了。”

在和女秘书轻松地聊天的时候，库兹涅佐夫同她约定了下次幽会的时间。他还对她说，他渴了，请她给弄点水

喝。姑娘很乐意地拿起杯子跑了下去。水在楼下，库兹涅佐夫预先已经了解到了这一点。

当女秘书回来的时候，上尉已经不在房间了。正在这时，冯克将军从她旁边经过，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冯克脱下风雨衣，挂起帽子，走近写字台，刚要挪动一下椅子，突然听得背后有人说：

“别忙，将军，你不必坐在这了。”

冯克正要转身，上尉已经靠近了他，说道：“你这个坏蛋，为了无辜人们的鲜血和眼泪，你尝尝我的子弹吧，”说完就对着他连开了两枪。

剑子手倒下了。库兹涅佐夫冲到写字台旁，一把抓住放在那里的文件，旋即出了办公室。他从吓呆的女秘书的旁边走过，急速跑下楼梯。

大门入口旁停着两辆满载讨伐队员的卡车。看样子，汽车刚到不久。希特勒匪徒惊异地看着传出枪声的二楼的窗户。

库兹涅佐夫停下脚步，和讨伐队员一样地朝最高法院的那扇窗户看了一眼，然后泰然自若地走开了。当盖世太保吵嚷嚷地跳下汽车，急忙冲进大楼的时候，库兹涅佐夫已经拐过弯，走到了院子里，他翻过围墙，便到了一个小巷子，汽车正在那里等着他。

“科利亚，快开！”库兹涅佐夫跳上汽车，一边关门一边向斯特鲁京斯基喊道。

扬·卡明斯基违反了给他下达的命令，给库兹涅佐夫发出暗号之后没有立即离开。他留在街上并且看到，库兹涅佐夫从法院大楼里出来了，接着整个街区便被盖世太保和宪兵队封锁。把大楼团团包围之后，法西斯匪徒爬到楼顶和阁楼搜

捕游击队。后来终于从法院大楼里带出大约二十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几名军官，他们立即被带往盖世太保。

而库兹涅佐夫和斯特鲁京斯基已经开车走出城市很远了。

第三部 向西挺进

(一)

在罗夫诺市的库兹涅佐夫、舍夫丘克、斯特鲁京斯基、诺瓦克和在兹多耳布诺夫的克拉斯诺戈洛韦茨等同志的任务非常繁重。他们不但要侦察，而且还被委以如下任务，即：想尽一切办法在敌人队伍中制造和散布惊慌的情绪，干扰敌人防御；不让敌人在撤退时带走在我国国土上抢去的珍贵物品。为了协助罗夫诺的同志，不久前我们又派出了几个行动小分队。

“塔斯社斯德哥尔摩12月17日电，德国法西斯报纸《明斯克报》报道，日内，希特勒法西斯在罗夫诺的头目之一——党卫军头目阿尔弗雷德·冯克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击毙。”

12月19日的《真理报》有条消息说：

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

“塔斯社伦敦12月17日电，据路透社驻华盛顿记者报道，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在德黑兰，他住在俄国使馆，而没住美国使馆，因为斯大林已经得知德国人的阴谋。罗斯福总统补充说，斯大林元帅通知我们，可能有人在密谋策划危害会议所有参加者的生命，他请求罗斯福总统住在苏联使馆，以免在城里往返而遭到危险。邱吉尔首相住在

和苏联使馆邻近的不列颠使馆。罗斯福总统声称，在德黑兰周围可能有一百个德国特务。总统补充说，假如德国人趁斯大林元帅、邱吉尔首相和我乘车行驶在德黑兰的大街上时对我们下毒手的话，那他们可就占了大便宜。

苏联使馆和美国使馆大约相距1.5公里……”

读了这条新闻，库兹涅佐夫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的确，他有权引以为自豪。他是粉碎希特勒法西斯匪徒罪恶计划的参加者之一。毫无疑问，报道中提到的那些希特勒法西斯间谍——其中当然包括冯·奥尔特（在间谍中他并非最末一位）——已被及时发现并使之无法施害于人。

“祝贺您，库兹涅佐夫！”

“啊，可能，此事与我完全无关，”库兹涅佐夫答道。

“要知道，这件事应该说是几十个人的功劳……其实……”他狡诈地眯缝着眼，若有所思地说道，“其实，我嘛，也许是其中之一。令人高兴的也莫过于知道，自己的工作起了作用。”

斯捷霍夫向游击队员宣读了这天政治要闻栏中关于希特勒在德黑兰的阴谋破产的消息。当然，库兹涅佐夫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提及的。

12月中旬，乌克兰帝国专署全权代表埃里希·科赫发出了一项关于德国机关开始撤退的命令。此后不久，这个全权代表本人就根据自己命令的精神，悄悄离开了所谓的“首府”罗夫诺，溜回了柏林。

科赫的命令显然发迟了。在他发布该命令之前，整个罗夫诺的法西斯匪徒就已经普遍开始逃跑了。用这个帝国全权代表的话说这是法西斯占领者的“行政官员和军官的全面撤

退。”在这些日子里，只见那些穿着随便的“征服者”先生女士们拖着装满了抢劫来的东西的包裹、皮箱，在大街上慌慌张张地走着，所有这些都奔向一个目标——火车站。在候车大楼入口处，哨兵根本无力阻挡那些已失去组织指挥的人群的冲撞。因为这些家伙由于惊恐早已失去理智，一个劲地只顾逃命。

“我的德国鸢飞走了，”库兹涅佐夫在给支队的信中写道，鸢显然暗指埃里希·科赫。“前线的战事和我们在市内制造的骚乱把这个凶残的法西斯强盗吓坏了。他没等到12月25日圣诞节那一天，就在12月22日举行了圣诞晚会的第二天匆匆溜走了。现寄上一张载有这个晚会情况综合报道的报纸，请你们注意我加了黑线的地方。”

“行政长官说，”综合报道写道，“正象随着耶稣的诞生光明的白天变得比黑暗的夜晚长了，于是光明战胜了黑暗一样，伟大的德意志必将在这场战争中战胜布尔什维克的黑暗。”

“这个‘战胜者’临到逃跑之前还在胡说八道。你们可以看出，这纯属自相矛盾的胡诌。”库兹涅佐夫继续写道，“他没有想到，希特勒德国进攻我们是在6月22日，而这一天恰恰是夜晚在变长，因此这就意味着，这场战争是黑暗对光明的挑战……我不能饶恕自己，我未能赶上参加这个晚会。我似乎觉得，科赫可能再也不会回罗夫诺来了。不知今后还有没有可能抓住他，让他为自己的暴行受到惩罚……”

库兹涅佐夫随信还寄来了一批重要的情报资料，这些资料是他们到罗夫诺以后不久搜集的，其中有：敌人从东向西调遣部队的情况、敌司令部迁移情况、敌“首府”罗夫诺陷入恐慌和骚乱的情况以及法西斯匪徒在市内一些大建筑物里

敷设地雷等情况。

同时，库兹涅佐夫还写道，罗夫诺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一大批纳粹特务和宪兵从东方，从被红军解放了的土地上陆续来到罗夫诺。这里每天都在逮捕人。往常枪毙人质的别拉雅大街，现在每天晚上都在通宵达旦地屠杀苏联人。经常是带篷卡车装着满满一车一车的尸体，不断地往城外运。

被逮捕的人中有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卡济米尔·东布罗夫斯基。

“看来，纳粹特务对我们已经有所察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金最后报告了这次大逮捕的情况。

他的推断很快被证实了。

伊万·伊万诺维奇·卢茨在街上被捕了。当时他知道有人跟踪他，其实他完全可以离开罗夫诺回支队，可他没有这样做。一时的疏忽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卢茨被捕以后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盖世太保逮捕了玛鲁霞·扎尔斯卡娅——一位勇敢的苏联姑娘、共青团员、真正的爱国者。

几乎在玛鲁霞被捕的同时，尼古拉·波采卢耶夫也被捕了。他的邻居——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出卖了他。盖世太保匪徒突然包围了他的住所。开始他奋力还击，后来受了重伤，在昏迷状态中被送进了罗夫诺监狱。

科利亚·斯特鲁京斯基也曾有过生命危险。尽管他随时保持着警惕性，严格按秘密工作要求行事，但还是被敌人盯上了

一天，斯特鲁京斯基来到一个秘密接头地点。过了一刻钟，他听见窗子外面停下一辆汽车，紧接着传来了“砰，砰，砰”的敲门声。

“快到另一个房间去！”房东对他说。斯特鲁京斯基却藏到了门后面。

“他在哪儿？”闯进来的盖世太保人员挥舞着手枪，大声喝道。

“谁？”

“别装蒜了！”一个纳粹特务举起手枪对着房东吼道。

就在这一刹那，门后闪出了斯特鲁京斯基，两梭子弹就把这些不速之客撩到在地。

于是斯特鲁京斯基和房东跳上了楼梯，在二楼楼梯口，他们看见一辆卡车停在房子旁边，卡车上满载着宪兵。

“见鬼去吧，法西斯混蛋们！”斯特鲁京斯基怒吼一声，举枪向他们猛烈射击。

那车上的宪兵乱成一窝蜂，你推我撞，争相逃命，拼命往下跳。就在这个时候，斯特鲁京斯基和房东悄悄跑掉了。

当时，罗夫诺的形势日益恶化，我们的同志呆在那里的处境也愈加危险。

罗夫诺的同志们知道，他们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回支队，但他们谁也不愿这样做。

“现在我们的岗位就在罗夫诺！”捷连季·费奥多罗维奇·诺瓦克说。他离开支队来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

应该好好地对这些占领者“送送行”。

过去，希特勒匪徒们吹嘘他们的军队不可战胜，扬言要在他们占领的地方永远呆下去。而现在他们不得不狼狈逃窜。赶快逃命——这不仅是罗夫诺市的所有德国人的唯一心理，而且也是那些占领者的走狗们——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匪徒的欲望。

由于逃命的人太多，雇一辆到利沃夫的车车费竟高达一万五千马克。尽管车费如此昂贵，要找到一辆车也还是很困难。

诺瓦克和斯特鲁京斯基在很多单位的汽车库都安插有自己人，他们给那些人布置了任务：要采取一切手段给汽车制造故障。那些给法西斯分子开车的司机往往是些苏联战俘，他们很乐意接受地下工作者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去干一些“破坏性”的事情，如：将沙子撒进汽油里，搞坏车上发动机，捣毁车上电器设备，偷走汽车钥匙，有时干脆把汽车烧掉，或者在通往车库的通道上埋上地雷。

能够比较安全地离开罗夫诺的道路只剩下一条铁路了。宪兵封锁了火车站，并开始整顿秩序。第一候车室是车站“当局”专为将军们和高级军官们开设的。在这里，一些吓破了胆的夫人太太们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坐在那里候车。第二、第三候车室则挤满了一堆一堆的职位不高的人，他们也带着一大箱一大箱的东西。进候车大楼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舍夫丘克和另一名侦察员布德尼克没有这种通行证，然而他们想，无论如何也要混进车站去。他俩抬着一个不太大，但很沉的箱子。

“通行证！”入口处一个宪兵把他们挡住了。

他们被迫走开。

“这样干一点成功的希望也没有，”舍夫丘克一边嘟哝，一边用乌克兰语骂着。“必须寻找个护身符一起进。瞧，那么多军官正步行去车站呢！”

傍晚，舍夫丘克和布德尼克驾着一辆马车往车站走去，布德尼克当车夫。马车走得很慢，因为车站大街被逃跑的德

国人挤得水泄不通。舍夫丘克在马车上仔细观察着，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护身符”。

他终于看见一个德军中校，扛着两只大皮箱，累得汗流夹背，正迈着沉重的步伐，蹒跚而行。后来那中校不得不放下皮箱，摘下军帽，掏出手绢，开始擦那胀得通红的脸上的汗。

“长官！”舍夫丘克恭敬地叫了一声，“请问您是去车站吗？”

“是去车站，”中校答道。

“喂，帮帮忙吧！”舍夫丘克向“马车夫”叫了一声。

那“车夫”跳下车，把两只皮箱放上马车，又殷勤地把那位军官扶上了车，然后策马前行。

“谢谢，谢谢！”中校轻松地吸了一口气，喃喃说道，不停地擦脸上的汗。

马车刚一驶近车站，舍夫丘克和布德尼克没等那位“乘客”明白过来，就把他的皮箱提了起来，同时也提起了自己的箱子。

“请您放心，长官，我们帮助您。”

“通行证！”宪兵要求出示证件。

“和我一起的，和我一起的！”中校推开了宪兵。

舍夫丘克和布德尼克走进了第一候车室，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给中校搁行李的地方。同时又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个搁置他们自己箱子的适当位置。

“再见，长官！”舍夫丘克高兴地说道，“祝你一路平安！”

舍夫丘克和布德尼克很快出了候车楼到了另一所住宅，从那所住宅的窗子能清楚地看到车站。他们坐在窗旁，等待

着箱子里所装的30公斤炸药和地雷的爆炸。这颗地雷是游击队爆破能手里瓦斯巧妙地装置在箱子里的。

深夜两点钟地雷爆炸了。一声巨响，第一候车室墙壁倒塌，天花板陷落，一百余名军官和他们的夫人太太死的死，伤的伤，皮箱等行李物品，破的破，碎的碎。可事情并非就此完结，就在地雷爆炸的时刻，一列军列正驶近车站月台。火车一停下来，车上的法西斯匪徒听见爆炸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拼命往下跳，纷纷抱头逃窜，他们以为遭到了苏联空军袭击。这时，封锁车站的宪兵和盖世太保发现有人逃跑，又以为这是炸车站的苏联人，于是立即向他们开了火。同时又调来了一个连的盖世太保投入了消灭“破坏者”的战斗。双方对射了大约半小时，其结果是以“双方”伤亡惨重而告终。

第二天早晨，城里刚一传出车站爆炸的消息，希特勒匪徒就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这是在市中心敌人虎视眈眈之下发生的又一起爆炸事件。

另一爆炸事件发生在前一天傍晚六点多钟。当时位于“德国”大街的警备司令部大楼一楼的专为德国人开的食品商店柜台前，来了一位带墨镜的顾客。此人相貌堂堂，风度翩翩，稳重端庄，令人敬仰。其外表叫人一看就觉得可信，因此商店的门卫没看证件就让他进去了。这位顾客长时间地观看着精美食品部的货架。从他那严肃的眼神看，他对精美食品很在行。后来，这位顾客请那个年轻、活泼、梳着分头的售货员为他取200克浓味干酪包好。

“是，遵命，”售货员应承道。

“最好是长了蛆的，”苛求的顾客说。

“今天没法提供，”售货员遗憾地说，“明天早点

来吧。”

“你们商店几点开门？”

“九点，先生，九点。”

第二天早晨七点半，售货员刚走出家门，就在门口碰上了昨天那位戴墨镜的顾客。他把一只放有一个纸袋的柳条篮子递给了售货员。之后，他们握了握手就分别了。

那售货员姓季先科。他是通过在警备司令部当职工的战俘科兹洛夫认识舍夫丘克的，季先科自己也是战俘。他常常为被迫给希特勒匪徒干活而苦恼，因而产生了逃跑加入游击队的强烈愿望。

“我帮助你，”早就和舍夫丘克建立了联系的科兹洛夫许诺道，“不过你得用实际行动证明你是我们自己人。”

“给我任务吧，不管什么任务都行！”季先科强烈要求道。

舍夫丘克通过科兹洛夫向他提出，请他帮助他们炸毁警备司令部。季先科欣然答应了。

他们选定了一个季先科须第一个到商店接收货物的日子。那天，他把舍夫丘克给他的那个纸袋放到了货架的最顶层。刚一上班他就离开了，之后，就再也未到商店来。

正午，延发地雷爆炸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撼了警备司令部。接着，楼板起火，墙壁、地板崩塌，大楼里的许多希特勒匪徒被埋在瓦砾之中，死伤者不计其数。

舍夫丘克并未就此而罢休，他还在寻找使用反坦克手榴弹的目标。这种手榴弹与一般的反坦克手榴弹不同，是经发明家里瓦斯“改制”的，里瓦斯给一般的反坦克手榴弹装上了一层有若干粗粗的钉状切口的护罩。

反坦克手榴弹只有一枚，因此舍夫丘克想让它发挥最大

的作用。他每天都在琢磨如何使用这枚手榴弹。有时恨不得把它扔到正在往外搬运东西的帝国专署的大门口，有时又恨不得把它扔到车站广场上的法西斯匪徒窝中。当他走在车站大街上时，想起了一个饭馆，那个饭馆经常有很多法西斯军官在那里吃饭。舍夫丘克早就注意到这个饭馆了。那是傍晚六点左右，不出舍夫丘克所料，饭馆里有许多法西斯匪徒在吃饭。乐队奏出的音乐声直冲街头。舍夫丘克从饭馆旁边走了过去，但走到一个拐角处又很快折了回来，当又快到饭馆旁边的时候，他把手榴弹从窗户扔了进去。顿时只听轰隆一声，手榴弹爆炸了。

舍夫丘克极力克制着自己不回头看，径直走进了邻近的一家大门，上台阶。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出来，随之消失在大街的人群之中。一路上敌人多次检查证件，他都顺利应付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舍夫丘克兴致勃勃地在支队给大家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

就在那天晚上，舍夫丘克碰见了地下工作者谢罗夫。谢罗夫根据舍夫丘克交代的任务，第二天穿上妇女的连衣裙，装扮成女清洁工，来到空军基辛格将军的司令部驻地。

这位将军的使命与前线战事无关。他使用空军与众不同，专把飞机派去对付那些“不顺从”的村庄。

基辛格的司令部和其它部门一样，也是在急忙准备撤退。士兵们提着一捆一捆的文件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房间里的办公桌已空空如也，一个黄发上等兵正在把一叠一叠的文件扔进炉子焚烧。

谢罗夫来这里是想干掉基辛格将军。可事不凑巧——这个将军已经不在罗夫诺了，这个“英雄”已经乘自己的飞机匆匆溜回西部了。

谢罗夫不愿“空手”回去，于是他走进了参谋长——空军中校的办公室。当那位参谋长向烧文件的壁炉一弯腰，就再也没起来了……

(二)

诺瓦克回到罗夫诺以后，更加活跃了。

尽管希特勒匪徒在全面“撤退”，但罗夫诺市的德国人却不见少，甚至好象比过去还多。虽然他们大批地从罗夫诺逃走，但又有大批从东方“撤退”下来的德寇充斥了罗夫诺。新年前夕，有一批从日托米尔逃来的德国军官和行政官员来到这里，这批人在人群中很容易辨认出来：他们行李非常简单，因为他们只顾逃命，根本顾不得带上箱子之类的行李物品。继日托米尔那批以后，又从舍佩托夫、诺沃格勒—沃林逃来一大批。他们都急于西逃，只临时在罗夫诺停留。然而要想逃出罗夫诺可不是那么容易。那些日子，越来越多的希特勒匪徒从四面八方麇集到罗夫诺。

市内旅馆拥挤不堪，连走廊也住上了人。虽然罗夫诺的饭店、餐厅特别多，但也难以对付越来越多的败退来罗夫诺的德国人。于是应运而生，在“德国”大街一座军官旅社的一楼新开设了一个餐厅，餐厅门口写着“只对军官开放”几个大字，餐厅还为将军和上校军官设有雅座。

就是这个餐厅，特别是它里面的将军房间引起了诺瓦克的兴趣。他之所以对这个军官餐厅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即：这里的工作人员中有三个他信得过的人——地下组织成员加莉娅·格涅坚料、丽莎·格尔丰德和伊拉·索科洛夫斯卡娅。

诺瓦克制定了一个爆炸餐厅的计划，计划很简单：将地

雷挂在餐厅餐桌底下，军官厅一个，将军间一个。

他在加莉娅·格涅坚科的住所里装配了地雷。他用两个大白铁罐，每个罐子里装上许多炸药，同时，还装进一个磁性延发地雷，一个反坦克手榴弹和三个“英国式手榴弹”，周围填满铁钉、螺丝、碎铁片之类的东西。为了使它更有把握爆炸，他又在每个罐子里放进了一个雷管。

就在元月五号那天早晨，诺瓦克得知，他的父亲被法西斯匪徒枪杀了。

姑娘们希望诺瓦克尽快装好地雷，虽然她们也知道了诺瓦克父亲被枪杀的消息，但为了不打扰他，就没多问。诺瓦克把第一个地雷装上了引信，时间定在下午三点钟爆炸，那正是德国军官就餐的时间。当他开始把引信装入第二个地雷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炸药燃烧起来了，火焰直冲诺瓦克的面部，房间里顿时浓烟滚滚，一个姑娘立刻冲向窗户。

“别开！”诺瓦克喊道，他害怕烟跑出去引起大街上的人的注意。

“别开！”他又一次喊道，并把已经装好的那个雷搬到一旁。

火灭了。

几个姑娘赶紧给诺瓦克包扎伤口，然后用纸把两个白铁罐子包起来放进水桶，上面盖上抹布，挑着桶走出了家门。

“我们分几条路走吧！”加莉娅建议道，“假如一个雷被截住了，另一个雷还可以送到，那怕只有一个地雷爆炸……”她把“截住”这个词说得如此轻松，似乎就象平常在街上和熟人见面，谈谈话，耽误几分钟一样。

但加莉娅·格涅坚科心里却明白该怎样做。她知道，前

线离这里只有20公里，罗夫诺市处于特别戒严状态，在街上每走一步宪兵都要检查证件。

加莉娅在自己的手提包里单独放了一枚手榴弹，假如万一遇到……她要 and 敌人同归于尽。

丽莎·格尔丰德也随身带了一枚手榴弹。她身体瘦弱，面色苍白，从模样上看，似乎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大。她是红军军官的家属。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点不知道丈夫的情况。如果丈夫还活着，同样也不知道她的情况。丽莎·格尔丰德在德国军官餐厅当清洁工，还在去年春天她参加了秘密组织。现在，当诺瓦克叫她去完成这项危险任务时，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此时此刻，她想没想过留在家里的三个小孩呢？当然想过！但与此同时，在她脑海中又闪现出这样一个念头：她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任务正是为了自己孩子的幸福，为了千百万人的幸福，为了祖国——母亲的神圣和庄严！

姑娘们准确无误地计算出了，从诺瓦克制作并交给她们地雷的加莉娅住所到“德国”大街的军官餐厅这段路至少需要走一小时。分头走的几位姑娘碰巧在“德国”大街的一个拐角处相遇了。突然，宪兵巡逻队叫住了丽莎。当她还没来得及出示证件，加莉娅就被带到了她的跟前。

宪兵检查了她们的证件。原来，两个姑娘挑的担子一模一样，这不能不引起宪兵的注意。假如她们被带去见的那位党卫军中尉不是军官餐厅的常客的话，还不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如何呢！然而中尉认出了加莉娅。

“小姐去餐厅吗？”

“是的，去餐厅，中尉先生！”加莉娅高兴起来，说道。“他们耽搁了我们！我们上班要迟到了。”

“这位小姐也在餐厅工作吗？”中尉一边打量着丽莎，一边问道。

“是的，她是在餐厅工作。”加莉娅微笑道。她感到高兴的是，她们碰上的这位中尉认识她，这样她们就有希望顺利摆脱宪兵。

中尉把她们放走了，而且还答应今天一定到军官餐厅吃午饭。

“请务必来呀，中尉先生！下午三点，我们等着您。”

不知道这位党卫军中尉三点有否来餐厅。不过，即使他不来，也不要紧。他不来，人也是够多了，军官们挤了满满一餐厅。正当这时，一位德国将军在两个中校陪同下，来到了那个窗户朝“德国大街”开的将军间。他们是由一辆直接从前线回来的深灰色“巴伐利亚牌”汽车送来的。

军官们吃饭吃得正起劲，突然，将军间传来了猛烈的爆炸声。顿时整个大厅一片恐慌，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听骚乱中发出一阵阵恐怖的尖叫声。过了不到一分钟，大厅的地雷也爆炸了，天花板、墙壁、地板被炸得一塌糊涂。于是大厅里的骚乱变成为歇斯底里的号啕……然后哀号猝然停止——大厅静了下来。

接着恐慌和骚乱波及到二楼旅社。一些吓破了胆的希特勒匪徒不顾一切地往楼下跑。但楼梯被炸毁的砖头和乱七八糟的木头堵塞了，于是他们就争相跳窗户，一个个摔在马路上，死伤者众多。

宪兵包围了这幢炸毁了一半的军官旅社大楼，但包围未必有用。街上顿时空无行人，只有一些希特勒匪徒在街里跑来跑去，因为据传，在别的饭店或法西斯分子聚集的地方还可能发生爆炸。

一直到了傍晚，恐慌和骚乱才有所平息。六点钟盖世太保发布了一项命令：七点钟以前将居民赶到最高法院前的广场。

全城的人都知道，法西斯占领者在这作威作福的最后时刻还将会导演可怕的惨剧……

在这前一天，罗夫诺的秘密组织遭受了重大损失。继伊万·伊万诺维奇·卢茨、波采卢耶夫和玛鲁霞·扎尔斯卡娅被捕以后，盖世太保又逮捕了费多尔·施库尔科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莫伊洛夫。这种逮捕事件发生在不同时间，并且具有偶然性，这说明，地下组织内部并没有钻进奸细和叛徒。据了解，希特勒匪徒打算将这些被捕的地下工作者——优秀的爱国者当众处死。

尽管宪兵和警察施展了种种伎俩及威胁手段，但集合在广场上的人还是稀稀拉拉，寥寥无几。七点多钟，开来一辆带蓬卡车，希特勒匪徒把被捕的人从车里带了出来，一边走一边用枪托打他们，把他们赶到绞刑架前。

于是，刽子手们忙碌起来。

走在前面的，腿略有些瘸的是伊万·卢茨，他镇定自若，用眼睛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群，向人群中的一个人点了点头，又继续向前走。走在卢茨后面的是费多尔·施库尔科，他十分瘦弱，脸色苍白得象死人一样。波采卢耶夫迈着坚定的步伐缓慢地走着。萨莫伊洛夫搀扶着玛鲁霞·扎尔斯卡娅，她左腿有些跛，走起路来右肩似乎显得比左肩高。

“同志们！”萨莫伊洛夫喊道。

“同志们！”尼古拉·波采卢耶夫也喊道。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几乎喘不过气来。“同志们！我们的人就要到来了！”

刽子手一把抓住波采卢耶夫，把他强拖上绞刑架。波采卢耶夫不停用手抓、用脚踢、用头撞刽子手，朝他们脸上吐唾沫，并大骂他们。在绞索上他用尽全身力气喊道：

“永别了，同志们！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接着走上绞架的是卢茨。

“恶棍！”卢茨用高亢的声音喊道，“你们还有什么招呢？我们是千千万，我们是杀不绝的！我们的人就要到来了！”

诺瓦克哽咽着，他和索洛维约夫到广场，是来和同志们默默告别的。在这紧要关头，他俩听了卢茨的呼唤真恨不得应声冲过去把他救出来！诺瓦克紧紧抓住索洛维约夫的手，不知是让索洛维约夫克制呢，还是在极力克制自己。

广场中央传出了一声声呼喊：

“消灭法西斯刽子手！”

“共产主义万岁！”

这是萨莫伊洛夫在呼喊，施库尔科在呼喊，玛鲁霞·扎尔斯卡娅在呼喊。喊声此起彼伏，越来越宏亮激昂。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们要竭尽全力呼喊，让更多的人听见他们的呼喊声。

(三)

希特勒法西斯驻乌克兰“首府”撤退的速度加快了，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气氛也日趋紧张。前线逼近，从罗夫诺逃走的不仅是来这里捞外快、掠夺和平居民的法西斯军人，也不仅是法西斯强盗们的私人“商行”和“办事处”，而且还有他们的一系列政府机构。帝国专署所属的众多部及专署本身都在准备撤退。那些法西斯官僚们谁都不愿当苏联红

军的俘虏。这时，苏联红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进攻，步步逼近。

前线离我们游击队的驻地也越来越近了。我们也决定向西“撤退”，因为在我们支队，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谁也不愿过早陷入自己人的“包围圈”。大家共同的想法是：尽量把敌人“送”得远一些，直至“送”到我国西部边境，而且让敌人在逃跑时受到的损失更大一些。

“我们到底往哪儿‘撤’？同志们！”我问参加研究这一问题会议的参谋人员和侦察员。

“去利沃夫，支队长同志，”库兹涅佐夫不加思考地回答。他是开会前才从罗夫诺回来的。

“为什么您恰恰想的是去利沃夫呢？”我问。

“这是因为，我的‘朋友’是逃往利沃夫。”

一阵哈哈大笑使库兹涅佐夫没有讲完自己的“理由”。笑声停止，他继续说道：

“对于我个人来说，在利沃夫有很多工作要做。而更重要的是那些希特勒匪徒，正如我已经向指挥部报告过的那样，他们企图在利沃夫长期盘踞，其中很多家伙妄图扭转战局，伺机从利沃夫反扑……”

游击队员们又一次笑了起来。当笑声止息后，库兹涅佐夫最后说道：

“看样子，我们到利沃夫，不但能够获取许多重要情报，而且还可能送几个法西斯头目‘去见俾斯麦’。可能，利赫也会在利沃夫露头的……”

就在当天，我们向莫斯科发了电报，电报中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并请求指挥部批准变更部署，将支队调到利沃夫。第二天得到了答复：“同意。”

我们立即着手转移的准备。米佳·利谢伊金、库兹涅佐夫和科利亚·斯特鲁京斯基被派去罗夫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去那里。他们三人去罗夫诺的任务是，向侦察员和地下工作者传达我的命令，即：谁留在罗夫诺，等待红军部队进城，接管政权；谁和占领者一起向西“撤退”；谁立即回支队。与此同时，他们还须和跟敌人一起“撤退”的同志们商定好在利沃夫接头的地点。

瓦莉娅听见了敲门暗号，把门打开了。

“库兹涅佐夫！您终于回来了！天晓得我胡思乱想了些什么，这么长时间没见人影，难道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她的话语里带有责备的意思，但眼睛里却流露出了喜悦。库兹涅佐夫没有解释自己长时间没来的原因。他们相对而坐，谁也不吭声。

“我干吗坐着！”瓦莉娅猝然一怔道。她突然站了起来，急忙过去收拾桌子。“库兹涅佐夫！”过一会儿，她轻轻地叫了一声。

库兹涅佐夫仍然坐着在考虑什么问题。很难猜测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从面部表情看，既象是发愁，又象是感到失望。

“你为什么这样发愁？”瓦莉娅一边问，一边坐到他面前。“出什么事啦？”

“出事了，”库兹涅佐夫漫不经心地回答。“科赫跑了！”

“你说什么？”

“如果他得以跑掉，那就是我的罪过。”

“他跑不了！”瓦莉娅提高嗓门，满有把握地说。“他能跑到哪去？他永远也跳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他会躲到一个地方去。你知道，法西斯分子虽然在败退，可他们仍在期望着什么吗？据说，他们逃去的地方还需要我们去呢。”

“的确，”瓦莉娅若有所思地拉长了声音说，“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溜掉。但对科赫我们没有办法，他是直接从帝国专署大院坐‘蜻蜓’^①飞走的！连坐汽车去飞机场他都不敢。”

“瓦莉娅，”库兹涅佐夫突然呼了一声，但突然又不吭声了。瓦莉娅警觉起来。“这事我没能料到，”他继续说道，“依我看是毫无希望了，我们要一事无成了！”库兹涅佐夫又苦恼又气忿地说。

“怎么能说是一事无成呢？”瓦莉娅差点要笑出声来，她觉得这话说得是如此的荒诞。

“这简直是瞎说！”她继续说道，“有一个人，整个支队都羡慕他，大家都为他感到自豪，他受了奖，荣获了勋章，还是列宁勋章呢！可他还不满足……还说什么‘一事无成’，喂，坐到桌子旁边来吧。”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战争就要结束了，”库兹涅佐夫说着，不知怎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再过三四个星期，我们的人就要到来了！”

说话间有人敲门。瓦莉娅打开门，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出现在门口。

“准备好了吗？库兹涅佐夫！我已经万事俱备。”

“你们要到哪儿去？”瓦莉娅高声问道，疑惑不解地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

“莫非她还不知道？”斯特鲁京斯基问。

^① 指直升机。

“对，瓦莉娅……”库兹涅佐夫开始说道，“我还什么都没告诉你呢，我们要转移到新地方，去利沃夫。”

“是整个支队都转移吗？”

“是的。”

“那我还没做好准备呢！”

库兹涅佐夫和斯特鲁京斯基互相对看了一眼，使了个眼色。

“你不需要准备，”库兹涅佐夫轻声而温柔地说，“你就留在罗夫诺。”

“我？留在罗夫诺。”

“你今后将和帝国专署一道撤退到利沃夫。”

瓦莉娅继续睁大眼睛看着他。

“那我今后到利沃夫干什么呢？”

“跟在这里一样，”斯特鲁京斯基说。

“就我一个人留下？”

“就你一个人留下……支队长的命令就是这样，”库兹涅佐夫最后说。

瓦莉娅开始沉思起来，她的心情充满着矛盾。还有三四个星期，她和库兹涅佐夫就要开始他们向往已久的新生活，但这件事他们相互都没有勇气说破。这样一来，他们开始新生活的日期又要推迟了。往后的情景又是：地下活动、斗争、经常会有死亡威胁、等待、期望……可瓦莉娅突然感到，即使盼望已久的幸福生活马上就开始，那她也不可能享受到这种幸福，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她和库兹涅佐夫都还重任在身。既然她不能享受这种幸福，那么她的伴侣库兹涅佐夫自然也就不能享受这种幸福。想到这些，她又恢复了平静和信心。

“好，”她低声说道。她从矛盾中挣脱了出来，似乎轻松了许多。

“今后你还会担心吗？”斯特鲁京斯基突然问。

“会的，”瓦莉娅承认道。“你也在担心嘛……我们大家都担心，但我们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在考虑另一个问题：到利沃夫后我们在什么地方碰头？”

“你记住地址，”库兹涅佐夫说。“米茨克维奇街，12号。不要写，要记在脑子里。”

“米茨克维奇街，12号，”瓦莉娅又重复了一遍。

“这是支队报务员玛丽娜姐姐的地址，今后我们在她家碰头。记住了吗？”

“米茨克维奇街，12号。”瓦莉娅又默默地重复了一遍。看来，现在一切都已经说妥了，但库兹涅佐夫却坐在那儿思考什么，似乎他又不打算走了。斯特鲁京斯基看了一下表，似乎感到有一种无形的东西阻碍着他去打破这种沉默。他心里明白，这个时候瓦莉娅和库兹涅佐夫是在相互默默告别。他突然感到有些难为情，正当他想出去的时候，库兹涅佐夫站了起来，开始收拾行装上路。

“斯特鲁京斯基，我能吻一下瓦莉娅吗？”库兹涅佐夫出乎意料地问道。没等回答，库兹涅佐夫异常激动地把瓦莉娅拥抱了一下，然后头也没回就走出门去了。

“米茨克维奇街，12号，”瓦莉娅低声自语道，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米茨克维奇街，12号，”这听起来是个暗号，但它对于这对情侣来说，又意味着希望，意味着他们命运的吉祥和幸福。他们虽然互相爱慕，但今天还不能厮守在一起。

那天夜里，库兹涅佐夫驾着从卢茨克市行政长官那儿弄

到的汽车回支队去了。

(四)

按照我们的想法，克鲁季科夫小队必须在二十日到达指定地点，不能再晚了。因为六个侦察员必须在二十一日以前到达利沃夫。为了送这六个侦察员，我们派出了克鲁季科夫小队。支队把六个侦察员的命运托付给了克鲁季科夫，也就是说，我们将一次重大行动的胜负委托给了他。

我们的想法是：继续斗争，跟随敌人，跟占领者一道到西部去！……敌人从罗夫诺逃到利沃夫，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岗位就要转移到利沃夫。

我们决定派出六名侦察员和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去利沃夫。他们的任务是：在利沃夫潜伏下来，设法建立几处安全的秘密住所，然后，积极进行侦察工作和破坏活动。

在挑选人的时候我们考虑到了，无论是侦察员还是报务员布尔拉克，以及联络员热尼娅·德罗兹多娃都很熟悉利沃夫。这一点，他们几个或者在那儿居住过，或者至少是经常到这个城市去，侦察员斯捷潘·帕斯图霍夫甚至了解利沃夫市的地下设施（水管、电缆等）——战前他是利沃夫市城市公共事业工程师。

不熟悉利沃夫市情况的就娜塔莎·博古斯拉夫斯卡娅一人。但她有其它优势：她了解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匪徒那一套“规矩”，因为她过去曾被迫在民族主义分子匪徒那里呆过，后来冒着生命危险从他们那儿跑出来到我们这里。这位谦虚、朴实的姑娘在支队里表现很好。她非常热心、勤勉、积极、细心，由于她具有这样一些品质，因而她总是出色完成上级交给她的各项任务。记得有个什么人说过，只有高明

和不高明的演员，没有重要和不重要的角色。而娜塔莎就是自己这个不重要角色的杰出扮演者。她是那样善于从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中看出其伟大的意义，因为她把自己所做的平凡工作与其他一切工作联系起来，把今天做的工作与昨天和明天做的工作联系起来，并从所有这些平凡工作的总和中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全部价值。总之，娜塔莎在游击队员中被公认为有头脑的、成熟的人是不无根据的。

我明白，娜塔莎痛苦地忍受着来自自己人方面的对她的某种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在她刚从班杰拉匪徒那儿逃跑出来的初期又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还知道，娜塔莎在出色扮演并非重要角色的同时，也不可能不希望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这次委以她一个重大的角色——在克鲁季科夫和德罗兹多娃之间，换言之，也就是在侦察员和他们的后方之间当联络员。在这条路上来回奔走将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每走一步都可能发生意外，随时都有可能被捕，必须为共同的事业负责，所有这一切，都是摆在娜塔莎·博古斯拉夫斯卡娅面前的新考验。当我听到她说“我还必须抓紧多干”时，我不能不感到莫大的欣慰。这是一种善良、纯朴而高尚的愿望。我们完全相信，娜塔莎绝对不会辜负我们对她的信任。

我请娜塔莎和热尼娅和我一起出去散散步。我向她们谈了谈我自己有关红军进攻的一些考虑，力图给她们描绘出一个在希特勒匪徒败退的情况下我们工作的总轮廓。同时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利沃夫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了她们。具体问题我没有涉及，只是把罗夫诺的一处模范秘密住所——瓦莉娅·多夫格尔住处的情况向两位姑娘作了介绍，这也许对她们去利沃夫工作有一些好处。关于瓦莉娅·多夫格尔，热尼娅过去在支队曾听说过。

“嗯，那就是说明天就出发啊？”热尼娅以告别的口气问。

“是的，明天就出发。”

“那我们今后就要在利沃夫见面喽！”

“对。”

“啊，”她突然想起来，“我还需要洗洗衣服。再见，支队长同志！走吧，娜塔莎！……”

……通信排仍然没有得到有关飞机的消息。为这事今天一天内我去问报务员玛丽娜·基赫问了十来次，后来她不等我问，便把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怎么回事呢？是天气不能飞吗？看来问题出在天气上！

我已预料到，只要玛丽娜获知要派克鲁季科夫小队去利沃夫，必定会请求派她去，因为她过去经常如此。原来，在我之前，斯捷霍夫已到她那儿去过，请她写信到利沃夫，因为玛丽娜的家在利沃夫，家里还住着她的姐姐和其他熟人。玛丽娜显然没有说服脾气很倔的副支队长斯捷霍夫，于是又磨蹭起我来了。

“信，我当然要写，”她说，“我姐姐能为游击队员找到住的地方，能帮忙，一切都能……但支队长同志，只要您说说……我在利沃夫长大，对利沃夫我比谁都熟悉，我不去，谁去？谁更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呢？直截了当说吧，是谁？”她坚持要求去，并满以为我会说“当地人作用大，”于是她又继续“进攻”，也就是说，她要极力证明，在支队，派她去最合适。

“那要看什么样的当地人，”我回答，“当然不是那些当地人都认识的人。”

理由是充分的，但看来，这个理由斯捷霍夫大概已经用

过了，因为玛丽娜的回答是早已准备好了的。她说，她改变发型，她不住在姐姐家，她一次也不到姐姐那儿去，总之，现在在利沃夫，谁也不会想起去找她……所有这些，在她自己看来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派玛丽娜到利沃夫，让她去冒生命危险，我不能这样做。

我郑重其事地告诉她，信必须在清晨前写好。然后我就到斯捷霍夫那儿去了。斯捷霍夫在支队部的窝棚里和侦察队长卢金坐在一起，窝棚里除了他俩之外还有七个人——六名侦察员和报务员布尔拉克。卢金指示他们，或更确切地说，提醒他们不要受各种指示的框框的约束，目的只有一个：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失。此外，一切见机行事。侦察员们默不作声地听着，没提什么问题。只是到快结束的时候，侦察员帕斯图霍夫问，除了他们几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在利沃夫活动。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金淡淡地答道，这完全有可能。

“我有一个问题不知该不该问，”帕斯图霍夫解释说，似乎对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感到抱歉，“如果需要组织什么大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联络当地秘密组织，大家一起……您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他没有说完，但他知道，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作出。

“同志们，这个问题提得好，顺便说一说，不要去做和当地地下组织联系的任何尝试！”斯捷霍夫一边和侦察员告别，一边提醒大家。“你们应最严格地遵守秘密工作规则，注意保护自己。”他补充道，并和大家一一握手……

早晨，克鲁季科夫把小队集合起来。

(五)

一月十日天刚亮，库兹涅佐夫跑进了我的窝棚，他是头一天才从罗夫诺回来的。

“炮兵！”他喊了起来，“我们的炮兵！我们的！”

我披上大衣，跟着他跑出窝棚。森林里一片寂静，炮声清晰可闻。人们纷纷走出窝棚，兴奋地听着这时高时低、时强时弱的隆隆炮声。苏联红军在前进，正以雷霆万钧之力围歼着法西斯匪徒。

卢金气喘吁吁地走到我跟前。

“可别耽误了时间，”他说。

我们一起走进了窝棚，等政治副支队长也到后，就让通信员传达了支队立即出发的命令。

罗夫诺的诺瓦克分队部分同志已经撤回来了。索洛维约夫和库特科韦茨继续留在戈夏。从罗夫诺撤回来的，大多是继续呆在那里有生命危险的同志，其中包括组织炸毁军官餐厅的三位姑娘——加莉娅·格涅坚科，丽莎·格尔丰德和伊拉·索科洛夫斯卡娅。

捷连季·费奥多罗维奇·诺瓦克本人也撤回来了。

一个和诺瓦克一道回来的、身材瘦小、面色苍白、疲惫无力的女同志对我说道：

“支队长同志！我的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了？”她嘴唇颤动，两眼泪水汪汪，这就是丽莎·格尔丰德，“我有三个孩子寄放在邻居家里，现在孩子的情况一点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尽一切努力找到您的孩子，”我说，“我们马上发电报。”

“往哪儿发电报？”

“往莫斯科。请莫斯科通知各部队，只要我们的人一旦占领城市，就请他们马上寻找您的孩子，并好好照看他们。”

“能行？！”丽莎用怀疑的眼光看了看我，“这能行吗？……如果行的话，那就请他们帮忙吧，我把地址给你……我的天哪，只要知道他们还活着就好了……你看呢，红军能很快来这儿吗？……”她自言自语地回答道：“现在倒真的是快了……”

一月十日傍晚，我们支队到达罗夫诺——卢茨克铁路。

我们同样碰到克鲁季科夫小队曾经碰到过的难题——过铁路。但和他当时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的小队只有21人，而我们却有一千四百人左右。问题还不仅于此，因为我们的马车只能从铁路道口过，而不能从排水沟和铁轨上过，何况铁路上还有敌人的装甲列车来回不停地巡逻。

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找道口。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道口被人用石头、木头、泥土堵了起来，这是宪兵队搞的。我们继续寻找，情况相同，另一个道口也被堵塞起来，敌人还在道口两侧的路上埋下了地雷。后来侦察兵终于报告：发现一个未堵塞的道口，但要穿过铁路还是相当困难。

“怎么回事？”

“支队长同志，问题在于道口守备森严。”我决定和侦察员们一起去看看敌守备情况。

橇车似乎故意跟人捣乱，黑暗中老是撞上土墩、木桩之类的东西，走得很慢。

“就这里，支队长同志。”

橇车停了下来，我们向前走了一段。

“这儿是堆放杂物的仓库，里面住了许多希特勒匪徒。”

两个侦察员悄悄摸到铁路旁边，然后很快回来报告说：

“这些法西斯分子有平射炮、机关枪，我们看见射击孔里露出了枪口和炮口。”

当我们返回支队时，支队驻地已经燃起了篝火。

“早晨作决定总比晚间高明些，”斯捷霍夫说，似乎意思是：现在我们什么也别去考虑，“等到早晨再说吧。”

又一个早晨到来了。随着曙光升起，东方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就这样早晨一晚上，晚上一早晨，周而复始，一天一天过去，情况依然如故。我们整个支队沿着铁路线徘徊了好几个昼夜。侦察员多次企图潜到住着法西斯匪徒的仓库去，用手榴弹干掉他们，可每次都遭到法西斯匪徒机枪火力的猛烈射击。

陷入自己人“包围圈”的危险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我们。

斯捷霍夫、卢金和我坐在一堆篝火旁边分析形势。

突然从黑暗中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支队长同志！请允许我带一个小队化装成德国人，大摇大摆去道口，消灭那里的守备队。”

我回头一看，只见眼前正立正站着一个小个子“德国人”，头戴一顶钢盔，半边脸被钢盔遮住，身着一件很合身的、佩戴德军中尉肩章的德国军大衣，脚穿一双漂亮的一点折皱也没有的军官高筒皮靴，左腰挎一把皮套套着的手枪。虽然说话人的声音我很熟悉，因为太突然，我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口袋掏手枪。采萨尔斯基！正是他，他继续说：

“德军军服我们有的是，愿干的人也很多，不防让我们

去冒险试一试，何况我的德语也讲得不错……”

他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但我没同意。

“我们还要做一些尝试，如果实在闯不过去，那时我们再去冒这个险。”

库兹涅佐夫也提出，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尽管离开支队他也会感到很难过，但他还是希望去做一做冒险尝试。

我知道，库兹涅佐夫十分珍惜每一天时间，因此我也就没反对。他那辆灰色“奥培尔”汽车早就漆成了黑色，两个前灯也换了，并补办了新的车辆登记证。这样一来，就连过去的车主人——卢茨克市行政长官也未必能认出自己的车来。司机别洛夫穿上了德国士兵服，库兹涅佐夫还是穿上过去老穿的那件配戴有德军中尉军衔的军大衣。跟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杨·卡明斯基，他装扮成一个从罗夫诺布尔什维克手中仓惶逃跑出来的巨商。当然，这一切还需要有相应的证件作证明。

库兹涅佐夫得先去卢茨克，因为要到那儿去搞汽油，然后直接从那儿去利沃夫。计划是：到了利沃夫，三个人先在卡明斯基的亲戚或熟人家里住下来。

“还有什么要交待吗？”库兹涅佐夫问我，“如果支队不能很快到达利沃夫，我在那儿干什么？目前战争进展很快，不管是什么情报，假如不能马上送给你们，只要超过二、三天，就将过时无用。我不愿拿生命去做那种无价值的冒险。在这种情况下，请允许我去和那里的希特勒匪徒的头目进行周旋。”

我告诉了库兹涅佐夫两个法西斯头目的姓名，我认为这两个人是应该去打交道的：一个是加里西亚省省长维希特博士，另一个是副省长鲍埃尔博士。

我们一方面为库兹涅佐夫打点行装，另一方面和他商定

与支队接头的地点以及假如我们给他派去他不认识的人的接头暗号。

“要尽量经常向我们报告你们的情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卢金提醒说，“完成任务要报告，没完成任务也要报告。这是克鲁季科夫的坐标位置，给你们。这是利沃夫的两个地址，你们可以把需要报告的东西送到这里。”

我们商定好了：假如库兹涅佐夫、卡明斯基、别洛夫无法和支队接头，他们就应去找克鲁季科夫小队，并留在那里；假如这一着不成，那就自己越过敌人防线去解放区；假如越过防线失败，那就立即转入地下，等待红军到来。

卢金和往常一样，希望尽可能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制定出应变措施。但他明白，可能发生的情况不可能完全预料到，这就象下棋一样，只能想出前二、三步，往后的走法就要看竞赛者的天才了。他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而且当时他对每一步的走法都极力做到高度精确的计算，甚至不允许有任何败北的想法存在。

据侦察员报告，在一个道口发现德军队伍向西开去。库兹涅佐夫决定和敌人一道“撤退”。

“再见了，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他说。

我们互相拥抱，并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三次热烈接吻。当库兹涅佐夫和卢金、斯捷霍夫、斯特鲁京斯基及其他同志告别时，我注意观察了他们分别时的情景，深深感到，库兹涅佐夫在支队里是多么受人爱戴啊！

“奥培尔”车起动上路了。

两小时后，护送库兹涅佐夫的侦察员报告，他们的汽车顺利“挤进”了德军队伍，通过了道口，随着人流向西前进了。

三天后，我们想出了办法，整个支队顺利跨过了铁路，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六)

瓦莉娅牢记库兹涅佐夫的嘱托，力图详细打听科赫的情况。但这个驻乌克兰的帝国全权代表、东普鲁士的行政长官再也没回罗夫诺，连一点线索也没有。现在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他是在克尼希斯贝格，还是在柏林。瓦莉娅在帝国专署认识了一个少校，她从少校谨慎的言谈中推断，科赫在柏林。并传说他已失宠于元首，因为元首对他仓促“撤退”不满意。科赫的一名部属瓦林中尉在回答有关这位行政长官的问题时说，一切无可奉告。这位中尉身材矮小、瘦弱，但嗓门很大，绰号叫“排骨先生”，在某些方面他确实很象科赫。

那天，行政长官署撤退准备工作加快了。瓦莉娅在回家的路上异常兴奋，感到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她简直不知是在走，还是在跑，似乎想以此法来让时间过得更快些。就这一二天，她就要随德国人一道“撤退”到利沃夫去了，在那儿……

晚上九点钟，有人敲她的门。她听出来了是莱奥·梅特科的声音。就这个梅特科，是瓦莉娅在罗夫诺认识得最早的“熟人”之一，他曾帮瓦莉娅办过公民证。今天他有什么事要找瓦莉娅呢？

跟梅特科一起走进房间的还有四个法西斯军人和两个便衣，这两个便衣很快就到厨房去了。

“我能为你们效什么劳吗？”瓦莉娅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操着德语问。

那个年岁大一些的领头中尉走到瓦莉娅跟前，掏出手

枪，操俄语问道：

“保利在哪儿？”

“不明白你说的是谁，”中尉的枪口顶着她，她退了一步答道。中尉的枪口仍然顶着她。

“到底在哪儿？”中尉又气急败坏地重复了一遍。

“哪个保利？”瓦莉娅装着什么也不知道似的问道，“我有好几个熟人都叫保利。”

搜查开始了。

“穿上外衣！”领头的中尉命令道。

这个盖世太保分子一直讲俄语。看来，他是想以此来显示他已了解瓦莉娅的来历，并诱使瓦莉娅冷不防也讲起俄语来。但瓦莉娅一直讲德语，未露出丝毫破绽。

“我要和帝国专署一起撤退，你们没有权利阻拦我，”瓦莉娅继续用德语说道。

“你放心！”领头中尉改用德语说道，“我们正要把您送到您该去的地方。”

“但我更想去我熟悉的……”结果瓦莉娅只讲了半句，没有把话讲完。

“全抓住了，这是最后一个，”瓦莉娅听见厨房里那帮人在说。他们把厨房翻了个底朝天，只听见一会儿什么东西打碎了，一会儿什么东西又“咕咚”一声摔在地上。

盖世太保分子的盘问是徒劳的，他们需要知道库兹涅佐夫在哪儿，而瓦莉娅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他们的。

他们把瓦莉娅带出了住所，住所外面每个窗户旁都站着冲锋枪手。当她走到住所的拐角处，看见三辆小汽车，他们把她推进了其中一辆。她从汽车经过的街道判断出他们要把她带到盖世太保。她什么也没想，只是注视着汽车向哪里

拐。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因为晚八点钟以后街上即禁止通行。在一个十字路口这几辆汽车被巡逻队叫住了。瓦莉娅想起来了，城市已宣布戒严。虽然这对于她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她心理却有说不出的高兴，由此她敏锐地感觉到，红军肯定很快就要到来了。

深夜两点，审讯开始了。一个她似乎不认识的少校手里拿着手枪，对着她的面部，要她说出游击队驻地和队长的姓名。关于保利，他们暂时还没提到。看样子，这要放到最后了。

“什么游击队？”瓦莉娅莫明其妙道，“什么队长？你们把我当作什么人啦？”

她曾听到过很多关于游击队员在受审讯时表现出大无畏精神的故事。她知道，必须沉默，要回答就只有一句话“不知道”。也许是她那还没有完全丧失的信心，也许是数月来她在危险情况下成功地扮演“德国女人”所锻炼出来的机智和胆量，促使她要辩白、要证明逮捕她是一场误会，并要求他们尽快查清，尽快释放她。

“我不明白你们讲的什么，少校先生，”她直盯着少校的眼睛，极力说服他，“象我这样一个德国女人能去和游击队联系吗！我的父亲就死于那些坏蛋之手。”

此时此刻，从她话里可以听出她对父亲的深沉的怀念。正是这种隐藏在女儿心中的对父亲的深沉怀念，促使她走上了参加游击队的道路；正是由于她对父亲的怀念，所以此刻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憎恨杀害自己父亲的真正刽子手——面前站着的就是其中之一。

瓦莉娅似乎觉得，少校听了她的劝说后有些相信她了，所以她坚决要求少校赶快放掉她，让她和帝国专署一起撤

退

但显然，少校还知道一些别的什么情况。

他不慌不忙地走到桌子旁边，坐到安乐椅上，开始翻阅起文件来。这个法西斯分子长时间地坐在那看文件，沉思着，似乎忘记了瓦莉娅的存在。他在回忆瓦莉娅的情况，但瓦莉娅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瓦莉娅继续站着，不知道是应该等待他回忆起什么有关她的事，还是自己先说点什么。她看见旁边放着一个凳子，这时她突然感到疲倦得难以忍受，于是就坐下了。“我坐着，这倒是应该的，”她说，“这倒是应该的，因为我什么罪也没有，我是一个清白、正直的德国女人，所以我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少校继续看着文件。

他突然抬起头来，大叫道：

“站起来！”

瓦莉娅站了起来。

少校抽起了烟，把身子往安乐椅上一靠，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她，问道：“你和谁一起受过帝国全权代表的接见？”

瓦莉娅知道，真正的审讯现在开始了。

“和一个军官，”她镇定自若地说，“我是42年认识他的，是在火车上认识的，那次，我又和他偶然相遇了。他是全权代表先生的同乡，是一个功劳卓著的军官，多次受过奖赏，全权代表先生非常赏识他。”她说得很快，她害怕少校打断她的话，又提出新的问题。“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军官，他在法国和俄国都打过仗。”她稍微喘了口气又说道，“但我还有一个熟人，也叫保利……要是我知道你们所指的是哪个保利的話……”

“我所说的那个保利是苏联侦察员，”少校说。

“是吗？”她极力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问道，“那么……那么我就知道了。”

“你不知道吗？”少校阴阳怪气地慢声说，“我要让你知道。你去想一想吧！”

于是瓦莉娅被带到了地下室。

(七)

第一个夜晚过去了，第二个夜晚又来临，而瓦莉娅在地下室却没人过问。她已做好了准备，等待着更可怕的刑讯和折磨。但没有一个人到她地下室来，他们把她忘了，甚至连饭也没人送。

“不知道，不知道，”她低声自语道，好象是要永远重复这句话，并从今以后要用它来代替和库兹涅佐夫最后一次见面后常重复的一句话——“米茨克维奇大街，12号。”

深夜，一个宪兵把她叫醒了。他把她带上了楼，带到了走廊，就在这里宪兵曾多次打过她的耳光。她已经预感到审讯又要开始了。宪兵仍把她推进了昨晚审讯她的那个房间，房间里仍然是那个少校，他还是昨晚那种姿势坐在桌子旁边……仿佛已经过去的不是一昼夜，而是在审讯时被推到走廊打了一顿之后又推进来的一短暂。昨天的审讯似乎没有中断，而是在继续。

事实上审讯也是在继续。

“你发现过保利的可疑行迹没有？”少校问道，装出一副恶心的样子，扔给她一块破布，让她擦掉身上的血迹。

“哪个保利？”瓦莉娅又一次反问道。

“就是那个被我们逮捕的，并承认和你有联系的那个保利，”法西斯少校说道，并注意她对这话有什么反应。

“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瓦莉娅说。

“不过，你的朋友保利比你明智，他告诉我们，你是游击队员，你帮助过他。”

瓦莉娅觉得，她自己在表情上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因为她不相信少校说的那些话。

“你自己看看吧，”少校说着，递给她一张写有“审讯记录”字样的纸。

她决定不看。因为她知道，库兹涅佐夫是不可能落到他们手中的。她一句话没有说就把那张纸还给了少校。

她简直觉得可笑：这个愚蠢的记录竟是少校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杜撰出来的！难道他没想到这样做是愚蠢的吗？难道库兹涅佐夫，这位苏联功勋侦察员会在法西斯面前暴露自己，出卖自己同志的吗？瓦莉娅想：“完全可以断定，少校搞的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此刻，在她脑海里出现的倒是另一幅景象：就是眼前这个盖世太保分子坐在苏联军官面前的受审席上，表现出一副贪生怕死可怜虫的丑态。于是她笑了。

“给我拉出去枪毙！”少校凶相毕露地吼道。

外面进来几个人把她抓了出去，还没等她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把她拖到了院子里。到了院子，他们让她面对墙壁站着，她眯缝着眼，想看看究竟要发生什么事，她不相信他们会马上枪毙她。

突然她背后响了一枪，墙上的灰泥唰唰往下掉，落在她的头上，她用手抖了抖头发的灰泥。

又响了一枪，子弹“嗖”的一声从她头顶上飞过。这时她才突然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也就是在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只穿着一件单衣站在凛冽的寒风里，她感到异常的冷。此后，她就再没听见枪声了。

在地下室里，瓦莉娅清醒过来了。光线透过那小得可怜的窗户照进了地下室，在微弱光线的照射下她发现身旁的地板上有一碗汤和一块面包。

瓦莉娅把那碗透凉的汤喝掉了，又仔细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摸出了藏在领子里的针，开始缝补那撕破了的袖子。她缝呀缝，把那点线全缝完了。然后她想，还有什么事可干呢？地下室里的孤独、寂寞和无所作为几乎使她变得痴呆起来。

当勤务兵给她送第二顿饭来的时候，她拒绝吃，宣布绝食。

勤务兵走了。过了几个小时又回来了，端来一碗汤，但她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绝食声明。

法西斯士兵无奈，决定把她带到另一间地下室去。这间地下室水齐膝深，里面的水与外面的河水相通。这里一片漆黑，而且不能坐卧，只能站立。瓦莉娅开始用手摸着湿漉漉的墙壁在里面走，突然她双膝在水里碰上一个硬硬的东西，她用手一摸便明白了，原来是一具尸体，吓得她赶紧躲开。没过多久，又一具尸体在她膝盖上碰了一下，她赶忙摸到对面墙壁去，紧紧靠在墙壁上，连眼睛也不敢睁。她想，看样子是要死在这可怕的地下室了，因为她感到，她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八)

帕斯图霍夫和科别利亚茨基利用自己的“证件”在兹洛切夫买到了去利沃夫的火车票，1月21日他们抵达利沃夫。

那是列宁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他们在到达利沃夫之前，在火车上就想到了这件事。现在，他们行走在利沃夫的

大街上，当穿过人群，走过商店，经过大楼时，眼前的一切使他们不能不想起过去这里纪念这个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前途密切相关的日子的庄严隆重的情景。

他们很快在若尔克耶夫斯基大街找到了沃伊切霍夫斯基父亲的家。他们把一封信递给了这位老人，信中儿子请父亲好好接待他的朋友，并安排他们住下。老人拿着信看了很久，然后叠了起来，问需要他干什么，并请求他们相信他。最后，老人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并表示乐意给予帮助。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知道吗，今天是列宁逝世纪念日！”沃伊切霍夫斯基老人一边说，一边为客人做饭。

第二天上午，帕斯图霍夫和科别利亚茨基碰上了不太称心的事：这位当裁缝的老人家里不断有顾客来临，他家就这么一间屋子，他们住在这里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危险性。

他们不得不另找栖身之地。

在不了解主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的情况下，举手敲门并非轻易之举。因为时间无情，过去虽然是熟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是死了还是活着？即使活着，他们在希特勒法西斯统治之下又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呢？……

铁路工程师鲁坚科是帕斯图霍夫很久以前的同事、朋友，鲁坚科听他们讲了游击队撤离罗夫诺的经历以后，深感同情，因而对他们表现得特别热情，二话没说，立即答应愿意为他们提供住处。鲁坚科的家里住着姓贾姆巴的二兄弟——一位叫瓦西里，一位叫尤利安。鲁坚科把他们向客人作了介绍。

五个人在一起长时间没有话说，犹疑不定，面面相觑，

不知该说什么。越是这样下去，这种窘境越发使人难受。突然，科别利亚茨基用脚在桌子底下碰了帕斯图霍夫一下，于是帕斯图霍夫向贾姆巴兄弟提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无需考虑就可以回答的问题。他问尤利安·贾姆巴在什么地方工作，干什么工作。

尤利安·贾姆巴回答说，他现在在铁路上当售票员，但他马上又补充说，他过去的职业是教师。

帕斯图霍夫把嘴唇紧紧一闭，意思是叫大家开诚布公地谈谈。

“现在很多职业不需要了，”他说道，看了尤利安一眼，尤利安也看了他一眼，两人目光正好相遇。随后他又补充道：“恰恰相反，过去一些没有用的职业现在倒有用起来了。”

尤利安·贾姆巴微笑了一下。

“难道过去的售票员也不需要？”他问。

“我不是指您现在的职业，”帕斯图霍夫回答。

“那您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教师不需要，”帕斯图霍夫说道，并目不转睛地看着尤利安·贾姆巴，只见贾姆巴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帕斯图霍夫又断断续续说道：“医生也不需要，”最后他补充道：“最需要的是掘墓人。”

“喂，请允许我问一下，您干的还是过去的那个行当吗？改行了没有？”鲁坚科沉默了一阵之后问道。

“改行了，”帕斯图霍夫答道。

“真的吗？那末改行干什么了？”

帕斯图霍夫觉得，再转弯抹角没什么意思了，于是他直截了当说出了他是什么人。

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开口的弟弟瓦西里·贾姆巴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先走到科别利亚茨基跟前，然后又走到帕斯图霍夫跟前，和他们一一握手。

吃饭的时候他们谈得更热乎，原来，鲁坚科和贾姆巴兄弟都是自己人。科别利亚茨基告诉他们，还有别的同志可能要到利沃夫来，还需要请他们帮助找住处。鲁坚科说，他还知道有十来处安全住所，这十来处住所的主人都是正直、可靠的苏联人。瓦西里·贾姆巴只提供了一处住所，但正如他所说，这处住所完全可靠，十分安全。它是一个独门独户，还有一个厨房通向顶间的出口。帕斯图霍夫对这个住所很感兴趣。

“这个住所的主人是谁？”帕斯图霍夫问。

“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瓦西里答道。

“您能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吗？”

“尼古拉大街，23号。”

“这样说来，是在市中心喽？”

“对。”

“您能担保您这个同学可靠吗？”科别利亚茨基问。

“能担保，”瓦西里满有把握地回答。

瓦西里是一个忠诚、老实、精干的小伙子，一看就讨人喜欢，令人信任。从许多方面断定，他很早就在寻找机会和游击队联系。

瓦西里的同学叫久尼克·潘恰克，住在尼古拉大街。瓦西里事先通知过他，所以他接待游击队员非常热情。两位游击队员对潘恰克的印象跟对瓦西里一样，非常好。的确，瓦西里和潘恰克对游击队员有一种无法掩饰的崇敬，这种崇敬包含着置身于斗争之外的人对游击队员的羡慕和赞叹，同时

也包含着他们对自己过去站在斗争之外的过错的觉醒。

帕斯图霍夫决定交给潘恰克一项任务。

他把他和科别利亚茨基拟定要做的一件事交给了潘恰克，这件事严格说不是他们当时的任务，而是他们发挥主动精神担当起来的。这项任务是：尽可能充分、详细地搜集法西斯在利沃夫的暴行材料，把罪犯的名字一个一个列出来，把乌克兰和波兰民族主义分子中参与过迫害和镇压人民的人的名字列出来，把出版反苏、反共、反波兰的“秘密”报纸的人调查出来，并查清出版这类报纸的地址。决不能让那些给利沃夫人民造成严重恶果的杀人狂、暴徒、“死亡营”的组织者逃脱正义的惩罚，这是我们利沃夫人民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潘恰克、瓦西里·贾姆巴及一位过去的波兰军官，都表示同意帕斯图霍夫的意见，并积极开始进行秘密而公正的调查。他们深信，人民审判法西斯罪犯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与此同时，帕斯图霍夫和科别利亚茨基也在为他们的事奔忙，迫在眉睫的是搞钱买证件，以使自己在利沃夫的居住合法化。由于从罗夫诺来的难民大批涌入利沃夫，宪兵队加强了对居民住宅的管理和监视，经常进行搜查，凡发现无居住许可证者，就予以逮捕。

帕斯图霍夫、科别利亚茨基很快就和哈里托诺夫、沃罗比约夫联系上了。他们也和帕斯图霍夫一样没有居住许可证。帕斯图霍夫建议他们袭击德国人的机关搞钱，用钱买证件，他们没有同意。他们与帕斯图霍夫的意见不一致，沃罗比约夫认为，这样做会损害苏联游击队员的声誉，哈里托诺夫也是这个意见。然而帕斯图霍夫和科别利亚茨基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认为这是完成任务的唯一手段。往日的关于完成任

务的目的和手段的争论又开始了，但此时此刻，他们是不能把这个问题辩论清楚的。

他们这次见面毫无效果，不欢而散。帕斯图霍夫和科别利亚茨基在返回家的途中，碰上一件意外的事，使他们大为吃惊。事情是这样的：当他们向市剧院大楼走去的时候，宪兵把他们叫住了，命令他们走街对面。当时剧院封锁了，剧院两旁的人行道上停放着许多汽车，同时还有一些汽车接二连三地向剧院驶来。正当他们跨过大街时，一辆黑色“奥培尔”轿车突然在他们身旁来了个急刹车，险些儿撞着他们。车上的军官没等司机找到停车地点就下车了，他漫不经心地“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急急忙忙朝剧院走去。帕斯图霍夫和科别利亚茨基发呆似地站着，目送着那高大的穿绿色军大衣的身影。

他们认出了那是库兹涅佐夫。当他们一想到库兹涅佐夫在这儿时，他们的心里就象搬掉了一块石头，耽心顿时消逝，代之以兴奋和喜悦。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和库兹涅佐夫见面，但他们感到自己身边有了一个可靠和得力的朋友。他们想，他们并非单枪匹马，他们周围有许多未见面的朋友和同志。想到这些，他们浑身是胆，力量无穷。

他们不想回家，决定去火车站。在利沃夫这是他们最感兴趣、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地方之一。但没有特别通行证车站大楼是进不去的。尽管他们在广场人群中几次挤到大楼跟前，但还是未能混进车站。

他们在车站附近转来转去，不知不觉又来到了车站广场。帕斯图霍夫突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这里常有叫“穷苦力”的手推车工人进进出出，他们能自由进入车站货场和月台。科别利亚茨基叫住一个“穷苦力”，声严厉色地问他们

凭什么东西在这里进进出出。身着德国军大衣的科别利亚茨基使这位搬运工愣住了，搬运工立即从怀中掏出“出入证”和“营业执照”。科别利亚茨基将两张卡片琢磨了很久，然后把它扔给了那位搬运工，意思是告诉他没事了。由此看来，假如能搞到两张那样的卡片和一个独轮车，那就可以在车站通行无阻了。

他们回家了，一路上他们为这个大胆的计划而高兴得手舞足蹈。潘恰克和贾姆巴拿着一份做过补充的刽子手名单正在家等候他们。

第二天，鲍埃尔和什纳伊德尔被枪杀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利沃夫。据传，早晨副省长鲍埃尔在什纳伊德尔陪同下正打算离开家，突然一辆汽车在他的私邸旁边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个德军上尉模样的军官，这人不慌不忙地走近鲍埃尔和什纳伊德尔，问他们姓什么。当他们回答了姓名之后，那人说：“我正找你们呢！”说着就是几枪，将这两个纳粹德国的地方官击毙，然后跳进汽车开走了，不知去向。

帕斯图霍夫和科别利亚茨基喜不自胜，时而登上电车，时而漫步在市场，留心倾听人们的谈论，从而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德国副省长被杀的详细情节。神秘的上尉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人们是那樣的为库兹涅佐夫而自豪，假设库兹涅佐夫突然出现在人群中，大约他自己也不可能会如此地自豪。为什么这位枪杀副省长的英雄豪杰要问副省长的姓名呢，这对大家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但帕斯图霍夫和科别利亚茨基对此都十分清楚。

至于枪杀是怎样进行的，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不管是帕斯图霍夫还是科别利亚茨基都不十分了解，但流传在利沃夫市的传说却越来越清楚地揭示出了枪杀的细节。

事情是这样的：晚上，德国加里西亚行政当局在市剧院开会，库兹涅佐夫悄悄潜入剧院，想用枪打死省长维希特，但他无法靠近主席台。等到会议结束，他立即从剧院出来在街上等候，只见敌省长和副省长各自坐上了自己的汽车。库兹涅佐夫不知他们当中谁是鲍埃尔，谁是维希特，于是便驱车跟上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他跟踪的那辆车在伊万·弗兰科博物馆旁边停了下来，博物馆的对面就是车主人的私邸。库兹涅佐夫看准了地点后便驱车而去。

第二天，库兹涅佐夫的“奥培尔”车从弗兰科博物馆旁开过的时候，突然“坏了”。司机别洛夫从车上下来，慢腾腾地拨弄着发动机。库兹涅佐夫也从车上下来，拉开嗓门训斥司机：

“你的车老是不正常，真是饭桶、懒汉，车也不保养好。由于你的懒惰我要迟到了……”

这时他看见对面一辆舒适豪华的小轿车急速驶向那幢私人住宅。

上午十点正，从那私邸里走出两个人，司机跳出驾驶室，殷勤地打开了车门。也就在这时，库兹涅佐夫走到了那两个人跟前问：

“您是鲍埃尔博士吗？”

“是的，我就是鲍埃尔。”

“我找的就是你！”

他一连打了几枪，击毙了鲍埃尔及其随从，然后急忙向自己的汽车跑去。这时，卡明斯基和别洛夫也向站在私邸旁边的哨兵开火了。

然后汽车飞一般地驶过利沃夫的大街，向城外疾驶而去。

(九)

在离利沃夫18公里的库罗维茨镇，一辆“奥培尔”黑色轿车被宪兵巡逻队叫住了。

一位瘦瘦的少校长时间地查验着从车窗里递出来的证件。

“上尉先生，”少校不安地，但又装出抱歉的样子说，“还须请您拿出证件的附件。”

库兹涅佐夫气得满脸通红，将系在腰带上的一枚有法西斯党徽和号码的椭圆形徽章很不客气地猛一下子摔给了他。

“也许，这会使您满意了吧？”

“不，”少校还是用那种抱歉的口吻说，“我还要请您拿出补充证明。”

很清楚，他事先已经得到通知了。

库兹涅佐夫极力作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从身边悄悄抓起冲锋枪，对准少校就一梭子，少校倒下了，紧接着他又撂倒4个德国宪兵，其余的见势不妙，狼狈逃窜。库兹涅佐夫从被击毙的少校身上取回了自己的证件。

别洛夫已经发动好汽车，等待着库兹涅佐夫。

“扔掉汽车！”库兹涅佐夫向他喊道，“进森林！”这是唯一的出路。

他们钻进森林走了几个小时，后来碰见一辆运柴禾的大车，车夫是一个穿着伪警察服装的人。

“带我们一下吧！”库兹涅佐夫爬上车，一边把干树枝往下扔，一边说道。

伪警察看见手枪对着自己，也只好同意了，于是赶车出发了。

库兹涅佐夫估计在加诺维奇森林可以找到游击队，但找了三天三夜也没找到。就在第三天，他们碰见了一些犹太难民。这些难民为了躲避法西斯匪徒，经常成群结队跑进森林。如果碰上游击队，他们就加入游击队。

那些难民远远看见法西斯军官来了，拔腿就跑。

“站住，不要跑！”卡明斯基高声喊道，“我们是自己人！不要跑！”

一听见喊声，难民们却跑得更快了，他们只好在后面拼命追赶。

后来，在难民们证实了他们确是苏联游击队员后，遂把他们带进了自己的窑洞，并留他们住下。

夜里，库兹涅佐夫似睡非睡，朦胧中听见有人在唱一支非常熟悉的歌曲。当听出歌词以后，他突然跳了起来，急忙向那唱歌的人跑去。原来唱歌人是一位中年人，很瘦，穿着一件胶皮雨衣，雨衣周围鼓鼓的，看去活象一座钟。他唱道：

我们唱起我们心爱的歌，

歌唱沼泽，歌唱田野，歌唱森林，

热爱自由的戈洛塔^①曾到过这里，

他骑着战马，勇敢地 and 邪恶斗争。

“这首歌您是从哪儿学来的？”库兹涅佐夫兴奋地问道。

“从游击队员那儿听来的，”回答说。

“唱这歌的游击队员在哪儿？”

“离这里不远。”

“是一支大队伍吗？！”

^①戈洛塔—1649年发生在白俄罗斯的反对波兰和立陶宛地主的农民起义领袖。

“唉，怎么对您说呢，也不知是不是大队伍，人数大约就一百来人。”

“一百人？”库兹涅佐夫失望地问道。

“差不多都是本地人，”马克·施皮尔卡继续说道，“都是些农民，一百人左右，不会多。”

“您说的确实吗？”库兹涅佐夫追问道，“既然您知道他们是苏联游击队员，那么您为什么不参加他们的队伍呢？”

“我们正打算去呢，”他接着回答。

第二天早晨，施皮尔卡自告奋勇给库兹涅佐夫当向导，他的一个朋友萨穆伊尔·埃利希也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去当向导。他们对库兹涅佐夫等人说，他们经常顺利越过敌人防线去游击区，他们愿意帮助库兹涅佐夫去游击区。出发时，他让库兹涅佐夫带上信和埃利希那支老步枪，假如万一遇到什么情况走散，库兹涅佐夫等人先到了那里，有了它，便可减少麻烦。于是，他俩带着库兹涅佐夫、卡明斯基和别洛夫出发了。

游击队员非常审慎地接待了这位“德军上尉军官”，他的情况，先期到达的向导已对游击队员作过介绍。在当时情况下，库兹涅佐夫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衣服。他们五人被押向一个窝棚，看样子，这是指挥员住的地方。到了窝棚前，押送的人叫他们站着不许动，那个年岁大一些的整理了一下衣帽，昂首挺胸、一本正经地走进窝棚，一会儿又出来了，叫那个个子不高，但挺壮实，身穿一件大羊皮袄的人进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

“他可以自由了吗？”当普里斯图帕紧紧拥抱库兹涅佐

夫，然后又去拥抱卡明斯基等人的时候，那年岁较大的押送人还有些不放心地问。

“这真是巧遇！”普里斯图帕微笑着赞叹道，“现在见到你们太好了！”他说着，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德罗兹多夫，好象德罗兹多夫还不明白这次相遇的意义似的。

他们坐在窝棚里，互相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一边讲一边回忆。自分别以后，他们各自经历的事情太多了，相互之间问也问不够，讲也讲不完。当库兹涅佐夫说他在利沃夫见到过帕斯图霍夫和科别利亚茨基时，德罗兹多夫和普里斯图帕才松了一口气。就这样，库兹涅佐夫知道了克鲁季科夫小队部份同志的情况。

“喂，普里斯图帕，”库兹涅佐夫突然问道，“你还记得支队里的一位姑娘吗？那位林管员的女儿？……”

“是瓦莉娅吗？”普里斯图帕问。

“就是她，”库兹涅佐夫继续说道，“她现在在哪儿？”

“在罗夫诺的时候，他不是帮你干过事吗？”普里斯图帕想起来了，“那她可能随德国人撤退了。”

“这要看支队当时给她的是什么命令，”别洛夫有所觉察地说道，“如果她得到的是和德国人一起撤退的命令，那么她现在可能在利沃夫。”

“那她可能还在利沃夫找我呢，”库兹涅佐夫脱口而出说道。

“嗯，老兄，这可不一定，”普里斯图帕不同意他的说法。

“她会找的，因为他知道玛丽娜的姐姐地址。”

“您和瓦莉娅打算将来一起去哪儿生活呢？”

“我们还在考虑。”

“去克里米亚不错，”德罗兹多夫若有所思地说。

“不，朋友，我们不到克里米亚去，我们要去乌拉尔，我的家乡。”

“战前我和热尼娅去过克里米亚，去过雅尔塔，”德罗兹多夫说完就沉默起来，看来，他一想起热尼娅就有些伤感。

“照你这样说，她还在等着你喽？”普里斯图帕问道。

“是的，她在等着我。你知道吗，我跑到这偏远地方，错过了和她见面的机会。”

“那末，现在你……”

“你问我现在有什么打算吗？我要在希特勒匪徒的大后方大显一下身手。”

“那我们这里是不是敌人大后方呢？”

“这里当然是敌人大后方，就是到克拉科夫^①也是敌人大后方，对吗？你看呢？”

在此之前，普里斯图帕一直以为库兹涅佐夫会留在他们分队里，他甚至已经考虑过，有了这样出色的侦察员，他的队伍可以干些什么，可现在他这个希望破灭了。

“嗯！真叫人不可理解！库兹涅佐夫，我看您还是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吧。”普里斯图帕说道。

“不，朋友，不行，”库兹涅佐夫说，“我还有重任在身，倘若完不成，后果不堪设想。”

“您走，还把其他几个同志也带走吗？”

“只好如此了……”

“原来是这样，”普里斯图帕拉长嗓子失望地说道，“你看，瓦西里，”他对德罗兹多夫说，“这就是没有无线电

^① 波兰地名，省中心，

台的结果：人都不愿留在我们这里！”

“并非如此，”库兹涅佐夫辩解道，“同志们，不要见怪！我走是因为有重任在身，我必须尽快赶回去。有那么一天，我希望我能成功地降落在克拉科夫，因为目前那里正麇集着大批野蛮的法西斯强盗。如不及时斩断他们的魔爪，谁都知道，那些怙恶不悛的罪犯会在他们难兄难弟的掩护下，会在我们自由的土地上干些什么，以至卷土重来，酿成大祸。”

“的确是这样，库兹涅佐夫同志，”德罗兹多夫同意他的意见，“说真的，让您走我们真有点舍不得。不过这是您自个儿的事，别人不好多说，那末我就衷心祝愿您成功，幸福！”

护送库兹涅佐夫、卡明斯基和别洛夫的任务仍由那两个难民——埃利希和施皮尔卡承担。

天亮了，五个人已做好了上路的准备。

与此同时，普里斯图帕在向两个护送的人叮嘱，德罗兹多夫在为他们准备路上吃的干粮。不一会儿，一个年轻游击队员带来了两个装满食品的干粮袋，库兹涅佐夫只好把这些东西收下了。

“喂，今后常来啊！”普里斯图帕边和他们握手，边说。

“您也要常到我们那儿来啊！”库兹涅佐夫回答。

告别时，他们把所有的祝愿都倾注在这样几句话中：一路平安！祝您成功！愿胜利早日到来！

“对了，”库兹涅佐夫在分别的最后一刻说，“假如你们在我之前见到瓦莉娅姑娘，请告诉她，就说库兹涅佐夫向她问好，可别忘了啊！”

瓦莉娅此时得了伤寒，正躺在兹洛切夫监狱人事不省。不久前她得了此病，並和其他难友一起被法西斯匪徒从罗夫诺运到了这里。后来，她身体恢复以后，又被运到利沃夫，在那里继续受审，而且审讯越来越残酷、野蛮。

一天，一个穷凶极恶的盖世太保匪徒一把将瓦莉娅向审讯室门口拉去，使她“砰”的一声撞在门上，以至门开了，她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姑娘又被拖进一间病号牢房，里面躺着几个生病的囚犯。这时她发现自己的腿已经骨折了。

她神志模糊起来，已记不清审讯她的那间审讯室，也记不清她曾呆过五个星期的那间牢房，更记不清打那以后她遇到过什么事情。她已经辨别不清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她在干什么以及等待着她的又将是什么。她处在半昏迷状态中。她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丧失了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也丧失了斗争能力。“不知道”这句话成了她整个牢房生活的伴侣，同时也是她这种牢房生活的唯一目的和全部含义。

战后，当瓦莉娅回忆起在盖世太保刑讯室度过的这些可怕的日子时她谈到了她这句“口头禅”。有一次她讲起她当时老是说“不知道”这句奇异而又有魔力的话的含义，给我们作了解释。她说这话的意思是：她当时认为，库兹涅佐夫的命运比她自己的命运重要得多，因此在法西斯面前，她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说出库兹涅佐夫的名字。从她的这席话里我们可以感觉出一种伟大的思想，更确切些说，也就是这位十八岁的姑娘在那严酷的时刻脑子里产生的伟大思想。当时，也许她自己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但就在那时她为祖国建立了伟大功绩。

盖世太保匪徒从瓦莉娅那儿什么也没得到，但他们还是决定暂时不杀害她。很明显，他们还打算要从她嘴里得到口

供，并从她的口供中去寻找那个老是抓不到的侦察员线索。

盖世太保并不排除那个侦察员就在利沃夫，他们认为枪杀鲍埃尔这件事就是有力的证明。他们也不排除那个总是说“不知道”的纤弱而倔强的姑娘知道，而且清楚地知道保利·齐贝特在利沃夫的地址。为了从瓦莉娅的嘴里逼出这个地址，他们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威胁、利诱，刑讯……他们为了强迫她说出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使用了世界上罕见的一切野蛮手段。

利沃夫市法西斯的撤退加紧了。这几天，监狱里的人被成批成批地杀掉，等待着瓦莉娅的也是这种命运。但后来不知从上面的哪一级来了一个命令：将被捕者带到西部继续审讯。于是她的顽强精神拯救了她的生命。

她被运往西部，越走越远。那年初夏，她被押运到了德国的慕尼黑，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后来，她和一批被监禁的人，其中有苏联人、捷克人、法国人、保加利亚人等一起被派去做苦工。1945年初，瓦莉娅从法西斯集中营跑了出来。当时法西斯德国已经面临末日。逃出来后，她一直向东走，走了将近两个月，白天怕人看见就躲起来，晚上继续赶路。她的目标只有一个——寻找红军。

然而，她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她来到了美国占领区，那里不让通过，好言相求也无济于事，他们就是不放她过去。于是她拿定主意逃跑，这是她一生中第二次逃跑。她似乎觉得，她面前还可能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新障碍：这就是国境线。

她，这位年仅十八岁的倔强的姑娘，经过长途跋涉，历经艰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当她看见佩戴着红星的军帽的时候（她是平生第一次这样长时间地看），当她看见佩戴红军

肩章的军服的时候(我们军人的肩章她还从没有见过)，当她在警备司令部的接待室里，一位苏联军官与她热情握手的时候——她激动得泪流满面，但她没有捂住脸，她想到她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哭过了，好象是自她父亲被敌人枪杀以后……

(十)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而护送库兹涅佐夫的埃利希和施皮尔卡却没有回来。“他们肯定通过敌人防线了，”普里斯图帕和德罗兹多夫自我安慰道。他们不愿往别的方面去想，各自都暗暗设法使对方相信，库兹涅佐夫顺利地通过了敌人防线。

克鲁季科夫从普里斯图帕和德罗兹多夫的谈话中知道了库兹涅佐夫在加诺维奇森林的情况，这是关于库兹涅佐夫的最近消息。在此之前，他对库兹涅佐夫的近况一无所知。“应该尽快将你们见到库兹涅佐夫的情况向莫斯科指挥部报告，”克鲁季科夫说。

利沃夫解放以后，游击队的同志们，其中包括副支队长斯捷霍夫、克鲁季科夫、德罗兹多夫、小科利亚以及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等都在寻找他，为打听库兹涅佐夫的下落，若尔日·斯特鲁京斯基曾跑遍利沃夫全城。支队长也一次又一次从莫斯科来信来电话询问。

来到利沃夫，希望能找到库兹涅佐夫的线索。下车后我径直去伊万·弗兰科博物馆，巴不得立即赶到库兹涅佐夫枪杀鲍埃尔的地方。当我踱步在这座独家院旁时，眼前似乎浮现出了1944年2月10日枪杀事件的情景。周围的一切引起了我对当时事件的联想：库兹涅佐夫是站在这儿开枪的，打死鲍埃尔后，是沿着这条石头路跑向自己汽车的，汽车停放在这个角

落。通过这一联想，我对库兹涅佐夫的这一正义之举不禁钦佩之至。

于是我站在人行道上 默默自语，一定要把库兹涅佐夫的英雄业绩告诉人民，要向尽可能多的人宣传库兹涅佐夫，让人民永远不要忘记库兹涅佐夫的丰功伟绩。

我得到了一封他写的信，信封着，信封上写着：“请在我死后再拆，库兹涅佐夫。”这封信还是去年春天库兹涅佐夫去罗夫诺参加德国人举行的庆典时就留在我这里的。

我没有勇气拆这封信，我不希望得到“库兹涅佐夫已不在人世”的可怕消息，连想也不愿这样想。

在利沃夫的那些日子里，凡是能够查询的地方我都去查询过了。一次偶然的机 会，我在盖世太保存放的档案里发现了有关库兹涅佐夫情况报告的文件，这些文件是法西斯匪徒在逃跑时没来得及销毁的。

我看了一份利沃夫刑警局上呈的关于汉斯·佩特尔斯中校在瓦洛瓦亚街11号空军大楼被枪杀的报告。报告称，汉斯·佩特尔斯中校是被一个身份不明的、穿着上尉军服的人杀害的。在这批档案材料中，还有一个96号报告，这个报告陈述了副省长鲍埃尔和秘书长什纳伊德尔被枪杀的情况。接着又翻到一份关于在库罗维茨镇附近公路上发现一辆来历不明的汽车的报告。报告称：“在库罗维茨镇，一辆牌号为12·2·44的汽车突然向巡逻队开火，巡逻队长康特少校中弹身亡，杀人者逃遁。”

这样一来，情况就越来越清楚了。

但关于库兹涅佐夫在利沃夫的其它影响较大的行动，在这些文件中却没有提到多少，很多情况是他在加诺维奇森林时告诉普里斯图帕和德罗兹多夫的，我们是从普里斯图帕

和德罗兹多夫那儿得知的。关于枪杀鲍埃尔的情况是弗兰科博物馆的女守卫提供的，她是当时事件的目击者，枪杀鲍埃尔时她正在街上，她活生生地给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继续寻找着库兹涅佐夫的踪迹。

终于找到了。在盖世太保的一个房间里留下一大堆文件中我发现了一份关于库兹涅佐夫下落的文件。

“加里西亚区安全局和保安处长

14H—90/44.机密，国家要务，利沃夫市，1944年4月2日（国家级机密件）。

加急电

帝国安全总局并转党卫队队长及警察局局长米勒中将本人。

柏林

在1944年4月1日的一次会晤中，乌克兰代表称，44年3月2日，在沃林地区别尔哥罗特卡镇附近的森林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分队抓住了3名苏联间谍。从被捕者身上搜出有伪造的德军证件、地图及德国、乌克兰、波兰报纸（其中有登载悼念鲍埃尔博士和什纳伊德尔博士文章的《利沃夫报》），还有一份一名被捕者写的工作报告。从伪造的德军证件上看，有一个名叫保利·齐贝特的，他被乌克兰先遣军的代表认了出来。这位代表说，那个化名保利的人是苏联游击队侦察员、破坏者。他长期在利沃夫为所欲为地进行破坏活动。过去，枪杀冯克博士、掳走伊尔根斯将军均系保利所为。这个保利曾在利沃夫企图杀害省长维希特博士，但没有得逞，而副省长鲍埃尔博士和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长什纳伊德尔博士却不幸遇难。这两位帝国国务活动家是在他们的私邸附近被保利杀害的。在这个化名保利的间谍的工作报

告中，描述了这次枪杀行动的细节。

在利沃夫，这个保利不仅枪杀了鲍埃尔和什纳伊德尔，而且还杀了我们其他许多人，其中包括我们寻找良久的宪兵队少校康特。

在他的工作报告中，还详细记载有他的一些行动的时间、地点，有死难者的情况，有缴获的武器弹药的数字等等（看来，这些数字是准确的）。我们从普里茨曼战斗分队获悉，“保利·齐贝特”和他的两个同谋在沃林地区被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班杰拉分子枪毙。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的代表也证实了这一点，并许诺将向安全局提供全部详尽材料。

加里西亚区安全局局长、党卫队队长、局高级顾问维提斯卡博士。”

苏联军官在清理盖世太保办公楼的文件时，长时间轮流阅读了这份文件。此时，屋子里一片寂静。当我走进屋时，一位年轻的中尉默不作声地递给我一份盖世太保上呈的报告。在此之前，我曾请求过这位年轻军官，假如他们在盖世太保档案中发现了有关库兹涅佐夫的材料，就立即通知我。

“您认识他？”我看完，搁下文件时，他问道。

“认识。”我回答。

那位中尉走到我跟前，鼓起勇气想说什么，可又没说出来。过了好一阵，他终于低声说道：

“我的母亲和妹妹在文尼察被德国人杀害了，他们是被抓去作人质杀害的。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刽子手冯克被处死的消息时，我脑子里在想：我衷心感谢这个杀死冯克的人，请您向他转达我的谢意！”

“可现在究竟该向谁转达呢！”

“我也不知道，就向游击队的同志们、亲人们转达吧。”

“好，我一定转达。”

“当时我想，枪杀冯克的这个人是谁呢？似乎应该打听一下他的姓名、地址。关于这些，报纸上什么也没讲，只是说‘一个陌生人’，这对任何人都适用。”中尉接着说。

“他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我回答说。

“他是年轻人吗？”

“是的，他才32岁。”

“他是什么军衔？”

“一个普通的公民。”

“真了不起！……那末请一定向他的英灵转达，代表我们，代表大家！”

“好。”

那天晚上，我们——库兹涅佐夫的战友，拆开了他的那封信。读完信后，我们长时间漫步在利沃夫渐渐坠入暮色中的街道上，反复回想着我们在信上读到的那些感人肺腑的豪言壮语。自此以后，这些豪言壮语便铭刻在我们心中。

当时，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罗夫诺和利沃夫两市建立英雄纪念碑和树立英雄铜像。可是当时没有人能准确地构思出应挺立在广场上的库兹涅佐夫铜象的形象。

我们所熟悉的、现在无形之中还活在我们中间的库兹涅佐夫是一个朴实、谦逊、令人喜爱和尊敬、具有刚强性和大无畏精神的人，一尊静止不动的铜像难以塑造出他那特有的性格和形象。

那天晚上我们发誓，要积极工作，为库兹涅佐夫一生未实

现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以作为我们对他的永远怀念。

我还强烈地感到，自己有责任向祖国的人民讲述库兹涅佐夫一生的生活、战斗和为祖国献身的事迹。

我们在他的信中读到：

“1942年8月25日零时05分，为了给在法西斯铁蹄践踏下呻吟的父老兄弟报仇，我降落在敌人大后方。

我研究敌人研究了十一个月，我利用一身德国军官服，钻进了帝国地方行政长官——乌克兰的暴君埃里希·科赫的巢穴。

现在，我要开始行动了。

我热爱生活，我还年轻。但如果为了可爱的祖国——我亲爱的母亲需要我献出生命的话，我在所不辞。我要让法西斯们知道，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爱国者们究竟有多大的本事。我要让法西斯们知道，我们的人民是不可征服的，就象太阳是不可扑灭的一样。

即使我死了，但爱国者在祖国人民的心中是永存的。

‘即使你死了！……但你那勇士和刚强者的灵魂永存，它是永远活着的榜样，它将唤起人民为争取自由和光明而斗争！……’

这是我最喜爱的高尔基的作品中的一段话，让我们的青年们经常读读它吧……

你们的库兹涅佐夫”

我们高兴而自豪地迎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这个命令追认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为苏联英雄，并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结 束 语

真叫人难以相信，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些人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而今天，我们大家却坐在莫斯科市舒适的房间里，穿的是便衣，谈论的已不再是军事工作和游击斗争，而是和平劳动建设事业。我面前坐着的是采萨尔斯基博士，他是莫斯科一家医院的医生，同时又是业余演员、剧作家、艺术家。他旁边坐着的是瓦莉娅·多夫格尔，她刚从罗夫诺来。瓦莉娅旁边坐着的是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索洛维约夫，他是地质矿物学副博士，著述了不少海洋地质学方面的著作。捷连季·费奥多罗维奇·诺瓦克打电话来说，他也要来。他有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在高级党校学习毕业了……我们还在等卢金，他答应晚些时候来，因为他们部里今天有一个会需要他参加……

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无休止的残酷战斗，接连不断的冒险行动，频繁而艰难的军事转移，长期隐藏在敌人心脏里的地下活动……这一切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事实。

现在，这一切都成了久远的过去。

游击队的同志们已分散在全苏各地，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工厂，有的回到了集体农庄，有的进了学校。大多数回到了他们战前生活的故乡，也有的留在了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投入了和平劳动建设，成了战后伟大建设事业的建设者。

今天，在和平建设事业的岗位上，他们仍然象战争年代捍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那样奋发而顽强地战斗着。

我找库兹涅佐夫的亲人找了好久，可没有结果，因此我决定亲自去他的故乡——乌拉尔，寻找他的生前友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终于找到了他的朋友、同学和同事。现在，乌拉尔人都知道了他们家乡的英雄——库兹涅佐夫的伟大功绩，並虔诚地纪念他。在塔利察建立了库兹涅佐夫博物馆，树立了英雄纪念碑。他家乡的乡亲们还向政府申请，将济良卡镇改名为库兹涅佐夫镇，将塔利察区改名为库兹涅佐夫区。

库兹涅佐夫的亲人当时没有立刻找到，原来，他们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乌拉尔，分散居住到全国各地去了。后来我终究有幸找到了库兹涅佐夫的妹妹莉季娅和阿加菲娅的地址，于是我们开始建立了通信联系。库兹涅佐夫的弟弟维克多在收音机里听到《这是发生在罗夫诺》这本书的连播以后，亲自找到了我，那是1949年春天。在此之前，维克多·伊万诺维奇对自己哥哥的情况一无所知。他收到哥哥的最后一封信是1942年夏天，那是库兹涅佐夫在离开莫斯科之前给前线的弟弟寄去的。维克多把这封信给我寄来了。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弟弟维克多：

你的来信收到了，知道你要去科泽尔斯克。我还在莫斯科，最近几天就要上前线去了，乘飞机去。

维克多，你是我最亲爱的弟弟和战友，因此我想在去执行任务之前和你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为了赢得这场解放祖国、消灭法西斯的战争的胜利，我们势必要作出牺牲。为了使我国祖国兴旺，人民自由，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流很多血。目前，我国人民正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奋起抵抗法西

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想直言不讳地告诉你，我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此一去，牺牲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对此，我心甘情愿，无所畏惧。因为我深深懂得，这是为神圣而正义的事业，为我们祖国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而献身。我们一定要消灭法西斯，我们一定要拯救我们的祖国。伟大的俄罗斯将永远铭记着我们，幸福的孩子将热情地歌唱我们，千百万个母亲将怀着感激之情向孩子们讲述我们在1942年为我们亲爱的祖国献出了生命的故事。获得解放的欧洲人民也将永远敬仰我们……不，我们的国家绝不能受法西斯奴役，只要在俄罗斯土地上还有我们爱国者存在，我们就要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坚决消灭那些残暴的侵略者！记住这封信吧，亲爱的弟弟，如果我牺牲了，一定要报仇！一定要为千百万无辜的老人和孩子们报仇！向吃人的法西斯野兽们讨还血债！无情地惩罚他们！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伟大的俄罗斯不可侮。如果他们硬要把魔爪伸向俄罗斯土地，那么，等待着他们的是死亡。

临行之前我就这样草草地给你写几句。最后，祝你健康！热烈地吻你，我的好弟弟！

你的哥哥尼古拉

1942年6月27日于莫斯科

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烈士的精神与日月同辉！整个乌克兰铭记着他们，人民世代代传颂着他们，乌克兰土地上的万事万物都缅怀他们，就连诺瓦克在法西斯占领时栽的，今天已是硕果累累的苹果树也为死难的英雄们肃立默哀……

我们总是觉得，今天我们当中似乎缺少了谁，然而我们告慰英灵：“你们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个整体，是一支伟大的爱国者的队伍。我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在那艰苦的岁月，我们甘苦与共，患难相依，困难没有把我们压跨，在困难面前，我们没有灰心，没有失望，反而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无论过去或现在，乃至将来，我们都肩负着一个共同的使命：一定要使祖国的未来变得更美好。虽然你们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使你们过去的理想变为现实……”